



列寧 ЛЕНИН

金黃
則人
編人
譯人
編人

寧 列

ЛЕНИН

譯 編 人 則 金
人 峯 黃

1 9 3 8

序言

今日在中國，跟全世界一樣，還羈留在人類歷史的一個嚴重緊急的「轉變點」上面。

我們現在是已經實行了全民族的對日抗戰了。我們在這個轉變點上，不僅僅是鍛鍊着我們中國一國的運命，其實也正是鑄造着世界性的條件。許多人異口同聲地說：我們的抗戰，不是單純反抗日寇的問題，而是爭求世界和平的問題。這已經分明指出了這個轉變點確然是偉大的，是具有世界意義的。

列寧生前，就曾經站在人類歷史的這個轉變點上展望過，努力推動過，給了世界人類以直接的影響。即以他對於亞洲和中國問題的一點來說，他就是第一個與以密切的注視甚至於重視的巨人。隨手舉個例子：他在大戰以前（一九一三年），曾寫

過一篇爛燦的文章，痛論『後退的歐羅巴和前進的亞細亞』（“Backward Europe and Progressive Asia”），指出了亞洲的鬥爭勢力的蓬勃。他又在別一篇論文里，說：我們中國的人民是『真正偉大的人民，中國人民不只會痛憤自己的處於長期奴隸的地位，不只會幻想自由和平等，而且能夠進行鬥爭，去反對千百年來的壓迫者。』倘在現在讀到這樣感奮的語句，我們也會深切地覺得他所說的「能夠進行鬥爭」，簡直彷彿就是說「能夠進行抗戰」；所說的「反對千百年來的壓迫者」更好像是指着今日的日帝國主義一樣。

列寧不只是某一個階級的導師，不只是某一個民族的領袖，而且是在人類歷史的一個嚴重緊急的轉變點上具有世界意義同時也留下了世界影響的一個巨人。他的畢生的活動——偉大的生活，事業和遺教——可以充分地表現着他確然是這樣一個

認爲他安然逝世了的時候，却也聯合起來，對他大唱其讚美歌。關於這種把死了的革命家「聖徒化」的情形，列寧生前曾用過燃燒着的貶詞寫着：

「當偉大的革命家們活着的時候，壓迫者階級會招待他們以殘酷的迫害，並且用了謠言和污蔑混成的最野蠻的敵意、猛烈的恨惡和最暴戾的進攻，來接受他們的遺教。等到他們一旦死去，就來了各種的企圖，使他們（革命家們）一變而爲無傷害的聖像，使他們一變而爲聖徒，並且用了某種的光輪，圍繞着他們的姓名，以「安慰」被壓迫階級，而實際目的却是欺騙他們，同時更閹割了、俗化了他們的革命理論的實質，磨鈍了他們的革命的尖端。」

——參見英譯本列寧著「國家與革命」第七面。

這種「聖徒化」(canonizing)的現象，是已經被追封到列寧身上了。「革命」

的敵人們，改良主義和投降派的辯護士們，甚至頑固派的首領們，都一齊竭力稱讚列寧的那種「現實主義」的和「政治家式」的特質，企圖把列寧的革命聲望的光輪投到反動政策那方面去，使高漲着的革命發展弱化起來。

凡是不能把對於列寧的任何研究，竭力不使列寧的生活、事業和遺教方面的一「革命尖端」磨鈍的話，那麼，什麼都夠不上稱為正義的；而尤其重要的，是還要保持列寧觀點的本質——理論和實踐的統一。研究列寧的生活，其價值決不在於學院式的歷史或主觀的批評，決不在於當作崇拜他或詆毀他的「種無聊的練習」；而是在於當作客觀的歷史運動的理解方面和今日環繞在我們周圍的緊急的世界問題方面的一種直接的助力。」

英國的政論家 R. P. 杜德 (R. Palme Dutt) 是用了上述的這種「列寧觀點」，才寫成他的關於列寧生活的一部著作；現在我們在這里寫列寧傳記的精神態度，也不敢有所乖違；雖說我們自己對於列寧的研究也淺陋得可以，但在基本上，

至少可以說，對於這個目標是相當地接近的。

我們編譯這部傳記，雖然是並不會經過彼此的商榷而「合作」出來的，但是因為觀點上的比較統一，還可以自信沒有什麼被磨鈍的「革命尖端」的存在，更沒有「學院式的歷史或主觀的批評」的混跡。所有的內容，都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客觀的歷史運動」和「今日環繞在我們周圍的緊急的世界問題」。

當初，則人兄決意寫這部傳記，是在一九三三年。那時，出版界感着無書可出的苦痛，從印刷機上轉動出來的是一大批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之流的「英雄」傳記，而列寧竟無人垂青。則人兄偏偏不甘寂寞，便開始默默地埋頭於這部「列寧」的編譯工作。本來他是很快地可以帶着這部重要的出世作「列寧」而踏進文化界去的，因為當時他對於這項編譯工作進行得很順利，而且出版條件也已經接洽妥當。可是他從第一章寫到第五章的時候，出版環境却一天惡化一天，終於不得不使他從事於別的事情，而把這部「列寧」暫時擱筆。

一擱就擱了四五年之久。現在已經是淞滬抗戰後三個多月了。自我軍退出淞滬以來，出版界又痛感到無書可出的苦痛了。印刷工廠逐漸陷入了停業的狀態，排印工友無處立足，便只得紛紛回到老家去；同時，一部分無家可歸的工友們，饑寒交迫，只得乞援於廠方和書店，給他們以一些排印工作，維持暫時的生計。在這個危急情勢中，書店主人才想到了這部在舊書箱底里深睡了好多年的「列寧」，經過檢點原稿後，便交給這些工友們去付印。至於原稿未完成的部分，他本已決定請原手續完它，而那時因則人兄已經離滬多時，「遠水救不得近火」，於是乎就約我「弄弄好」。因此，在這部書中，從第一章到第五章，出於則人兄之手；從第六章到最末一章，以及作為本書「發端」的「列寧的時代」那一章，便是我所執筆的。我不知道現在的這個「狐尾」，也可以「續貂」一下否？

寫到這里，使我孟憶起列寧的前輩馬恩兩老合作「神聖家庭」的盛事，禁不得出了一身大汗！

黃 峯 記於日寇包圍和封鎖中的上海。

發端 列寧的時代

生於一八七〇年而死於一九二四年的列寧，橫亘着十九世紀最後的廿五年和二十世紀最初的廿五年。他的積極的生活，橫亘着十九世紀最後的十年和二十世紀最初的廿五年。

這一時代，是發生着決定的變化的時代，也是人類歷史上的轉換點。一九一四年的大戰和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就是這一轉換點的顯著的標誌，它的全部意義，還剛正在被開始理解着。而列寧的生活行動，正矗立在這個「變形」(transformation)的最中心。

列寧的精力，全然不同於同時代的一切其他的政治思想家和領導者，他自從很年青的時期起，就獨自地站在馬克思主義的強固的基礎上；而且從十九世紀告終以

前，憑着他的明澈的眼睛，他已經透視到未來時代的全部性質，已經在爲着這個未來而準備，已經抽引出實際而且具體的結論，只要那個時代一到，他更會獨自地適應於歷史的要求。

列寧的這種無比的精力，把歷史的運動瞭望得這樣明澈，這樣正確，這樣遼遠，究竟是怎樣造成的呢？他的這種精力，是從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面吸收過來的，他又把新的生命賦與了馬克思主義，而且把那已經落在腐儒·俗物以及凡庸的政客手里的馬克思主義救拔了出來。

爲要明瞭列寧的工作，我們就有理解他所承襲的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之必要，就有理解他從事活動着的時代之性質。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特質，就是對於自然、人生和行動全體的一個單純的、科學的世界觀之特質。

馬克思主義產生於十九世紀第二個廿五年之間。當時，「既存社會」的基本矛盾

盾，已經堅強地凸顯到浮面來了。

這一時代以前，一系列的長時期的中產階級的革命，已經在世界主要各國，尤其在英、法、美諸國，建立了資本主義的政權。資本主義的各關係，統治了全世界。機械工業表現了它的巨大的擴展。「自由資本主義」(liberal capitalism)的概念——這是從「人權」(Rights of Man)和「自由、平等、博愛」(Liberty, Equality and Fraternity)的口號上面接受了理想的、反抗性的表現，後來又在民族國家、立憲政府和國際貿易的骨架之中凝固起來的概念——便被視為人類發展上的高峯，出現於新的統治者布爾喬亞犯的面前。

可是資本主義統治的消極面，也已經同時出現了。「自由、平等、博愛」這個口號，對於勞働人民大眾，只是一種空洞的飾詞，遮蓋着這一階級被別一階級統治的事實吧了；而大眾則依然地流落在難堪的苦辛、貧困和奴役的境遇里面。生產和消費的無政府狀態；循環不息的危機；財富和窮困之間的無邊的兩極和越隔越闊的

深淵；商業主義與營利生涯在全世界上的野心的搶奪；一切都呈現着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

正在掀起的未來的新社會勢力——勞働階級，以他們的勞働力來造成資本主義財富的勞働階級——如今是成爲了一種積極的、獨立的因素，積聚起羣衆性的反抗，而開始在社會的、政治的舞台上，最初還是模糊的，然而已經表現着正在激增的政治目的和政治意識，特別顯著地表現在英國的革命的「工會主義」(trade unionism)和「改進黨主義」(Chartism)上面。到了這個時候，布爾喬亞就一反從前革命的工作，越弄越明顯地轉變到反革命的工作去，成爲反對新與勢力的既存制度的保衛者了。

緊隨着勞働階級反抗的開始，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也就出現了。一派是轉向於中世紀的懷戀(例如英國的加拉伊爾(artyle)或朦朧的人道主義的衷腸(例如西斯蒙田(Simonidi))。另一派却是努力地憧憬着一個新的社會制度，發展到「烏托邦社會

主義] (Utopian Socialism) 的初期理論(指聖西門 St. Simon、傅里葉 Fourier、奧溫 Owen)。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批判了資本主義的罪惡，擁護了一個合作形式的社會制度，然而他們並沒有關於社會發展方面任何樣的明確的概念，主要地却委身於對他們全無用處的統治者布爾喬亞，而偏偏對於獨自地足以實現他們的目的之階級鬥爭表示悲感。

同時，思想和哲學的發展，指出了向新階段前進的形勢是已經成熟了。布爾喬亞的思想，正碰到了思想發展的限度，開始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了。布爾喬亞的古典哲學的最高峯，是黑格爾在十九世紀第一個廿五年間就達到的。黑格爾完成了一種深刻的革命工作，破壞了先哲的主觀的唯心論的獨斷的預測，和經驗論的懷疑主義，首先建立了對於宇宙、人生和社會的一種批判性的客觀的理解，把這些理解為一種有系統的、有交互關係的發展過程，辯證地通過着矛盾和衝突，才前進到新形式，他又認為我們對於它的進行法則，是可以理解而且駕御的。但是他仍然讓

這一過程中的主要因素安置在神祕的唯心論的圈內；正如他把「國家」神祕地安置在「市民社會」以外和以上一樣，其實呢，國家只是「市民社會」的產物和反映。因此，他的哲學，依然爲唯心論所牽累，還不是完全地批判的、科學的，而其結果，更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神祕主義和反動，成爲普魯士帝國的撐腰者。雖然如此，他的哲學仍不失爲布爾喬亞派最後而且是最偉大的哲學體系；黑格爾之後，布爾喬亞哲學（撇開「左翼黑格爾派 Left Hegelian、費爾巴哈 Feuerbach、唯物論者而說」）就流於無理性的主觀主義，經驗論，七拼八湊的斷片，以及一堆一堆的騙話。

同樣地，布爾喬亞派的古典的經濟學派的最高峯，是李嘉圖 (Richardo) 在十九世紀第一個廿五年間就達到的。古典的經濟學家都曾經竭力地作出過一個關於新社會經濟基礎的科學分析。然而他們終究爲他們對於布爾喬亞制度的無意識的預測所束縛，從而認爲布爾喬亞制度就是一個自然的和永久的制度，因此，其結果當然被糾纏得沒法可想，無從發見出關於賦稅、利潤和利息方面的一種科學的解說。從

此以後，布爾喬亞經濟學，便放棄了使它成爲一種科學的企圖，只局限於經驗論的市場算盤的水平，因而完全沒有力量去理解或預知較龐大的經濟諸過程，這在今日是已經引爲一種笑話的資料了。

只有自然科學——這是對於資本主義在技術上有用處的——總算還能夠通過十九世紀而繼續地發展，甚至只有在這裏，還對於反動的統治勢力發生着經常的衝突。不過，自然科學是只在若干人們個別的工作領域中進行的，並沒有被一般人較普遍地理解；這樣說來，一旦前進的勢力打破了臨時的陣營，強迫着人們需要更基本的理解時，那就無可幸免地陷入相繼而來的科學的難關和危機。

在對於人類的生活和歷史，社會的和政治的制度的總關係（不是孤立的），企圖作一種科學理解的人們之中，馬克思就是第一個，在他以前，人們差不多連這個概念都是不曾想過的。

因此，馬克思以前，人間是盲目地發展過來的，是通過了「敵對勢力」的盲目

的交互作用而發展過來的，可駭的結果雖往往發生，而集團理解的企圖，却總是沒有的。

這種盲目的發展，只要是舊勢力統治一天（前次的世界大戰和目前的世界經濟危機），總是繼續一天的；但是集團的科學的理解和行動（馬克思主義或「國際共產主義」，由國際勞動階級所代表的）的新的組織力量，能夠勝任各階段的增強的任務，並且到了最後，它一定會駕御這個過程。

就在十九世紀這個嚴重的階段，就在新的勢力、問題和衝突在各方面叢叢生長的當兒，也就在當時佔着統治地位的布爾喬亞思想對於問題的解決上正在弱化和枯竭的當兒，馬克思就憑着他對於一切從前的思想和知識的深刻研究，對於當前的世界現實的深刻研究，他已經能夠識破一切的障礙物，指出前面的道路，於是，他就以現代世界的創立者和建設者的態度，挺身而出現於十九世紀了。

馬克思首先構成了一種完全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這就是「辯證法唯物論」

的視野。

馬克思承襲着黑格爾辯證法的衣鉢，然而脫出了它的武斷的唯心主義的成分。跟費爾巴哈——他是唯物的、黑格爾信徒——一樣，他看出了「觀念世界」並不是從「虛無」之中產生的神祕的創造，而是「物質世界」的反映。但是他跟費爾巴哈的消極的唯物論不同，也跟法國和英國的唯物論者的機械的唯物論不同，就在於他是仕奉着思想過程和人類活動的實際任務的，不僅把它們作為物質世界的消極反映，而且把它們反過來作用於物質世界，而使其變形。因此，辯證法唯物論的顯著特質，就在於理論和實踐的統一。「哲學家只是用各種方法說明這個世界；他的任務是要變更這個世界。」（見馬克思著「費爾巴哈論綱」Theses on Feuerbach）。這一個概念，在馬克思和列寧兩人的生活中，更臻於充分的實現。

就在這個視野的基礎上面，馬克思已經能夠把人類歷史的發展實行分析了，不再把它看做「偶發事實」的不合理的混合了，也不再把它看做武斷的觀念和見解的

造就了，而是看做了一種有組織的、科學的、能夠加以說明的發展了，它的基於物質的生產力的特定階段和由此而來的社會關係上必要的形式，產生出社會意識、階級關係、意識奧羅基 (ideology, 觀念形態)、社會的和政治的機構，以及由此而起的衝突和矛盾，然後才進於更向前的發展。

全部被記錄了的過去歷史——指低劣的生產水準和剩餘的不存在，因而沒有形成階級分化和榨取的可能之「原始共產主義」時代以後——都表現出它是階級社會和階級統治的不同形式的連續，而這個歷史又總是與不同的生產階段相適應，又總是通過了一連串的階級鬥爭而發展出來的。

從這個視野中看去，資本主義決不是作為一個永久不變的、無可避免的、「自然的必然性」(natural necessity)或超歷史的「經濟法則」(像布爾喬亞教授們竭力想使人信從的)看待，而是作為一個有始有終的歷史現象看待，作為階級社會的最後現象看待。資本主義生長於封建制度和「小所有社會」(small-property society)

之中，代替了或者可以說打倒了階級權利和階級分化的、從前佔着優勢的形式，其手段就是利用新的形式——即布爾喬亞氾或資產階級分裂出來，靠雇用別人的勞働和無產階級或「身無長物的」工銀勞働階級來過活，這些後面所說的人們，雖在名義上是自由的，其實却倚存着布爾喬亞氾而生活的。資本主義社會的運動法則的發見，是馬克思把辯證法唯物論的方法應用於現存的社會發展階段上的特殊創作。他能夠指出資本主義的最初階段，雖然存在着大批的慘酷和苦難，却也是一個進展的勢力，在相互競爭之中，走向生產力的繼續發展，走向生產規模的擴大，走向資本的集中和無產階級人數的不斷增加。然而，就在這個過程中，資本主義却也準備着自己的毀滅。在私人財產所有權的基礎上面開了路子的資本主義，却發展到了相反的方面，發展到了陷於無政府狀態的大規模生產組織，在這個組織里面，生產者的廣大羣衆被奪去了所有權，而渺小的、日益寄生虫化的所有者階級的生產結果，則成爲了生產向前發展的桎梏。跨進另一階段的條件，到了這時便成熟起來了。資本

主義成爲了一個反動的勢力，不再是前進的勢力了。機械之連續的，多數的窒息，擴大的危機和停滯期，巨大財富和產生財富力量的羣衆中間的貧困化，以及布爾喬亞和普羅列塔利亞之間掀起的衝突，這些都報告了資本主義之矛盾的激增和沒落的逼近。無產階級在這種生存條件之下，被迫着集體地組織起來，企圖在把生產工具交給大衆的出路中救拔出來。於是，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成爲了唯一的前進的勢力，必然要引入革命點，那時就由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從資本家手中把生產工具奪取過來，組織社會化的生產，從事消費，然後創造出無階級的社會。馬克思在這個出路中，獲得了目前這個時代的問題的解決。

據馬克思的看法，我們這個時代的中心任務是實現無產階級獨裁制，以組織社會化的生產，更進而引向未來的、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

這個任務，需要着國際的革命組織，以完成它的世界的使命。

爲了這個任務，馬克思和他的合作者恩格斯——恩格斯跟馬克思一起，從事於

理論草創時的勞役和實際鬥爭的領導，所以他佔有着同樣的光榮——曾一起獻身於理論戰線和實際戰線。

十九世紀下半期的國際勞動運動的生長和形成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演着主要的角色。通過了「國際共產主義大同盟」，通過了「第一國際」，以及對於世界各國勞動階級運動的直接接觸，馬克思和恩格斯訓練着並且指導着高漲了的國際勞動階級運動。到了一八八三年馬克思逝世的時候，到了以後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的時候，馬克思主義已經是被公認為整個國際勞動階級運動的基礎了。

可是，資本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決定的鬥爭，是直到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後才開始到來的。雖則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鬥爭，乃至一八七一年被工人們握過六個星期政權的「巴黎公社」，指出了前面的出路，然而在資本主義的面前，在它踏入崩潰的時代以前，在能夠展開世界革命的時代以前，資本主義依舊還在向全世界膨脹它的勢力。

資本主義向全世界的膨脹，引進了一個新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世界的大部分國家都直接地被扼在歐美的資本主義列強手中。到了十九世紀的最後廿五年，世界的分割運動，在它的主要路線上，已經達到完成的步驟了。西方列強的「獨佔資本主義」，簡直已經視全世界為囊中之物了。巨大的利潤流入於握着統治權的金融階級；其中一部分的利潤則用以取締高漲了的勞働運動，例如允許有限的改良條件；或利用工人領袖的腐化。這時，資本主義已經跨入了衰退和寄生主義的階段，並走向世界大戰和目前的總危機——帝國主義的階段，或者根據列寧的解說，就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

帝國主義的時代，就是列寧的時代。

馬克思和恩格斯，除了曾親見過帝國主義時代的最精光的開端以外，並沒有能夠活著親見一切，而他們的著作，却早已指出了整個帝國主義時代的特質。

國際社會主義的領導工作，從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交給了列寧。實際上，列寧

確是負下了這整個時代的工作的，雖則它在一九一七年革命勝利以前，是不曾在國際上公認，在國際上生效。

馬克思和恩格斯死後，在帝國主義的最初階段上，一度對於革命目的表現混亂和弱化的浪潮，曾注入了國際勞働階級運動的内部。社會主義各黨和各工會的廣大的羣衆組織——一八八九年以來「第二國際」和「國際職工同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所組織起來的——)在數量上以及在能力上都大有激增之勢。在一九一四年，「社會主義國際」已經吸收了一千二百萬個份子。但是馬克思主義的綱領，顯然只是名義上的綱領。而且連實踐方面，也日益增多地轉向到「機會主義」去了。那就是說：爲了對方的一些有限的暫時讓步，便已經轉向而謀適應於現存的資本主義政權了。

帝國主義時代的真實特質，在最初，甚至不曾爲許多社會主義者所理解。機會主義的整個理論，就漸漸地在國際社會主義的陣營中滋長起來了。這個「理論」，

把帝國主義時代看做馬克思遺教中的一個爭論點：認爲它是資本主義向新的主命和較高級組織的一種進展，對它的衝突之克服；認爲它是矛盾逐漸消解的時代，認爲它是社改良和大衆生活條件日益增進的時代，認爲它是向社會主義和平進展的時代。對於這些「理論」，「社會主義國際」就給了原則上的駁斥；雖然在實踐方面，這個「理論」還是一天增進一天的佔着優勢。

世界大戰，給了這些幻想以致命的當頭一棒，展開了帝國主義的真實特質：原來，帝國主義時代是一個嚴重危機和爆裂的時代，是一個日益深刻化的羣衆受難的時代，同時也是向無產階級革命進展的時代。

列寧一生的大部分光陰，換句話說，他的積極的政治生活的三分之二的光陰，是在戰前的帝國主義時代用掉的，是在國際社會主義陣營對於革命的誤解和機會主義的深化着的泥坑中用掉的。列寧在爭取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反對機會主義的戰鬥中，逐漸生長了起來，並且逐漸壯大了起來，他又把他所領導着的黨強化起來，準

備實行未來的大戰鬥。

世界大戰，帶來了舊的「社會主義國際」的危機和沒落。曾經由馬克思在很早以前指出的一切矛盾之嚴重的危機和猛烈的爆炸，帶來了對於國際社會主義的重大試驗。浸淫在機會主義里面的舊的「社會主義國際」，頓時在這次試驗之中倒下去了。它實行分裂了，結果，它的主要各黨竟公然地投身於各個參戰的帝國主義膝下，替他們服務了。

這個時期，簡直是現代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人類的運命，本是要從帝國主義所帶來的「毀滅之坑」中脫身出來的，而這時却受縛於國際的社會主義了。以前早已預見了而且爲它佈置了的時候，終於來臨了；數世紀的勞動和犧牲所創造的而且對於危機的到來已有準備了的工具，終於到手了；而這個工具，似乎已經失效用。這整個的勞動，似乎還必須從最低層的基礎上，從目前反對「毀滅勢力」的拚命掙扎中，重新來開始。

雖然如此，國際的社會主義却並不從此完結。一切的力量：推進勞動運動的力量，跟危機的要求相與平衡的力量，以及展開勝利的世界革命的力量，都還在這裏。而這些力量的核心，就是列寧。

馬克思是在一八八三年死的。恩格斯是在一八九五年死的。

列寧就在一八九三年，跨進了他的主要的政治活動的領域，絕不間斷地繼續進行着活動，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他的最後的病歿為止。

目次

發端 列寧的時代……………一

第一章 自誕生至大學生活的時代……………一

一 列寧的家庭及其慈母的感化力……………一

二 幼年時代……………五

三 最優等的中學生時代……………八

四 列寧哥哥的處死與列寧的決意……………九

五 青年列寧的魔力……………一七

六 大學生活之一葉……………一八

九	爲指導者的修養時代·····	三八
第二章 擁護馬克思主義的時代 ····· 三三		
一	全俄勞動團體的礎石·····	三三
二	馬克思主義的擁護·····	三五
三	對經濟派的鬥爭·····	三九
四	人民派的真面目·····	四三
五	天空的一顆新星·····	四六
六	什麼是人民之友·····	五〇
七	病榻上作資本論第三卷的評釋·····	五五
八	出國與勞動問題的發行·····	五八

九 在獄中著作俄國資本主義的發達……………六二

第三章 流刑亡命生活的時代……………六六

一 在流刑地結婚……………六六

二 流刑中大著完成……………七一

三 流刑犯大會的決議……………七四

四 流刑地的新生活……………七六

五 流刑期滿……………八二

六 亡命國外……………八六

七 由火花到火簇……………八九

八 刺摩夫人的回憶……………九四

十一	布爾塞維克黨的誕生	一〇五
十二	兩個策略和給貧農	一一四
十三	蒲列哈諾夫與列寧	一三三
第四章 第一次革命的時代		
一	戰爭與叛亂	一三七
二	一九〇五年	一五三
三	斯大林談列寧的印象	一六五
四	托洛茨基與列寧	一七三
第五章 革命失敗後的反動時代		
一	革命的總決算	一七七
二	一九〇五年革命之肯定的結果	一八一
三	對議會的戰術	一八五

四	對孟塞維克的鬥爭·····	一八六
五	二次亡命·····	一九〇
六	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	一九三
第六章	俄國勞動運動復活時代和帝國主義大戰時代·····	二〇一
一	屹立在新的高潮中的列寧·····	二〇一
二	從巴黎到克拉科·····	二〇五
三	從克拉科到波羅寧·····	二〇九
四	列寧全生涯中的一個轉換點·····	二二三
五	對大戰所持的態度·····	二三五
六	第二國際的死滅和第三國際的生長·····	二三八
第七章	從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時代·····	二三三

二	七月事件前後	三三
三	十月革命的到來	三三九
四	革命勝利初期的黨和農民問題	三四四
五	憲法會議的始末	三四五
第八章	爲布列斯特和約而鬥爭的時代	三四七
一	給國家以和平與休養	三四七
二	革命戰爭派和托洛茨基的罪惡	三五三
三	和約的簽訂	三五五
四	和約的尾聲	三五七
第九章	國內戰爭和戰時共產主義的時代	三五八
一	內戰的爆發	三五八
二	革命對反革命的鬥爭	三六六

五	對波戰爭前後·····	二七〇
四	勝利基礎的總結·····	二七三
第十章	新經濟政策的時代 ·····	二七五
一	新經濟政策的頒佈·····	二七五
二	對資本主義的退却已經終止·····	二七九
三	新建設的必要條件已經具備·····	二八一
第十一章	列寧之死及其不死之處 ·····	二八三
一	晚年的病和死·····	二八三
二	精神不死·····	二八六
三	偉大的遺教·····	二八九

第一章 自誕生至大學生活的時代

一 列寧的家庭及其慈母的感化力

列寧 (Lenin)，即烏拉狄密爾·伊里奇·烏里雅諾夫 (Vladimir Ily'ich Ulyanov)，公曆一八七〇年四月二十二日(俄曆四月十日)，生於伏爾加河畔的新比爾斯克 (Sim birsk) 市——這個城市現在已經改名為烏里雅諾夫斯克 (Ulyanovsk) 市了。他的曾祖父本是一個農民，到了他的祖父手裏，便拋棄了農民生活，遷到阿斯特拉汗 (Astrakhan) 成了一個負擔租稅的小商工階級——一個可憐的裁縫。他的父親伊里亞·尼古拉維支·烏里雅諾夫 (Ilya Nikolaivich Ulyanov) 是一個初等小學的校長，

因其爲人賢明公道的緣故，頗受其周圍的人們，尤其是市村各小學校的先生們所尊敬。這位熱心教育的小學校長，獨自一個人創辦了四百多個小學校，學生的數目總計不下二萬人，因此他便被任爲初等小學校的監督，可是他自己却沒有一寸土地和一所住宅。

在『列寧在喀山(Kazan)的生活』中，列寧的姊姊安娜·伊里尼綺娜·愛麗紮羅瓦(Anna Il'inichna Elizar'va)女士說：『家父身爲小吏，僅於新比爾斯克有一所木造的住宅，但是後來我們一家於一八八七年遷移喀山時，這所房子便由家母賣去了』。

列寧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弟弟。哥哥名亞歷山大(Alexander)，弟弟名多米特里(Domiri)。亞歷山大於青年時即被沙皇亞歷山大第三以謀弑沙皇罪處了死刑，多米特里則還活着在。列寧尚有姊妹二人，姊姊名安娜·伊里尼綺娜·愛麗紮羅瓦，妹妹名瑪麗亞·伊里尼綺娜·烏麗雅諾瓦(Maria Il'inichna Ulyanova)，二人都健

在，祇不過有一個名歐麗茄(Olga)的妹妹，在列寧的幼年時候便夭折了。列寧的母親瑪麗亞·亞歷山特羅夫娜(Maria Alexandrovna)於十月革命的前一年作古了。

列寧的母親是怎樣的一個人呢？斯米爾諾夫(Смирнов)在其回憶錄中敘述道：

『是一八九九年的事情了，我和安德魯諾夫，諾金，柴德爾保姆夫婦，以及茨維資多喬特夫，和大威德瓦諸人同遭逮捕。當時我們是因爲要求超過了勞動者經濟要求以上的言論，罷工，結社的自由，造成了有名的彼得堡紡織工人大罷工而被捕的。我們是被羈押在拘留所裏，在沒有憲兵監視的警察廳裏面，和妻子會面是許可的。在這種會面的某一次，如果我的記憶是不錯的話，我記得有一次在警視總監資伏里央斯基的應接室內遇着列寧的母親。她是爲着來請求可否准許她的兒子列寧由流刑地的葉尼賽縣(Янэсаи)係沿葉尼賽河一帶的西比利亞與外蒙古之間的地方——譯者——到外國去，或者如果不可能的話，便許他轉移到普斯可夫縣的一方面去，她是爲着這件事來請願的。可是從總監室裏出來的資伏里央斯基，以其非常高傲而

輕蔑的態度和震動屋瓦的聲音向列寧的母親怒吼道：「你養出一些餓鬼，不要臉的做出一些傲慢的事情來，已經有一個被絞殺了，又想搓第二個人的繩子嗎？」「是的，我是誇耀着我的孩子們哩」，列寧的母親這樣的回答。她在這一瞬間的態度和充滿着莊嚴的表情，真是難以名狀，若非優秀的藝術家，是描寫不出來的。」

總之他的母親對於列寧是給了非常大的感化的。縱令是很細小的事情，他的母親也是很認真的教育他。有一次，這時列寧已經是喀山大學的大學生了，關於他第一次吸紙煙的事，他的姊姊安娜·伊里尼綺娜敘述道：

『家母對於幼時以及青年時代的伊里奇的不十分良好的健康是非常擔憂的，打算不要他吸煙，可是家母對於年青的人並沒有說什麼關於身體有害而不大會有效果的道理，祇是決然的似乎責備的向列寧叱道：「縱令是一哥比，那也是浪費，自己還不能自食其力的你，應該是做不到的」（我們都是靠着當時母親的恩給而生活的）。自那時以後，伏羅狄亞（Volodya）（對烏拉狄密爾的親暱的稱呼）便一生也不

吸紙煙了。後來家母非常悅意的向我說：「所謂浪費者，祇不過是最後的藉口罷了」。

二 幼年時代

關於列寧幼年時代的情形，在他生時，簡直是毫無記錄。時至今日，我們祇能追懷當時伏羅狄亞·烏里雅諾夫生活的斷片而已。不過從他兒時的照像上看來，使我們可以想像得到伏羅狄亞·烏里雅諾夫是一個活潑的，玩耍的，頭髮卷起的，雙眸伶俐而有一付可愛的視線的孩子。

當列寧尚在襁褓的時候，便有一個名叫瑪琍亞·米哈伊羅夫娜·帕夫羅瓦的老婆婆在他的家庭裏過活着，直至今今，還生存於新比爾斯克。據她關於伊里奇幼時的回憶說：

「他是一個異常活潑而肥壯的孩子，頭髮是極其稀薄而略帶紅色的卷髮。因其

活潑而敏捷的原故，所以常常當着一羣孩子們的大將，並且是非常歡喜爭鬥的孩子。他最高興的遊戲便是把孩子們編成隊伍，他自己指揮這個隊伍，幹什麼呢？他把一羣孩子召集起來，自己喊着「喂，歸隊」。在家裏也常常和妹妹歐麗茄作軍隊的遊戲，他命歐麗茄伏在一張長椅子下面，自己便如指揮軍隊般的用大聲發着號令道：「開步走，一，二。」

『伏羅狄亞喜好買小鳥來養，遇到一個什麼紀念日，便又放去，他喜歡這樣的尋樂。有一次，快將臨到一個什麼紀念日的時候，他跑到他的父母面前說：

「給我三個盧布吧，我要買許多鳥兒，明天我統統放掉哩。」

他的母親說：「伏羅狄亞，一個盧布便足夠了。」到了紀念日的那一天，伏羅狄亞比任何人都起得早，起來以後，便叫家裏的人都起來，和他一塊兒放鳥去。他覺得這件事比隨便什麼事都開心。」

列寧幼時，曾在喀山縣的可庫西諾(Kokushino)村住過，關於當時的事情，託

倍伊哥介紹着可庫西諾村故老們的逸話：

「伏羅狄亞從市上帶回許多塗着各種顏色的簇藜來作戲。但是因為他有着金屬製的簇藜了，所以他是後便不大爲其他的孩子所敗了。」

「可庫西諾村的孩子們所玩的遊戲、在年幼的伏羅狄亞看去感到非常興趣。除簇藜的遊戲之外，他最喜好的要算是以桶箍製成的弓戲了。他拿着這樣的弓跑到田野間或山廟前，和其他農家的孩子們同樣的，射鷄爲戲。一到春天，牧場開始夜飼，牧者往往驅馬至四五俄里外的原野去找尋適當的牧場。可是在兒童讀物中對自然常常懷着憧憬的伏羅狄亞爲「溪林」之遊的魅力所吸引，所以他屢次揮動其辯舌請求年長的人們攜帶他同去。」

「帶我一同去夜飼吧。我替你們燒茶，替你們挑鍋和糖，替你們打柴哩……」

「伏羅狄亞，你年紀還小，不行呀，樹林裏面有狼有熊，有妖怪出來要把很小的孩子抓去哩！你不可以同去啊。」年長的人們都這樣的阻止他去。

但是，伏羅狄亞鼓起勇氣，不聽阻止，便跟在後面隨着他們同去夜餉。

三 最優等的中學生時代

和關於入學以前的列寧沒有什麼記錄一樣的，關於學校時代的伏羅狄亞·烏里雅諾夫，直到現在，所記錄的也是很少。列寧九歲時便進了新比爾斯克中學的一年級，但是他的才能即刻爲人所注意，並且爲人所稱道，然而把他當做一個從順的靜肅的，所謂「模範青年」來描寫，却不得其當。反之，正如同他的姊姊所追懷的，他是一個「勇敢的頑皮的傢伙」。在伏羅狄亞·烏里雅諾夫的意識中，少年時代，便已經被關於革命，和專制政府鬥爭的一些逸話所浸潤了。看起來穩重而多羞澀的中學生，從幼年時代起，便已經思考着鬥爭的事情了。因此在許多的人們之間，或許有以爲中學時代的列寧是一個羞澀而孤獨的孩子；但事實上，當他讀畢中學的時候，還取得了優秀的成績和獎狀。當時的中學校長便是主持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臨時

政府的亞歷山大·克倫斯基 (Alexander Kerensky) 的父親 F·克倫斯基。假若沒有這張獎狀的話，那末，烏拉狄密爾·伊里奇·烏里雅諾夫或許進不了大學也說不定，獎狀上的褒詞是這樣的寫着：

『具異常之雋才與勤勉而謹誠之烏里雅諾夫，位居全級之首，值此學業完畢，成績操行俱列最優等，故特授與金牌，且於校內校外，曾無一次為家長及師友非難之言行。』

據列寧的姊姊安娜·伊里尼綺娜說，伏羅狄亞除一次也不會招致過長輩的不滿這句話以外，這張獎狀上，褒詞的大部分的確都是事實。

四 列寧哥哥的處死與列寧的決意

列寧的哥哥在聖彼得堡被捕的消息傳來，他還在中學校就學中。當時的革命黨——「人民意志」黨 (People's Will Party) ——與沙皇政府之間，頗多激烈的鬥

爭。「人民意志」黨，是在當時的社會主義者們長時間的和平活動與在農民之間宣傳以後，於一八七八年創立起來的。「人民意志」黨的人們威信：所有的農民都是先天的社會主義者，都屬於他們的黨派，如果要說明如何始得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的話，那末他們的回答便是農民本身會建設的。可是他們也知道當人民派（Populists）『到民間去』的口號叫出來的時候，在許多場合，農民們還是不理解他們的，同時，因為要將農民困苦的生活公開向農民說明的一切計畫，又為沙皇政府所監視，所以他們深信在國民解放的道路上，是有一個沙皇獨裁政府這麼一個大的障礙在橫阻着。即令是和平宣傳吧，但有時因為沒有得到官廳的許可，社會主義者雖然散發一張簡單的文告，也是要被捕下獄的，甚而至於被放逐或流刑。當時，民衆之間還沒有革命鬥爭的訓練，鬥爭往往個別的進行於少數人之間。因此，他們始召集大會，組織「人民意志」黨，決定了以驅逐昏聩狠毒的羅曼諾夫（Romanoffs）王朝為任務。可是不久，政府為答覆「人民意志」黨的恐怖起見，也使採取了極端的恐怖政

策，即對「人民意志」黨的黨員，動輒處以死刑。政府對於彼輩，絲毫不稍寬貸，即連對於一個年方十五的青年羅佐夫斯基，以貼一張告民衆書之罪，也處以死刑。

列寧的哥哥，亞歷山大·烏里雅諾夫，是一個高大的，容貌端正的，嚴肅的，富於幻想的，好學不倦的，對於自己所有的責任是嚴格遵守的孩子，是列寧幼時的偶像。當伏羅狄亞的兒時，他總是拿他的哥哥的行爲做藍本，亞歷山大遊戲了，他也遊戲，亞歷山大工作了，他也工作；甚至連吃粥時，粥中究應放牛奶，抑應放奶油，他都要看亞歷山大的行爲，或者以哥哥的回答來做自己的模範。因此兩兄弟形成了極其親愛而融洽的手足，而亞歷山大也便是列寧青年時代的唯一的好朋友。

他們的父親死後，亞歷山大已經就學於聖彼得堡大學了。這時候亞歷山大便參加了在這個首都中的許多革命的學生團體。那個年頭——十九世紀的八十年代是俄國最黑暗的最反動的年頭，特別是加之於大學校的反動尤其猛烈。動輒改變學制，委派監督以「監視」學生們甚至於教員們的政治的和社會的活動，監督們視他們自己

不啻是——事實上也便是——警察的代理人。而當時以行動來反抗這種反動的也正是學生。亞歷山大更是拋棄了他的科學的生涯，教授的企圖，與夫光明的未來，英勇的提供其肉體和靈魂於反抗專制的革命鬥爭，成了籠罩俄國之智的外貌改變的徵兆。他雖然是「人民意志」黨的領導分子之一，但他和轟炸冬宮沙皇亞歷山大第二的餐室的木匠斯蒂芬·哈爾帕林 (Stephen Halperin) 一樣，較其他恐怖份子的同伴們，要更接近工人份子。他讀過馬克思的資本論，他並且同意馬克思的社會發展的分析，覺得比他替「人民意志」黨所起草的綱領要清晰得多。他在彼得堡的工人羣衆中幹着教育工作，一如其弟弟後幾年所幹的一樣。但是依照他們的黨的決定，他還是不得不勇敢的進行其轟炸沙皇的準備。他已經是在他的過去和將來——人民主義和馬克斯主義——的半途上了。

在一八七九年，「人民意志」黨發生裂痕。那些依然從事於地方羣衆工作的，形成了「黑色再劃分」派 (‘Black Revision’)，主張土地革命與土地再劃分，他們的領

袖便是蒲列哈諾夫 (George Plekhanov)。不數年間，這一派成了正統派馬克思主義者，意圖在俄國創立「社會民主工人」黨 (Social Democratic Working-men's Party)。恐怖主義者則依然守着「人民意志」黨，其領袖如季爾雅波夫 (Jeljabov)，哈爾帕林，蘇斐亞·皮羅夫斯卡亞 (Sophia Petrovskaya) 等也都是富有勇氣和能力的人。他們的革命意識告訴他們，非在工人中尋覓同盟者不可，並且季爾雅波夫也曾打算辦一個工人新聞，和創立一個工人的黨，但是他們的最好的力量却用於對沙皇作神聖的復仇。哈爾帕林在一八八一年的二月轟炸沙皇亞歷山大第二的餐室失敗了，後來便決意要在途中再圖襲擊。果然於三月一日適值沙皇乘車由教堂返宮時，大功告成。然而這還是不能改革國家的制度，並且，人民反而更受慘酷的壓迫。繼亞歷山大第二的是其子亞歷山大第三，是一個較其父更爲暴烈而封建的帝王。他鑒於其父橫遭慘死，便頒佈更嚴酷的制度，對於農民是橫加鞭笞，對於「人民意志」黨則圖澈底肅清，以洩其怒憤。加之，當時俄國還沒有一個擁有多數工人和農民的政黨，於

是「人民意志」黨的黨員遂不得不單獨進行可怕的孤軍之鬥，與專制政府作勇敢的個人的不自量力的肉搏。亞歷山大·烏里雅諾夫便是這少數同志中決心要繼續作此不相稱的血鬥的一個。然而也就因為這個原故，「人民意志」黨的執行委員差不多全被逮捕了，並且都被處以死刑了。亞歷山大·烏里雅諾夫終於也被逮捕，那是一八八七年三月三日的事。當這個消息傳到十七歲的列寧尚在就學的新比爾斯克，家人們都沒有誰敢告知他們的母親，然而列寧當時却由於人們的這一個畏懼得到了一個極其深刻的印像，並且取着極其嚴肅的態度，將這可怕的消息告知了他的母親。從這裏可以看出，列寧在那個時候，便已經能臨艱難而出以沉着了。

關於當時的情形，列寧的妹妹瑪麗亞在最近的列寧紀念講演會上演說道：

『烏拉狄密爾·伊里奇之具有非常的天才，同志們想來都是知道的吧，但此外，他還具有一種一旦決定一個目標，便以確固不拔之力而前進的特質。他在中學的時候（列寧是十七歲畢業於中學的），便將每天晚間的時間，用之於讀書和作其一

生事業之革命運動的研究。特別爲我所不能忘記的，是當他中學畢業後未去聖彼得堡以前，和我們一塊兒住在喀山以及撒麻拉(Samara)的時代。一八八七年的春天，在我們得到長兄死的消息那一瞬間，烏拉狄密爾·伊里奇說：「不，我們不用那樣的方法，我們非用別的手段不可」這兩句話時的表情，留給了我一個不可磨滅的深刻的印象。自是以後，他開始向着他所相信的，取得專制和資本束縛下的解放之唯一正確的道路上前進，並專心研究了。

「當我們住在撒麻拉縣的鄉間，烏拉狄密爾·伊里奇，每天總是在早茶以後，便抱着書本辭典和筆記簿子，去到庭園的一個角上，那裏有椅子和桌子，伊里奇便在那裏研究個大半天。他不僅是讀書而已，他並且要討論，精查，整理，筆記下來。那時，我爲着要和他一塊兒學習語學，常到他那地方去。我還完全是個小孩子哩，然而我亦不能不爲他對工作的精力之強和循規蹈矩的情形所驚。他的認真，在那時候就已經有不足爲手之概。他差不多終日手不釋卷，祇不過是在散步的時

候，或者在和他相同的研究革命的青年同志們的小集會上，書本暫時離開一下他的手而已。他的這種精力，這種頑強，他一生都不會消失過。雖然是在流刑中，或者是逃亡國外的時候，他也要把他所有自由的時間消費在圖書館裏面。我們的手邊還保留着他的許多手稿，觀此，便可以知道伊里奇一生是讀破了並探究了如何多量的普遍於各部門的文獻啊。」

這些話和當時住在列寧家的帕夫羅瓦老婆婆在追憶到十七歲的列寧對他的哥哥亞歷山大的處死所取的態度時所談的話，是完全一致的。那位老婆婆說：

「亞歷山大·伊里奇的事件，我是什麼時候也不會忘記。那個時候，在她的聖彼得堡的家裏，的確有一個姪女維萊台尼可瓦一塊兒住着。當時是由她打來了一個電報，說：「叔母速來，兒輩危險」。那正是三月間，道路最壞的溶雪的時節。新比爾斯克不通火車。祇剩我和孩子們在家裏。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安娜·伊里尼綺娜（列寧的姊姊）和亞歷山大·伊里奇的身邊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後來祇聽到烏拉狄密

爾讀着電報，說誰被流刑，誰被處死。繼之，他獨自又說：「我的哥哥也被絞首了」。我們聽到這話都哭了。但是烏拉狄密爾·伊里奇對於這悲慘的消息並不報以一滴眼淚。我正在奇異。祇聽他說：「什麼，我哭嗎？哭又有什麼用呢？我非復仇不可」。當時我真不解烏拉狄密爾·伊里奇要向誰復仇。從那時以來，他便始終變成若有所思，憂鬱，拚命的讀書，常常關在房間裏面不出來的樣子了。」

五 青年列寧的魔力

年青的列寧給了他們的同輩什麼影響呢？和他在中學同學的D·布休埃夫說：

「不論是在公園裏散步的時候，或是在溜冰場上，或是隨便什麼地方，祇要一有集合的可能性，我們幾個要好的同伴便集合起來。在這裏，列寧便提出了關於民主主義啦，農奴所有權啦，勞動階級的慘狀等等的問題。同時也便呈現出活潑的討論。從那時候起，列寧就已經具有向他人立證自說之真實性的力量，不論什麼時候

候，總是把他的同伴們說服下去。這種集會雖是偶然的性質的，但參加者的頭腦却常爲未來的社會事業所吸引，在討論之後，更留下一個難以消逝的印象。可是，我們的集會上若是一旦不見了伏羅狄亞·烏里雅諾夫呢，那立刻就會影響了集會的精神，就不會呈現活潑的姿勢，總是無結果而散。他的那種特殊的感化力和豐富的組織力，不論是在遊戲的場合，或在青年們之間認真討論問題的場合，總是成了一個中心的力量。學生們都被伏羅狄亞·烏里雅諾夫的魔力所吸引。直至一八八八年列寧離去中學進了喀山大學法科的時候爲止，這個時候以前我們的生活，是這樣的過去了的。」

六 大學生活之一葉

一八八七年列寧畢業於新比爾斯克中學，但是未蒙許可昇入首都的大學，蓋因惟恐其仿效他的哥哥的行爲，或者要爲他的哥哥的處死復仇的緣故。他的姊姊安娜

關於列寧非入喀山大學不可的事情，有這樣的說明：「那正是家兄亞歷山大·伊里奇在彼得堡受裁判和死刑的年頭。這件事情在當時引起了非常的衝動，其影響是普遍了我們整個的家族，我們的頭上自然也蒙到了大大的危害。不消說，官憲對舍弟伊里奇是抱着深深的疑忌。他簡直有任何大學都不能進的危險。」

一八八七年七月十一日，列寧報名投考喀山大學的法科。因為他曾經受過中學校長親自給與的最優等的褒獎，謂「烏拉狄密爾·伊里奇為宗教的精神所教養，對於長上一向從順」，所以於八月二十五日便得許可入學。因此，當時烏里雅諾夫的一家也便移往喀山居住。可是警察對於烏里雅諾夫的一舉一動，依然是加以監視，於八月中旬便已發覺他和當時的革命家團體費多賽夫(Н.Е. Федосеев) 派有聯絡。事實上，當時的大學生們是成了革命團體之主要的柱石，並且從這裏面常常湧現着新的力量，所以一般的學生總是為嫌疑的眼光所側視。加之，自從對亞歷山大第二和亞歷山大第三的暗殺計畫被發覺以來，對大學生們的壓迫，以及對於他們之間的

自由思想的鎮壓是日甚一日。大學校簡直被密探的洪流所淹沒了。不論是教授也罷，學生也罷，祇要稍吐自由主義的言辭，便立刻爲人所密告。大學生住宅的被搜查，大學生之檢舉，受流刑，幾乎成了家常便飯，日有所聞。可是，正因爲如此，倒反而使得他們之間的親密愈益加濃，使得他們不得不走向革命。列寧的姊姊安娜回憶當時的情狀說道：

『所謂「學生騷動」的波濤，自十一月起便已襲至所有的大學，喀山這方面也如飛火般的襲來。喀山大學的學生們於十二月四日召集會議，在騷擾之中要求學監出席，始終拒絕解散集會。學監一露面，學生方面便提出各種要求——不純是有關學生問題的，即便是政治的要求也提出了。當時舍弟曾將這次衝突的詳細狀況告訴我，現在我雖然不能完全記憶，但根據爲舍弟的事件奔走的家母回來告訴我的話，記得學監指伏羅狄亞是該事件的首謀者之一，是他立在最前線，非常興奮的揮着拳頭。伏羅狄亞終於十二月四日晚間在家裏被檢舉，全數共約四十人，同遭拘禁數

天。後來全被驅出喀山境外。」

據列寧自己把這個故事告訴他的老同學，當他被帶至裁判官前，那裁判官以其仁慈的愛護的態度問他：「你爲什麼要作亂，年青的孩子？不知道你是碰着壁嗎？」

「是的」，這「年青的孩子」回答，「那是碰着壁，不過那是行將崩潰的牆壁，推之，便可以跨越而過哩。」

七 孤獨的放逐生活

大學生烏里雅諾夫被放逐至離喀山有四十俄里的一個名叫可庫西諾的鄉村。在那裏，他和姊姊安娜同在警察的監視之下度着時日。警察簡直不許他們越雷池一步。據可庫西諾村的農民追憶當時的情形說道：

「他們受着放逐和壓迫而到這裏來消磨時光。據說他們是不許住在城裏的。那好像是從他們的哥哥亞歷山大·伊里奇受死刑的風說傳來的時候起。納瓦河(Nova

River)上安置了殺人的機器。據說亞歷山大就是被用那個機器倒吊起來，然後再放下水去的。不久，烏拉狄密爾·伊里奇和安娜·伊里尼綺娜也被監禁起來，因此列寧的母親瑪麗亞·亞歷山特羅夫娜那時是非常的悲痛。」

列寧的姊姊在學生事件的不久以前，是被宣判送往西比利亞受五年流刑的。後來因為她母親的請求，纔將她的西比利亞流刑，改爲放逐至鄉村過警察監視的生活。是後不久，列寧的母親便也遷至該地同住。那時候的生活狀況，安娜·伊里尼綺娜有如下一段的敘述：

『我們沒有任何樣的隣居，完全在孤獨的情態中度過了冬天。祇有一個族兄來訪問過一兩次，此外就祇有監視我們是不是安分守己的住在那裏，以及有否向農民宣傳情事之義務的地方警察，常來探望探望而已。我們所見得到的人們祇不過這些。烏拉狄密爾·伊里奇倒讀了許多的書，在這一排連串的房子裏，我們的死去了的讀書大家叔父的書架上，塞滿了書籍和雜誌之類。此外，我們也是喀山圖書館的

借書者，借些報章來看看。因此之故，從城裏來的郵差，對於我們該是何等的重要啊！我們是如何的渴望着他打開那盛着書籍，報紙，信件的箱籠啊！那郵差回去時，同樣的，也是將許多讀畢退還的書籍和信件裝進箱籠，託之攜去。那時郵遞的情形便是如此。某天的夜晚，我們因為要寫信，大家坐到案前，但是平時素不寫信的伏羅狄亞，也被我看見好似非常緊張的洋洋數千言的寫着什麼。郵差的箱籠裏已經裝滿，而母親和孩子們也已經入寐了，可是伏羅狄亞和我還是照常的在坐着。我問他寫信給誰？他回答我說，寫給一個在南俄某大學讀書的中學同學。根據他的回答判斷起來，信中好像是寫着關於喀山大學學生運動，對於學監和官憲的一些激越的言詞。那末我便問他，這對於南俄某大學的那一方面是怎樣呢？我向他說，寫這一類的信是沒有什麼裨益的，祇是又要招來一些新的迫害和損失而已。可是關於這樣的事，要想轉過他的心來頗是不容易的事。他說那不過是我的杞憂而已，他依然絲毫無轉意。這時我便正色的向他說，你寫給朋友這樣內容的信，豈不是陷朋友於

危險嗎？伏羅狄亞聽了我這句話，考慮了一下，終於決然的同意了我最後的意見，走進廚房，似有不捨的樣子將那封信燬棄了。是那時以後的某一個夏天的事。他的一個族妹談着某一個問題的時候，還很感謝我的忠告。這是他將藏於篋底的信件取出讀後，便燬棄了的時候的事。

『伏羅狄亞在可庫西諾村，讀書之餘，還從事對他弟弟的教育。一到冬天，便穿上雪靴，攜着獵槍，出外打獵。這是第一次拿起獵槍，但是他的獵事却並不高明。他和他二位弟弟一樣，似乎沒有「獵人魂」。送別了無聊而孤獨的寒冬之後，又是早春，這對於住在鄉間的我們，是我所最不能忘記的第一個春天的季節。在遠遠的飾着麗霞的空中，雲雀兒不絕的在鳴着，在身邊的田野間，溶雪中透出青芽來。到現在我還，能記起那時節我和弟弟長時間的散步和談話。』

八 資本論的研究

安娜女士接着說道：

『自一八八八年的秋季起，伏羅狄亞得到許可和母親一同住在喀山，於是舉家又復遷回。我那時却仍留於鄉間，直至晚秋時分始准回到喀山。我們便賃了一所靠近阿爾斯基原，面臨伯羅囉亞·哥拉街的奧魯羅瓦家的，一所三層の木造的房屋。那裏面有非常雅緻的花園和露臺，不知爲什麼，那房屋的樓下會有兩個廚房，而其中有一個是離開了本屋的，因是，伏羅狄亞便佔領着這個隔離着的廚房。他在那裏開始讀起馬克思的『資本論』來。並且非常入神而興奮的讀了一本又一本，讀後，還來說給我聽。他從此逐漸的交遊廣闊起來，但他不大邀約朋友們到自己家裏來，總是自己出去訪問他的朋友，所以我們也不大知道他的朋友究竟是什麼人，姓什麼叫什麼。可是他對於母親，不論什麼時候都是非常的小心翼翼的。因爲其他的人們對於他的母親，具有能夠忍受喪失了長子之不幸的勇氣，莫不加以驚嘆和表示尊敬。即連我們孩子們也深深的感覺到母親以一己的毅力支持着自己。據康斯坦娣諾

芙娜 (Konsta tinovna) 說，伏羅狄亞也會向她說過關於母親具有可驚的能忍受哥哥亞歷山大和妹妹奧麗茄之死的毅力的事。」

從新遷回到喀山的列寧，和當時研究馬克斯之社會主義的革命團體費多賽夫派及其他的團體，又取着了聯絡。當時的列寧之受警察和憲兵的注意是顯然的事，因而他和大學的關係畢竟未能順利的聯繫起來。他向喀山大學要求受畢業試驗的請願書也被拒絕了。然而，一八九一年，他終於取得許可，往彼得堡（現在的列寧格勒）去受試驗，結果，於是年法科的試驗及格，獲得候補律師的稱號。據當時知道列寧的人說，他當時已經是相當的在研究着馬克思的學說，而成爲一個熱心的馬克思的信徒了。列寧的感化和修養的某些部分是從他在喀山與夫後來在撒麻拉，參加了一個秘密結社所得來的。這秘密結社的首領，便是列寧常與往來的馬克思主義者費多賽夫。他是一個顯然的悲劇的人物，他的學說在俄國歷史上有幾種名著，爲他的門弟子們手記下來，熱忱的去攻讀。列寧也是其中的一個。

這時候，有一個在喀山幹着鬱悶的地下室的燒餅店內工作的青年夥計，名叫皮雅斯可夫(Пысиков)的，他簡直很少能乘間休息一下的在那熱而醜的地窖裏面工作着。然而他却在喀山的工人中担任着宣傳任務。皮雅斯可夫也曾受過一種原始的『大學』訓練——一種沿伏爾加諸城鎮以黑海沿岸的流浪工人的訓練。在喀山，他遇着了費多賽夫，並且在他的影響之下開始研究馬克思。他整整的在喀山費了不幸的四個年頭，造成了他的書本知識的基礎。他離開喀山是在青年烏里雅諾夫來到的不久以後。他們倆在幾年後又復相會，於是便結下了終身的友誼。這青年燒餅夥計是誰？便是今日為全世界勤勞大眾所熟知的馬克西姆·高爾基(Маким Горький)，所謂「辛辣的」馬克西姆(Маким 'e litter')。

一八八九年的初夏，列寧又和他的家族遷移到離撒麻拉市約五十俄里，屬撒麻拉縣的名叫阿拉開夫卡(Алкаевка)的鄉村中去。這次的移動，對於列寧可謂正好。假若列寧這時不離喀山的話，難免又要因有費多賽夫革命團體的關係而被逮

捕，因為那時這一團體的全部團員都遭逮捕了，他在阿拉開夫卡村知道了這個消息。是年秋間，他又遷往撒麻拉，他在那裏繼續其馬克思的研究，同時準備受國家考試。這時，他還是參加着當時存在的各種革命團體。

九 爲指導者的修養時代

據熟知當時列寧的葛爾標瓦·雅斯萊瓦女士的敘述：

「我很久以前就已經認識烏拉狄密爾·伊里奇了。一八九一年我和他相識的時候，他正在研究馬克斯。他真是一位勤勉的青年。他的那種超人的活動才能，的確使我吃驚。這位青年列寧在那時便已經能以有條理而細緻的思想，銳敏而精確的語調給與回答，誠如受了鍛鍊的鋼鐵一般。」葛爾標瓦女士的這幾句話，還是在列寧未死以前寫下的。是後，女士又詳細的敘述其對列寧的回憶，把烏拉狄密爾·伊里奇之爲人，即在當時便能對革命運動上許多重要問題給以正確意見的列寧之爲人，

描寫得非常恰當。她說：

『我是一八九一年纔和他相識的。他已經被喀山大學開除，由喀山市被放逐，和其家族一同住在撒麻拉。當時他所常穿的衣裳是一件藍色棉布橫領的俄國式的襯衫，上面束一根綱帶。他所常做的工作是深刻的，真摯的，確固的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我一年之間有好幾次去訪問烏里雅諾夫的家庭，每次都遇着烏拉狄密爾·伊里奇。這便是他走向未來的世界革命之指導者的修養時代。自然，那時候他也尚未想到自己將在歷史上要扮演一個怎樣的角色；但，這毋寧說是他的喜好探討的智慧，使他對他的人生上的課題，不得不力求解答的時代。而他是立刻求着了解答的。在那個時候，烏拉狄密爾·伊里奇便已經對於其所有的工作這樣的努力和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是我所未曾發現過的。直到最近，我還是認爲那是與生俱來的天性吧。然而最近從他的姊姊安娜·伊里尼綺娜方面知道，烏拉狄密爾·伊里奇在中學時代，並不是怎樣特別用功的孩子。這無疑的，是以他的優秀的才能，造成了一

切的事情都容易起來。據安娜·伊里尼綺娜說，他直到中學的最後一年的左右，他的喜好探討的素質才始表現出來。伊里奇爲着研究馬克思，簡直是自朝至暮都獨坐在他自己的房間裏。祇不過偶爾玩玩軍棋，或和他的小妹妹瑪麗亞·伊里尼綺娜談笑談笑而已。

『烏拉狄密爾之研究馬克思，並不是遠離着實際問題的。他的書桌上除馬克思的文集以外，雖然是不多，但總還有些反映俄國之實體的統計材料。後來，到了一八九四年的光景，彼得堡的同志們替列寧起一個綽號叫做『老夫子』，這就是因爲他的引證必須附以數字的原故。在那個時代，他也會努力於瞭解俄國革命的過去，有時他也到被放逐至撒麻拉的「人民意志」黨的老黨員或者人民派的人們家裏去談談天。我所屬的俄國買可賓黨，即布朗葵主義者(Brangist)的革命思潮，伊里奇對之也頗感興趣。這裏，我倒想起一個小小的插話，這對於我雖不算是怎樣的一回事，但在伊里奇却頗有意義。我比他年長九歲，但在我和他相識的時候，我是在政治運

動上已經有了十年歷史的前輩了。一切的職業也都是如此吧，對於指導青年團體的我，對於已經能對人類作出一定的常套的青年人們，尤其是如此。我對烏拉狄密爾·伊里奇也使用起這種常套來。這實在是侮蔑了他。可是我立刻就感覺到，與其說這位青年用一個什麼特別的代價，使我教訓他，毋寧說我倒爲他所教訓。

『想起和烏拉狄密爾·伊里奇的談話來，我現在得到一個比以前更切實的結論，那就是他在那時就已經具有了普羅列塔利亞獨裁的思想。他關於無論如何我們非指導不可的「人民」，具有不同的意見。他熱心的說明，所謂人民者，不是一個同種類的東西，是由具有不同利害的階級而成立的。烏拉狄密爾·伊里奇在這個時候就已經參加實際的活動了，並且他的周圍也已經結成了追隨他的青年團體。』

青年列寧是具有這種牢不可破之確信的一個人，具有克服其周圍環境之堅強的性格，在他的人生上前進着。當時，還不過是一個青年的他，便有了堪爲未來世界革命之指導者的本質，和他的朋友們對於這位年青的同志所不得不給以「老夫子」之

批評的偉大的力量。

第二章 擁護馬克思主義的時代

一 全俄勞動團體的礎石

那時候，「人民意志」黨的殘餘，已經被澈底掃蕩了。在專制的俄國從事於勞動階級解放運動的人們，莫不凝集其深思於如何方可達到目的這件事情上。唯一的期待，祇好期待於那些在拼死也要打破地主權的情緒下，逐年抬頭起來的農民們絕望的暴動了。然而結果，這依然沒有給他們一個怎樣的出路。也沒有統一這種隔離着的農民暴動的一個中心。並且誰也不會相信「人民意志」黨員用炸彈手槍，個別的進行鬥爭能有什麼效果。勞動者和農民的頸項上是嚴緊的被束縛着。在這樣淒慘的沉

默中的國民生活，祇有日漸趨向不堪其苦。在這個時期之內，覺悟到勞動階級，都市的普羅列塔利亞，却已經走上了獨自鬥爭的道路，而站在解放運動的前線，認為非把整個的勞動階級領導到和專制政治——資本家地主的政權——鬥爭的戰線上去不可的人們，在這裏面也多呈現出來。於是，連在彼得堡尚持有一個秘密印刷所的「人民意志」黨殘餘的分子，也開始援助在勞動者之間做革命活動的人們，提供其印刷所作他們的宣傳文件和書籍等的印刷。然而，他們總是不能澈底的理解當時的俄國可以發生怎樣的事變。

在七十年代的中葉，即一八七五年，俄國南部，有一個大的勞動團體「南俄工人聯盟」被創立起來。這個聯盟，是以獲得政治自由為目的的。他們正確的理解了若沒有政治的自由，則勞動者團結起來完成經濟變革的事是不可能的。惜乎參加聯盟的大多數不久都被檢舉，而團體也就自歸消滅了。可是在一八七八年，彼得堡地方又有一個另外的團體，即「俄國工人北部聯盟」發現出來。這個聯盟的建設者，已

經不是智識階級，而是勞動者的鎖工威克特·奧勃諾爾斯基 (Victor Obnorski) 和木匠斯蒂芬·哈爾帕林。他們自認爲這個組織就是全俄國勞動團體的礎石。逾時不久，他們就吸收了有二百以上的工人羣衆加入了這個團體，隨即發表了「告俄國工人」的宣言。在這宣言中，北部聯盟主張，重要的任務是現存經濟制度的變革，和整個生產機構與產業機關轉變爲勞動合作。祇有這個聯盟，纔是正確的理解了應當怎樣把爲政治自由的鬥爭，和爲社會經濟變革的鬥爭統一起來的第一個團體。聯盟首先認政治自由的獲得爲必要。這個聯盟給了未來的勞動組織一個偉大的刺激。自此以後，革命家們和理解怎樣鬥爭，爲什麼應該鬥爭之進步的勞動者提攜，便不困難了。

二 馬克思主義的擁護

爲什麼馬克思主義會在當時的俄國發達起來？這件事情在今日看來，是非常的

明白。

在本國開始感覺到狹窄的外國資本家們，爲着投下資本於俄國的各種大小工業和鐵路建設等，使得俄國的資本主義迅速的發展起來。這又招致了工廠製造場的增加與擴大，並造成了大多數的勞動羣衆之向都會，工廠，製造場的集中。俄國的普羅列塔利亞便在這個時期裏面日漸的堅強起來，並且隨着資本主義之急速的發展而勞動者也感覺到自身反日陷於窮困，而至於非一致起來要求改善待遇不可。在這裏，勞動階級在經濟鬥爭上，不僅單獨和資本家階級發生衝突，並且爲取得農民爲其共同鬥爭的同盟，爲農民爭取土地的鬥爭，也和封建地主及其代表者沙皇專制政治鬥爭，即由經濟鬥爭擴展至政治鬥爭。而同時，關於革命指導者的任務，列寧在其最初的小冊子『什麼是「人民之友」的書上，已經敘述得非常明白。他說：『社會民主主義者要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和自己所有的活動傾向於勞動階級。這個階級的前衛代表者應當把握住科學的社會主義和俄國工人之歷史的使命，要把這類的思想廣

泛的一般的普及起來，在工人之間造成強固的團體。並且如果使得工人的目下不統一的經濟鬥爭轉化為意識的階級鬥爭，則俄國的工人將成爲一切民衆的先鋒隊來推翻專制主義。這樣，俄國的普羅列塔利亞（和全世界的普羅列塔利亞站在一條戰線上）纔能向着社會主義的勝利，進行公開的政治鬥爭。」

這樣的，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時，俄國的勞動階級經過和資本主義與專制政治的鬥爭，漸次的自覺到階級的意識。他們也如同西歐的工人一樣，漸漸的接近着馬克思——昂格斯的學說，吸收其科學的社會主義。於是馬克思主義便大大的流行起來，不僅勞動階級，革命的知識階級，卽令是布爾喬亞階級的代辯者的教授們，也談起馬克思主義來。但是另一方面，在當時的俄國，還是主張變革專制政治，消滅貴族大地主的權利，儘量的給與工廠主及其他資本家階級以多的權利的這種知識分子居多數。他們主張非以代表布爾喬亞階級的民主政治來代替貴族的專制政治不可。一句話說來，他們是希望在俄國能建立一個英國式的布爾喬亞國家，或

美國式甚至法國式的共和國。因而，不消說，熱望着政權的新興布爾喬亞便利了這班知識階級。所以，在這些知識階級中的布爾喬亞分子，也理解馬克思主義是正當的學說了。然而他們却沒有忘記，馬克思主義對於工人，是和布爾喬亞鬥爭之有力的武器這件事。所以他們一面又努力於宣傳馬克思是一個毫無用處的學者，他的一切著作都不過是空洞的法螺而已。他們以及布爾喬亞的教授們都專以攻擊馬克思爲能事。因此，當時以列寧，蒲列哈諾夫爲領袖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便不得不出而擁護馬克思主義了。

也有人認爲，馬克思主義是我所承認的，但是不適用於俄國。他們熱中於要從另一方面來處理馬克思學說和勞動階級。他們說：『馬克思學說是正確的，但不是絕對的，那是難以適用於俄國的。俄國應當放在完全特殊的條件之下』。又說：『勞動階級，他究竟是在什麼地方？在俄國，勞動階級沒有那樣的力量，也沒有如在其他各國一樣的那樣的力量，我們國家的發展方向，迥然與其他各國不同，在我們國

家內，建設獨立的勞動黨是不可能的事。」自稱『爲勞動階級和農民謀幸福』的他們，努力用這樣的手段來卑俗化並毀損馬克思的學說，要把這個學說的鋒芒磨滅，成爲無害於他們自身的東西，要把牠改造成爲自己手製的合乎自己需要的東西。爲着這個原故，專制政府也就許可他們發行雜誌，他們便在這個雜誌上，用馬克思學說的名義，恣意作上述的曲解。但是，政府之不許可科學的社會主義創設者馬克思，昂格斯號召勞動階級起來對資本來進行鬥爭的『共產黨宣言』出版，依然是一貫的。僅僅乎准許馬克思學說的批評，馬克思學說的誹謗，以及爲着這個目的的各種超特作品，則不論多少都一任其猖狂。

三 對經濟派的鬥爭

在這裏，我們不能不特別提起，祇要馬克斯的弟子們一旦發現了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性，那末人民派立刻就開始反攻。縱令這些馬克斯主義者完全是反革命

的，例如斯特魯威 (P. B. Struve)，巴拉諾夫斯基 (Tougan Baranovsky)，他們也指出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不論人民派或者其他任何人喜好與否，那總是必然的。因為舊的革命家的流派，都是在人民派的見解之中成長起來，並且被認為是人民派，所以政府也就默許了馬克思主義者在合法的雜誌上登載反人民派的論文。不消說，追隨馬克思的弟子們，真正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也都參加了這些雜誌。不過他們實在是難以下筆了，因為要混過檢查官的毒眼，他們又不得不巧妙的把自己的思想隱晦起來。但是在這合法的雜誌上，他們是收獲了一些效果的。當時在「馬克思的假面」之下專事捏造的斯特魯威，巴拉諾夫斯基等輩，在一部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之間，不但具有權威，即在俄國的勞動團體之中，也還有些為他們所誘惑的人們。他們是向經濟主義的道路上開始誘惑的，因為他們認為勞動階級的運動，祇在於由經濟鬥爭取得資本家各種經濟的讓步，至於政治鬥爭，那是在推進資本家社會發達與進步的布爾喬亞派所應當採取的行動。這種思想，在經濟派的雜誌「勞動問題」

以及「勞動者的思想」上被展開來。然而列寧對於這樣的思想，也認為是和在政府許可的雜誌上，破壞馬克思的思想，曲解馬克思的思想，作不正當的改造等行動是一樣的，不得不與之作猛烈的鬥爭。

在包含着如庫斯可瓦(B. Kuskova)，普羅可婆維支(Plokopovich)這些馬克思的冒瀆者中，還有些人們，在列寧的流刑時代，便已經寫作了經濟派的「信條之象徵」一本小冊子。列寧以拉丁語(Credo)稱之為「信條派」。因為基督教的信條之象徵就是以這個字起始的。經濟派在這本「信條之象徵」一書中所寫的，不消說是充滿了列寧所認為的對於勞動階級運動是最有害的東西。列寧將這本「信條之象徵」弄到手，以後便在西伯利亞的流刑地，召集馬克思主義者的流刑犯，即舊「勞動階級解放鬥爭聯盟」的會員們，開了一個相當於大會的集會，在這個會上，他們全場一致的對這個「信條之象徵」作成了一個回答的抗議書——這到後來方在俄國的境內和國外付印散發——。這個抗議書為的是要使進步的勞動者辨別他們所不可不信的經濟

派的見解。在庫斯可瓦和普羅可婆維支等這一班似是而非的馬克思主義的「信條之象徵」中，滿都是當時成爲西歐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之敵的所謂「修正派」——即專幹革命的馬克思學說之修正，刪改，冒瀆，捏造等事的一派人的論調。列寧起草的抗議書上，將這不可不信的信條逐一反駁，打擊得他們體無完膚。抗議書上說：

「……「信條派」——即「信條之象徵」的作者們所手製的綱領，好像是在說明着把勞動階級運動局限在經濟鬥爭上，引導到「最低限度的抵抗」一方面去，馬克思主義者和自由主義的反政府分子共同爭取「法律上的權利」。像這樣的綱領的出現，等於俄國社會民主派之政治的自殺，不啻是俄國勞動運動和俄國革命運動的一大障礙和屈辱。」

四 人民派的真面目

此外，也還有認真以爲自己是人民之同情者的知識階級的第三種人。可是他們

不理解馬克思革命的學說，他們看不透前途，他們也看不到俄國究竟是如何的並且向哪一方面進展，他們只管認為馬克思主義者是具有自己的生活形態之完全特殊的國民。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可以避免如同在其他各國那樣的資本主義的發達。若是要向他們說：『注意勞動問題吧！』則他們會反問，『什麼，我們國內有勞動問題嗎？』那祇是別的事，例如德國，英國或許有革命的勞動問題，但是在我們的國家裏，沒有那樣的事。』人民派會這樣的說。人民派在和馬克思主義者的論爭上，說真正的布爾喬亞階級在我們的國家裏是沒有的。而他們首先所想到的使以為農民階級是革命的。

在這樣的環境之中，列寧以其銳利的眼光和透達的見識，開始在運動的周圍，發現了鬥爭之新的力量，即勞動階級，工廠，製造場之日漸抬頭。人民派的著述家，即知識階級分子，把列寧看成是一個竟敢和前輩論爭企圖教育前輩的驕傲的傢伙。列寧的確是用冷靜的攻擊曝露了他們的思想之本質，指摘了他們常常在喜歡

說『人民』，『人民的意志』，或者類似這些話的美麗辭句庇蔭之下，對於人民絲毫沒有什麼幫助。列寧在撒麻拉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足跡。在那裏不久便組織了強大的團體。在這個團體裏，後來成爲有名的革命家，馬克思主義者的斯科里雅倫科，拉拉雅恩資（印撒羅夫）等都參加了。從各大都市也有許多的人們，聞風而來聽取新學說。在這裏，並且還發行了一種名「撒麻魯斯基·威斯特尼克」（撒麻拉新聞）的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報紙。

一八九一年十月，列寧又向政府請求准許出國，但被拒絕。列寧的弟弟多米德里君說，有一個非常有趣味的插話，正好是這個時候的事。那時候，列寧要乘渡船過伏爾加河，看見了放高利貸與農民，鬪吞併其土地與榨取其農產物的農村榨取階級，即庫拉克(Kurak)的運輸店，將渡船的船夫們捕縛起來的事情。列寧要求將這個事件作成一條記錄，將庫拉克的這種不法行爲訴於法庭。這不消說得，庫拉克是會到各重要機關去運動的，因之，這個事件就被拖延下來，終於被消滅了。然而那

時候的列寧便已經是具有堅持性的人了，一旦認定，就要澈底前進，是決不後退的。於是遂於初雪的秋天震駭了鄉村的裁判所，終於將橫暴已極的庫拉克打進監獄處以一個月的拘禁。許多人都勸列寧不必爲此事奔走了，然而列寧始終頑強，不到處罰庫拉克不止，不肯撤回訴訟。是年秋，列寧在撒麻拉寫成「農民生活中的新經濟運動」一文。他不僅對當地的團體，連伏爾加沿岸的各都市，他都要作馬克思學說的演講。同時，他在尼季尼·諾伐哥羅德(Nizhni-Novgorod)也常作講演。

五 天空的一顆新星

一八九三年秋，列寧赴彼得堡。當時，他已經是一個健全的革命指導者了。一八九三年的聖誕節，又抵莫斯科。關於他的這第一次到莫斯科，他的姊姊安娜會談過如下的一節有趣的插話。她說：「某天，在馬拉雅布羅拿亞街的一個某大學生的家裏，有一個集會。在那裏，有一位當時有名的人民派的著述家伏龍柴夫(P.V.)

(Forstner) 講演。伏龍柴夫在他自己的著作中說，在俄國，資本主義的發達是不可能的。雖然到後來這已經被證明完全是謬論了，但在當時，伏龍柴夫却是一個被認為了不起的學者，被以大學生為主體的人民意志派中有教養的人們所信仰。所以當年方二十三歲的烏拉狄密爾·伊里奇反對這位老大家的意見時，許多人都以這個駁論是「小孩子的大膽」。可是伊里奇却是勇敢的澈底的，盡傾其青年的熱情和信念，以其完整的學識，毫無忌憚的與人民意志派的學說以無情的駁擊，因是，對於「小孩子的大膽」的反感，便又漸漸的變成某種尊敬的态度了。」

這時列寧的演說，給與了人們以非常激烈的感動。人們簡直說他是出現於天空一角的一顆新星。一方面是懷着愉快的，另一方面則是懷着嫉妬和曲解的這樣說着。列寧把當時參加的許多年青同志們的信念打翻了，使得他們不得不着手作馬克思的研究。

他在彼得堡還給與了比這更大的影響。一八九四年，列寧加入了彼得堡社會民

主派宣傳者的團體。這個團體名『勞動運動中央指導團』。在這以前，一八九一年五月一日，彼得堡的工人召集了一個秘密集會。在這集會上，彼得堡的工人中有一個人說：『諸位，我們不是要自己學着合作嗎？我們不是要組織有力的政黨嗎？我們不是要抓住那偉大的種子，從日出到日沒，播種在我們的土地的每一個角隅上嗎？』是後，列寧和勞動者薛爾古諾夫(Sh. Gurnoff)，巴布西金，(I. V. Babushkin)季諾維埃夫(Zinoviev)等一塊兒組織了各種小的團體。薛爾古諾夫和巴布西金都是當時工人羣衆中的佼佼者。薛爾古諾夫始終是竭其全力於勞動，並且熟諳彼得堡的勞動街道，工人們也都認識他。至一八九五年，他又得進步的勞動團體的援助，組織了許多的工會，被選舉爲勞動區域的代表，作成『勞動階級解放鬥爭同盟』的基礎。這個同盟的盟員之一克魯加諾夫斯卡亞(Krzyanovskaya)女士追憶當時，這樣的說：

『我和烏拉狄密爾·伊里奇是在一八九三年相識的。他一來到彼得堡，便開始和社會民主派及各方面聯絡，並且立刻找尋工作。他敏捷的將當時的一切團體加以

研究，和社會民主派的職工會締結密切的關係，主要的是經過這個團體，和彼得堡的工人取得了聯絡。我是在聽他的「市場論」的講演時纔第一次見着他，但是在以前我就聽到過關於他的好評了。他是一個具有一雙慧敏而活潑略帶微笑的銳眼，和充滿精力與生命，完全像火花一般的人。他的演講「市場論」和小冊子「什麼是人民之友」馬上表現了他的尺度。方向之確實，分析之深刻，學識之遠大，以及將馬克思主義的各部分與俄國現實的環境聯繫起來的那種異常活動的才能，立刻在同志之間樹立了他的權威。於是他便非常迅速的使得同志們確信政策變更的必要，即確信從狹隘形態的宣傳，轉向羣衆的廣泛宣傳，把握這些羣衆，使羣衆轉向現行經濟制度及政治制度作積極的鬥爭這些事情的必要性。

『據我所見，那時候他的行動上表現着三個根本的傾向。第一是他認爲勞動羣衆是我們活動的主要對象，他總是要想盡方法來和他們接近。第二是他努力的研究他們的生活，要求，以及利害，盡可能的出版和他們接近的宣傳文件，新聞，以

及通俗的小冊子等，啓發他們鬥爭的情緒，指示他們鬥爭的方針。第三，他不僅是空談這些根本方針，他一定要以極大的努力來將之付諸實行。他寫成一本「什麼是人民之友」的小冊子。他出席人民派的會議，簡直拿出他們所預料不及的猛烈，打擊他們，攻破他們。他不論遇着是如何少數的人，都要隨時隨地的把他們組成社會民主派的團體（例如在彼得堡，撒麻拉，尼季尼等地），和他取着聯絡。他還寫作宣傳文件和一本名「罰款制度論」的小冊子，散發給勞動團體。」

這個同盟的成立，列寧在最初，事實上就給與了非常大的努力。他首先和不相信勞動運動會成功的人們，和不理解勞動運動之任務的人們，和企圖將運動脫離正軌的人們作無情的鬥爭。繼之於一八九四年秋季，作轉向行動大衆化的決議。列寧第一次寫作關於一八九五年一月賽米雅尼可夫斯基製造場罷工的傳單。薛爾古諾夫關於列寧寫的這張傳單敘述道：「寫着工人們特別感到有力的這張傳單，叫出了關於罷工的一切問題，表現了工人們所有的不滿。那是有多麼大的意義啊！工人們一

拿到這傳單，其餘的人們便如同奔牛一般的聚集攏來搶着看。從這些瑣細的事情上，工人們漸漸的轉向理解勞動階級困苦的原因方面去了。」

六 「什麼是「人民之友」」

這時候，列寧的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便是「什麼是「人民之友」——他們怎樣和社會民主主義者鬥爭」。的這本著作是在當時出版的「俄羅斯之富」的雜誌上，爲回答與馬克斯主義者論戰之有名的人民派著述家米哈伊羅夫斯基（Mikhailovsky）以及克里文珂等的論文的。米哈伊羅夫斯基和「俄羅斯之富」的編者們卡魯伊雪夫，猶加可夫，克里文珂等人是一樣的，認爲自己是真的「人民之友」。同時又因爲他們不理解俄國的經濟是怎樣的發展，是向怎樣的方向發展，給了勞動者，農民們以非常的毒害。他們認爲用吶喊和苦訴可以阻止資本主義的發達，停止普羅列塔利亞和大规模產業的發生。他們認爲遭了破壞的農村經濟可以用一個什麼矯正法和一根朽木

來支持。以此之故，列寧在他的著作（當時在嚴重的壓迫之下，這種書自然休想得到合法的印刷，所以不是鉛印，而是石印的。）上展開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單祇是這個學說便表現着給了鬥爭一個正確的方法。他在這本著作上，指出人民派著述家們關於人民的一些巧言麗句，實際上都是毒害人民的東西。他力說阻止資本主義的發達是不可能的，非組織可以研究其發達，曝露其法則，並破壞之的力量不可。

要知道當時米哈伊羅夫斯基是受政府特許爲印貼利更追亞（*Intelligentsia*）——尤其是大學生之中的「集會與會議的支配者」，因此他簡直是政府的偵探。不過在某一個時期和「人民意志」黨也有關係罷了。所以列寧的這本著作是以如何的憤激應付了他們，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事。但同時，列寧在這個初期的著作上，差不多將他的天賦的思想，後來在他的著作中所展開的，與夫他生平確守着的列寧主義的根本思想都預示了出來。

列寧對人民派的米哈伊羅夫斯基給了一個著名的答覆。這答覆成了俄羅斯舉國

皆讀的東西，列寧在這本著作中，也展開了對資本主義國家間戰爭的鬥爭。他說：

「爲消滅民族的敵意，除組織聯合對各國壓迫階級鬥爭的被壓迫階級，把牠的各民族的勞動團體，當作對國際資本鬥爭之單一的國際勞動軍去動員不可，此外別無他法。」

「俄國的革命家應該幹什麼呢？那就是要向着普羅列塔利亞對布爾喬亞的鬥爭上去，結合並動員自遠僻的荒村至最新式而完備的工廠，作成全俄經濟組織之要素的一切無產階級。」

「怎樣去結合他們呢？」

「社會民主主義者（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是這樣的稱呼）要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和期待放在這個階級上，把自己的綱領放在階級意識的發展上，把自己一切的行動向着反抗現制度之積極的政治鬥爭，並且爲着要將全俄國的普羅列塔利亞領導到這個鬥爭上去，非援助他們不可。」

人民派對於國民生活的實際上發生着什麼事情，簡直是執迷不悟的閉着他們的眼睛。他們認為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發達，或者可以阻止，並且表現出這樣的態度來。所以列寧是澈底的曝露了這種見解的毒害。他說社會主義的印貼利更追亞不僅僅是在拋棄幻想，不是在他们所希求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達之中，也不是在他們所空想為或許可能的社會經濟關係上，而是在真正的事實中去探求要素的時候，祇有在這個時候，他們纔可以開始有效的工作。

所以列寧忠告他們要認真的去研究為階級鬥爭之母體的工人，農民，資本家，大工共等的狀態。他常常教訓他的同志們，馬克思主義者不可誇耀自身懂得一切，理解一切，必須研究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問題。——但是列寧却不是教訓同志們拋開實際上所發生的事件，專一作埋頭几上的學者的。他說：

『我把社會民主派理論工作的必要，重大，偉大，將這項工作放在行動之前第一義的立場上，尤其是要達到理論工作的終極為止，並不是說實踐的行動應該延

緩。不消說，假若社會主義者的任務，是在探求「忽視實際」國家「發達的另一途徑」的話，那末祇有在天才的哲學家們開關指示這另一途徑的時候，實踐的行動纔是可能的。即這些途徑被開關，——理論學術的工作告終結的時候，領導祖國往「新開關的」另一途徑的人們的行動，纔得開始。然而相反的，社會主義者的任務，在指導既存的社會經濟的實際中所發生的普羅列塔利亞之實踐的鬥爭的場合，問題就完全不同。在這個場合，理論的工作和實踐的行動，如同老戰士德國社會民主黨員李布克拉西以「學習，宣傳，組織」這幾句話便表現了牠的確切的性質一般，是要融合成爲一個行動。』（「什麼是人民之友」——列寧）

列寧在這初期的著作上，也預示着黨的戰術的方針——即對各種其他的階級與政黨的態度和鬥爭的手段。

列寧後來對於社會革命黨以社會主義的旗幟與修辭掩飾其自身小布爾喬亞的根性給了猛烈的攻擊，在當時簡直認爲小布爾喬亞的理論是反動的反革命的。

七 病榻上作「資本論」第二卷的評釋

但是，小布爾喬亞派（例如農民之類）能夠完成怎樣的任務？從對於這件事情決定自己態度的責任上說來，那不是解放我們的東西。關於這件事，列寧說：

「假若我們理解實際上，那裏面並沒有社會主義的意味——即小布爾喬亞的理論，一句話也不說明到勞動階級的榨取，並且也完全不能於其解放上有什麼貢獻，實際上，他們的理論祇不過是反映一切小布爾喬亞派的利益的話，那末這時我們對於他們當然站在完全不同的關係上，必須提起「勞動階級對於小布爾喬亞派及其綱領，應當取怎樣的態度」的問題。而對於這個質問，若不留意到小布爾喬亞階級的二重性（在我們俄國，小布爾喬亞派和大布爾喬亞派對立的鬥爭是非常的微弱，所以這種二重性特別強烈），是不能回答的。他在一般民主主義的要求上，即對中世紀的制度以及農奴制度的所有殘餘的鬥爭上，是進步的；然而又因其自身是小布爾

喬亞泥，其對於布爾喬亞的傾向，又爲努力於阻止並回轉國內一般的發達，以及擁護自己的立場而鬥爭的場合，就是反動的，反革命的。

「小布爾喬亞的理論怎樣的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相交錯呢？他們的綱領豈單不把民主主義除外嗎？相反的，更強烈的揭起對民主主義的要求。小市民的社會主義的代表者們隨時隨地所打的口號，便是對土地縮小，提高賦稅，行政壓迫的反抗。

「在這些要求之中，他們絲毫不作榨取的說明（即關於資本家怎樣剝削勞動力，怎樣奪取土地與農民耕作收入的剩餘價值——編者）。他們的口號，絲毫不涉及到資本對勞動的壓迫。這完全不是什麼社會主義。但是他們的口號，在消滅這些因中世紀的腐敗而強烈的壓制，使勞動者對資本的鬥爭逐漸容易的民主的要求上，是受着勞動者更熱烈的擁護。過重的賦捐和租稅——這，簡單的說來，祇不過是給與小布爾喬亞泥以特殊的重大性的問題。而俄國農民的賦稅，在許多的關係上，祇不過是農奴制度的遺物而已，例如土地收買的賦捐，不消說是應該即時撤廢

的。」

所可惜的是列寧的這個偉大著作的第二卷散失了，直至今日尚未發現一種印刷物。

在初期的著作上，成爲著述家的列寧，便已經出示了表現其偉人姿態的偉大學識，銳利批評的敏智，以及問題把握的廣泛與確切。寫述這本著作的時候是一八九四年的四月。

一八九四年的秋天，列寧在克拉森 (Olga) 的家裏講演其新著「人民派的經濟內容及其在斯特魯威著作中的批評」。P. 斯特魯威也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列寧很早就觀察到這位教授日漸遠離革命而變節了。因爲斯特魯威把勞動階級看作祇不過是一部分進步的布爾喬亞罷，爲着達到他們自己所樹立的目的而利用的一個工具而已。

一八九五年秋，出版了一本「關於俄國國民經濟之特徵的資料」的論文集。列寧

和斯特魯威，婆陀萊沙夫，克拉森，拉多強珂，斯太爾可夫等，都參加了這本書的編輯。克魯加諾夫斯卡亞女士回憶這時候的情形，又說：

「一八九五年春，烏拉狄密爾·伊里奇得了肺炎，病態頗重。在他的母親未來以前，我們是輪流的看護他。雖然是病榻橫陳，但他還是孜孜不倦的作「資本論」第三卷的研究，爲之作評釋，並引我們參加研究。」

八 出國與「勞動問題」的發行

一八九五年四月末，列寧取得了僅能於某一時期內出國的許可。這不是爲的休養，而是爲着和當時亡命國外的革命家——馬克思主義者喬治·蒲列哈諾夫，伯維爾·阿克賽羅德(P. Axelrod)維娜·紫絲麗綺(V. Zasulich)女士等取得聯絡。他們於一八八三年就在國外組織了最初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團體「勞動解放團」——他們當時是這樣的稱呼社會民主派——，出版革命的書籍，於祕密中跨越國境送回俄

國。列寧爲着要和他們取得聯絡，到了瑞士。同時，也爲着和他們會議將來應如何活動的問題。這些人在當時都被認爲是真正的革命家，而且事實也的確是如此。尤其是蒲列哈諾夫，簡直被看作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師表。他的著述和論文於俄國勞動運動的初步上具有重大的意義。列寧對於他們中的任何人都給了很大的印像。伯維爾·阿克賽羅德說：『我們俄國至今還缺少一個能統一馬克思之理論的學說與組織之實踐的要素的人物，現在在我們之中有了這樣的人了。這就是——未來的勞動運動的首領烏拉狄密爾·伊里奇·烏里雅諾夫——列寧。』要知道阿克賽羅德是最不歡喜稱讚人的人，他的這種評價，不消說，在當時顯然是具有重大意義的。列寧和「勞動解放團」派協議了關於將來活動的一切重要問題，又接洽了關於跨越國境秘密輸送革命的書報等事件以後，遂於一八九五年九月回到彼得堡，和他的同志們澈底的結成了「勞動階級解放同盟」。他在國外時，也曾到過巴黎和柏林，並且出席過許多勞動者的集會，學習了在勞動羣衆中活動的方法。他也調查了外國關於馬克思主

義理論的各種文獻。他自四月起至九月止，在外國住了四個月。一八九五年自外國回來，先到莫斯科，然後纔回到彼得堡。從外國是祕密的滿載了一皮包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書報而歸。

克魯加諾夫斯卡亞女士又說：

『他是精神飽滿而愉快的歸來了。他和「勞動解放團」取得了密切的聯絡，並且把祕密的刊物和對於我們的活動十分必要的最初第一架印刷機（Mimograph），裝在夾底的皮包內帶回來。一八九五年的秋季真是活潑極了。首先作成了最初第一次的組織計畫方案，按照區域的施行了力量的分配，決定了中央編輯部的人員，開始出版了「勞動問題」雜誌。命令者都是那位「老夫子」——列寧。』

一八九五年的九月，列寧為創立並統一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團體，周遊了為勞動運動之中心的維爾諾（Vilno），莫斯科，以及為紡織中心的奧萊賀囉柴囉（Orskovo-Zevo）等地。自是以後，我們便見到了各都市的『鬥爭同盟』是怎樣的活躍

着。

九 在獄中著作「俄國資本主義的發達」

「勞動問題」雜誌已經排好了版，是差不多正要付印的時候了，警察突然施行大搜查，圖謀撲滅「鬥爭同盟」。搜查是在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八日至九日的夜間施行的，「鬥爭同盟」的主要活動分子幾全被逮捕。警察是長時期的爲列寧撤下了羅網的。但是他依然是熱情的，或是在勞動團體內，或是在火車中，執筆寫作論文傳單，或是討論將來鬥爭的計劃，不斷的活動着。說起他這時候是怎樣的迷惑了偵探的事情來，倒也非常有趣。『當他打算要出去的時候，發覺了門裏面有偵探，他立刻又縮回來。隨即又走出去和偵視着他的那位偵探開起玩笑來。不知是誰那時候正打他的門前過去，向着坐在守門人的椅子上笑着的列寧，奇怪的樣子丟了一眼。』這是列寧的姊姊安娜女士在回憶錄「烏拉狄密爾·伊里奇在獄中的生活」中最有興

趣的一段。安娜女士又說：

『烏拉狄密爾·伊里奇是一八九五年俄曆十二月九日被檢舉的。在他被檢舉的一個半月以前，我和母親正在他的彼得堡的寓所裏。當時他是住在玻璃勺伊·卞咱奇胡同聖路易市場的附近。並且已經是掛了律師的牌子的。入獄以後，他立刻就執起筆來開始他的著作。他首先立下一個學術著作的大計畫。這便是他在一八九六年六月間於獄中動筆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達」。是後在流刑中，他依然繼續他的這本著作，在刑期終了時，便告完成了。』——這本書是在一八九九年四月出版的

自那時起，他經過他的姊姊安娜女士的手，和同志們取着聯絡。用祕密的方法將信件，論文，傳單等交給她。這樣的繼續對「勞動階級解放同盟」加以援助。他在獄中起草了黨的綱領和「系統論」的小冊子，這小冊子已經在拉夫桑斯卡亞排字所排好了版了，但後來因為該排字所被搜查，竟為憲兵所沒收。自是以後，他不得已而用在燈上一種便現出字來的化學墨水——用灰汁和牛乳製成的——寫文章和書信。

他爲着看守者到監房裏來檢閱時，不使其注意起見，便又利用散步的時間，用麵包屑做成墨水瓶。安娜女士關於他的這些事，又說：

「烏拉狄密爾·伊里奇創造了一種非常可愛的墨水瓶。這種墨水的製作，爲的是招了看守人的懷疑而受檢查時，容易吞入口內以滅痕跡。最初他尙未馴於未決監的習慣，獄吏在他不馴於未決監的時期內，常常搜查他。有一次他帶笑的說，我今天一天竟吞了六個墨水瓶了。」

列寧在獄中，總是這樣真摯的用功。自從用了這種方法以後，他那寫得很小的文件，便沒有被看守人搜查過。安娜女士繼續的說：

「有一次在接見的時候，他用他那生平的談諧和我談話。在他的監房受定期的檢查時，憲兵看到屋角裏堆積着許多書籍，筆記，統計表之類。憲兵戲言道，「檢查統計，今天是過熱了些」。是後，伊里奇對我說，「我真傻氣的擔憂他們要從那堆積的許多書籍中搜出什麼東西來哩！」於是又哄然的大笑起來說：「我比別的任

何俄羅斯帝國市民的境遇都好，因為他總拿不到我。」他笑着，我倒不放心起來，囑咐他要更當心些。雖說是不能再拿住他，但如果被發覺了，不消說，是要加罪的。我忠告他說，在獄中寫非法的文件，要處較流刑還要重的罪。可是和伊里奇會面的時候，他總是出人意料之平靜，安閒，快活，用一種迷人的笑，倒把我的憂慮打消了。告訴他裁判已告終了了。他却以「早着哩，全部材料尚未搜齊哩」這樣的話回答我。」

他在獄中著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達」，對於列寧主義的生長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不僅對於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即對於俄國的全流派——對於勞動民主主義者，這本著作也如同天使一般。列寧在這本著作上，和許多的統計與事實相埒的，證明着在這個農業國家的俄國，資本也一握一握的集中起來，資本是怎樣的使得農民日趨頹廢，怎樣的創造着許多失去了馬和土地的農民，靠傭工度日的農民，與夫半普羅列塔利亞；並且又瞭如指掌的證明着怎樣的使得富農和榨取農民日漸的強大

起來。這個著作對於工人，對於農民，對於許多的人們，都指示了除改變既存的經濟制度以外，是找不出什麼出路的。自然，因為考慮到當時的檢閱制度的關係，書中不能完全言盡其意，然而人們在當時便能學習到所謂「讀着字裏行間，便能思過半矣」。加之列寧明快的思想和耿直的論理，更使人們容易理解，列寧在獄中從不灰心的為勞動階級的解放而寫作着。可以說，他為追隨他的成百成千的俄國革命家，指出了光明的前途。此外，他又用秘密的方法從監獄裏送出親筆寫的給自由世界的檄文。一八九六年勞動革命的傳單，也是他在獄中起草的。這傳單是當時打算成立左傾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團體，意圖創設勞動黨，在無產階級中探求革命之中心和原動力的人民意志派中的一派人（奧克辛斯基，阿斯梯雪夫，費多羅夫等）所印刷的。

一八九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列寧受裁判的宣告。結果被判處往西比利亞受三年流刑，於二月底被押送至葉尼賽（Yenesi）縣明留辛斯克郡（Minsk）的修身斯可

矣 (Shushenskoj) 村。喜得在未出發以前，列寧得到保釋三天往首都一行的許可。這三天的工夫，在列寧看來真好似大紀念日的休假一般，因為同時尚有一些別的同志們也得到三天的自由。於是同志們便一塊兒拍了一張照像（這是與馬爾托夫，薛爾古諾夫，克拉森，以及克魯加諾夫斯基等人共攝的一張有名的照像）。

當時列寧對於不同的生活環境所取的態度，將他的性格一絲不遺的表現出來。安娜女士說：

「烏拉狄密爾·伊里奇邀准了在莫斯科和家族團聚三日。和同志們會晤了以後的他，決意打算在莫斯科被政府逮捕，俾得再和同志們同赴西比利亞流刑地。烏拉狄密爾·伊里奇並不想受到比其他同志們更好的特別恩典。我記得這件事情使得母親非常的興奮起來。幸喜母親請求給伏羅狄亞自費前赴流刑地，邀得准許，母親始大安慰。彼得堡的知己朋友們爲着擔心他的健康。也剴切的忠告他自費前往。卡爾莫伊珂瓦女士爲着他，並答應供給一些旅費。但是母親命我向卡爾莫伊珂瓦女士

說，謝謝她的好意，請她把旅費拿去給別的比較困苦的人去使用。烏拉狄密爾·伊里奇是還有力量自費去的。這時大家都問母親，爲什麼必須自費去呢，在母親說過據某老流刑犯說：「流刑或許可以重遇，但埃踏步（被押送的流刑犯的行列——大多死於途中）是可一而不可再的」這句話以後，烏拉狄密爾·伊里奇還是拒絕，並且寧願再回到監獄裏去。後來，列寧費盡心思終於說得母親准許官費前去，遂於一八九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到克拉斯諾雅斯克（Krasnoyarsk）（當時到此地的鐵道剛剛敷成），五月二十日由此出發往流刑地修身斯可矣村。」

第三章 流刑亡命生活的時代

一 在流刑地結婚

關於列寧的流刑生活，頗多有趣味的問題。他在流刑地是寄寓在一個農民的家裏。那位農夫非常的尊敬他，信賴他，許多事情都和他商量。當時在明留辛斯基的其他流刑犯，尚有克魯加諾夫斯基，萊伯辛斯基，萊伯辛斯卡亞女士等。如今尚生存着的同志們，現在還很能夠記起當時在明留辛斯克郡修身斯可矣村的生活狀況。這兒，以前和列寧訂有婚約，後來成爲他一生生活之伴侶與妻的克盧普絲茹雅 (N. K. Krupskaya) 女士也來了。她是在西比利亞流刑地和列寧結婚的。她

本來是被宣判流刑到烏拉爾方面去的，因為她常常在實際上幫助列寧的工作，並且自己單獨的也在工人羣衆中活動的原故。據克盧普絲茹雅女士說，她是應當流刑到烏發去的，但經她說明她是伊里奇的未婚妻，她要和他結婚，請求也到西比利亞去和他同居，纔得到了許可。她是她的母親陪伴她同來的，到達修身斯可矣村已經是黃昏的時分了。尋着了列寧的寓所，是一個農民的家庭。但是列寧的房間裏黑越越的沒有一個人。她們於是走進列寧的房間，燃着了燈等他歸來。列寧歸來時，見房內已有燈光，不禁奇異。而那居停主人又和他開玩笑，說是有一個醉漢，闖進了他的房間，在胡亂拋擲書物。列寧莫名其妙，急忙跑進房裏一看，原來是久別重逢的生活伴侶。列寧當時雖然怔了一下，但立刻也就復過元來。於是三人便作了一次竟夕談。

世襲的尼古拉·羅曼諾夫 (Nichola Romanov) 政府，雖然是允准了克盧普絲茹雅女士流刑到西比利亞來，祇不過是因為她不久要結婚！所以列寧此時就必須按

照警察制度進行請求的手續和呈報的麻煩，提早他們的結婚。雖然如此，但是也還不得不延遲到七月間，纔克服了一切形式的手續，取得政府准許他們成爲夫婦。這個時候，政府連他們流刑的同志們從隣村來參加他們的婚禮都禁止。不消說，更是沒有什麼「蜜月」可度了。他們每天早晨起來便在一塊兒工作，翻譯一本雪德梨·衛波(Sidney Webb)著的「產業民主制度」，下午列寧就從事於他的「俄國資本主義之發達」的著作。在晚間他們攜着列寧的獵犬一同去散步的時候，總有一些毒蚊蟲特別注意的緊隨着列寧而不光顧那兩位婦人。所以他說，那是他絕無僅有的帶皮手套的時候，是他在巴黎和柏林的時候，最瞧不起的一種儀式。

從人類的生活上被放逐了的流刑犯們，在流刑地爲着保持他們的精力，必須樹立起生活的基調來。可是他們在那裏並不消沉落魄，也不泣嘆自己的運命，精神倒非常之好。他們相信爲解放運動而工作的時候會再來的，這時暫且努力做着在流刑期中所能做的事，與夫自己學習和教育別人的工作。以土地爲生活的農民們常常帶

着各種各樣的許多問題到列寧的寓處來，他總是和顏悅色的回答他們，教育他們。西比利亞的人至今還以敬愛之心在紀念着他。

二 流刑中大著完成

列寧一到了流刑地，便着手於他的大作。那就是他費了數年光陰的「俄國資本主義之發達」的著述。他終於在流刑地完成了這本很久以前便已着手的宏著。除這本著作以外，他還寫了一本題為「俄國社會民主主義者之任務」的小冊子。列寧在這本小冊子裏面，正確的把握住並解決了像俄國這樣大多數人爲農民的落後國家的社會運動，究應如何進行的問題。當時很多的人們都迷惑於勞動者應當作政治鬥爭呢，抑或僅爲自身經濟的利益，從事於要求工資的增加，工作時間的縮短，以及工作條件的改善等。有的雖認爲勞動者當然應該作政治的鬥爭，然而却不懂究竟應該怎樣纔可以把對布爾喬亞汜要求改良經濟條件的鬥爭和社會主義的鬥爭，與對專制

政府的鬥爭聯繫起來。當時，黨裏面已經有了所謂「經濟派」的分子。他們說，勞動者的任務，祇在於工資的關係上，要求增加個五分一角便得了，至於對專制政府的鬥爭，那是自由主義布爾喬亞的律師，技師，教授，以至於醫師們的任務。列寧在這本小冊子上，明確的解決了關於勞動階級之任務的問題。他對於勞動者，告訴他們應當立刻拿出政治鬥爭的手段來，千萬不可對布爾喬亞泥有怎樣的希望。他指出西歐，例如法國的大革命，如果回顧一下那時候布爾喬亞泥所作爲的事，卽如消滅農奴制度之殘餘的任務，勞動階級也不得不放到自己的肩上來。我們不應該等待用政治的變革來建立比較自由主義的政府，然後纔有建立獨立的勞動黨的可能性的日子到來，應該在不論如何困苦的條件之下，不論專制獨裁的政府頒佈怎樣苛虐的法律，我們應該立刻建立起普羅列塔利亞的政黨，領導生活於不堪其苦的條件之下的勞動階級，進行政治的鬥爭，作政治的變革，然後經濟的解放始有可能。

這本小冊子的原稿，後來用祕密的方法寄到在外國的「勞動解放團」。當這原稿

到達他們的手中時，解放團的老前輩如蒲列哈諾夫，阿克賽羅德，紮絲麗綺等非常的高興，因為他們在列寧身上感覺到有「偉大的新的力量」。特別是阿克賽羅德遇人便極口的稱讚列寧。他在這本小冊子的序文中，佈滿了對列寧的讚詞，評之為「蒲列哈諾夫以後之唯一的勞動運動指導者」。這在當時不能不說是異常的讚詞了。

在這流刑之中，列寧還寫有幾種著作和論文。他在這些著作中，對於竭力要使馬克思的學說適應於布爾喬亞汜的要求之似是而非的馬克思主義者，給了痛烈的打擊。在列寧認為，非剝掉這些無恥的僞稱馬克思主義者之名義的人們的面皮，曝露他們的騙術不可。其中之一便是斯特魯威，他後來成了立憲民主黨的一員，為共產黨員與蘇聯所憎惡的敵人。但在那時候他們却和社會民主派很接近。他以及和他同一臭味的著述家們，最初倒還不勝客氣，可是漸漸露骨的表现了馬克思的曲解時，列寧便對他起了反感。最初是列寧以涂林（Tulin）的署名作文駁擊斯特魯威，可是專制政府之警犬的「檢閱官」把登載列寧文章的雜誌銷燬了。然而不論警犬是如何猙

猶惡毒，列寧的思想是無法銷燬的。

三 流刑犯大會的決議

列寧是怎樣的過着他的流刑地的生活呢？關於這，當時在明留辛斯克流刑地的倫古尼克詳細的談過。他說：

『同志們的交往是非常的親密，雖然警察禁止着，但他們還是常常互相訪問會晤。一八九九年夏，由烏拉狄密爾·伊里奇的發起，在後來因肺病而死了的同志瓦萊夫(Varjov)所住的阿爾麻可夫斯開村開流刑犯大會，到同志十七人。在這個大會上，列寧報告檢舉時被漏網的俄國社會民主派的一部人，對於俄國革命有一種極其有害的方向轉變，並稱「他們說，俄國的勞動者祇應該為改善經濟狀態而鬥爭，力持勞動階級應該把政治鬥爭委之於布爾喬亞的政黨的見解」。列寧於是拿出他們關於這種見解的文件，高聲朗讀起來。而且向參加會議的同志們力稱，對於有將俄

國勞動運動委之於布爾喬亞政黨支配之虞的這個危險的傾向，決然的鬥爭是異常必要的。列寧隨即提出對該文件的抗議書，僅加少許修正即由十七人流刑犯大會的名義一致通過，寄往各地及國外的各方面。當時和他們抱同一意見的蒲列哈諾夫，並將之附印寄發於俄國各地。這十七個人，後來竟成了「火花」(Искра)派的基本幹部。而「火花」派會不斷地對這有害的布爾喬亞的見解給了有組織的鬥爭。

「列寧在流刑地並且還以其高超的著作和國外的「勞動解放團」——蒲列哈諾夫，阿克賽羅德，紮絲麗綺等——不斷的取着聯絡。也常常和彼得堡，莫斯科，及其他都市中的同志們通着信。他的流刑生活的大部分，都是消費在討論革命運動與馬克思哲學的複雜問題的通信上。

「烏拉狄密爾·伊里奇非但無論何時總以愉快而饒興趣的態度待遇談話的對手，他也還喜好參加散步，狩獵，溜冰，下棋之類的遊戲。並且是非常的熟練。同時，他還能常常以其真摯而富有魅力的與人共事的樸實，誘引同志們趨向快樂與活

潑之中。同志們之中，對於他的敏慧，優秀，素樸，以及對於任何人，決不因其學問與實際問題上的偉大而表示驕傲的態度，沒有一個人不表示好感。他對於一切人，尤其是對於黨的同志——即令是一冷如冰的人，在他面前也得溶化而成爲他一生的至友——總是以其溫和而熱烈的同情去接待他們。」

四．流刑地的新生活

又據庫魯齊拿君談列寧在西比利亞流刑地的生活，說道：

「烏拉狄密爾·伊里奇·列寧是一八九七年由彼得堡，在警察的監視之下，以三年爲期，流放到葉尼賽來。是年五月，列寧爲兩名憲兵護送到明留辛斯克的修身斯可矣村，在那裏度着流刑生活。

『列寧是寄寓在一個名叫資伊里雅諾夫的農家家裏。資伊里雅諾夫每月支取由政府支出的七盧布四十戈比，作爲列寧的膳宿費。

『當時，爲監視列寧的原故，警察方面還專門任命了一個名佐薩伊羅夫的兒子。這個傢伙是一個升到準士官的典型的警犬。列寧的生活是孤獨的，他自然不和那些所謂土著的「上流階級」交際，他的大部分時間多費於讀書和著作。如今住在修身斯可矣村的老農咱威爾特金和埃爾麻可夫還很記得列寧的事情，並且追念着往日和他的交際。列寧在那新居留地第一次的交際，就是在和這位雜貨店的老闆咱威爾特金之間開始的。列寧常到他店裏去買信箋，店內所有的信箋統被列寧買去，但隔日便用完了。咱威爾特金覺得非常奇怪，後來他實在再也忍不住了，便和這位顧客交談起來，問道：

『足下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我是一個政治犯呀！』烏拉狄密爾·伊里奇這樣簡單的回答，從此便開始了交際。

『咱威爾特金說：

「我常和警察局裏的辦事人，鄉政府裏的書記，以及寺院裏的大師父們交往，據他們說起來，好像政治犯都是壞人。可是我自從認識了烏拉狄密爾·伊里奇，反覺得政治犯完全是另外一種人了。」

「咱威爾特金常常請列寧到他店裏來吃茶，列寧一去，二人便深談起來，有時列寧也教教他簡單的起碼算術。於是他從這位新的知己方面知道了許多以前所不會想到的事情。」庫魯齊拿君說：「咱威爾特金記得一件印象特別深刻的事情。」他說：

「有一次咱威爾特金被請到列寧家裏吃茶。窗外忽然顯着軍帽的影子在搖動。等到咱威爾特金告訴列寧的時候，房間裏已經進來了一個候補檢事，一個憲兵大尉和一個憲兵下士。既不寒暄，也不脫帽，直挺挺的立着問道：「列寧的書房在那兒？」

「問後，便動手搜查起來，檯子上，紙片，書籍，函件都被檢閱了一番。」

「問過了幾句官話以後，他們纔脫下帽子來，並且也改變了官僚的態度。在咱威爾特金的眼睛裏看到這三位不速之客忽然放下了「長官」的威嚴，好像他們受了一種什麼特別的威力——列寧的智力——壓制着的樣子，看來變小了。當日，過了幾個鐘頭以後，那位大尉又到咱威爾特金的店裏來，嚴肅的查問：

「你和列寧是很久以前就交際的嗎？」

「你怎樣認識他的？」

「烏里雅諾夫從修身斯可矣村到什麼地方去嗎？」

「他和農民們談些什麼話？」

「咱威爾特金回答，說他跟列寧學算術和簿記，烏里雅諾夫什麼地方也不去，也不和任何人交際，完全過着孤獨的生活。此外便沒有告訴他關於列寧的什麼更詳細的事情了。咱威爾特金又回過來反問那位大尉，此後他可以和列寧交際嗎？那位憲兵大尉對於這個反問，答道：

『自然，沒有什麼不可以。不過，第一要是他爲着你的，第二你必須監視他，並且要將你知道的一切事情告訴我們，否則，你當心着。』

『那位大尉向咱威爾特金教導了一番便去了。』

『有一次，列寧閑着無事，教給一個名叫史特羅賽諾夫的農民以軍棋。史特羅賽諾夫在夢中都覺得是在和他的先生下棋，一盤又一盤的繼續着。史特羅賽諾夫的願望是要使伊里奇吃一回敗仗，可是這個願望終是徒然。每次下棋，史特羅賽諾夫雖然是非常審慎的出手走着子，但到勝負將決的時候，他總是興奮起來宣告失敗。伊里奇却隨便什麼時候，都是冷靜的，浮泛着一種使人愉快的微笑，向對方宣告勝利。咱威爾特金談起關於那位好勝的軍棋學生史特羅賽諾夫，和那位冷靜而沉着，含着愉快的微笑的軍棋先生的事情來，總是說：「史特羅賽諾夫如何可以勝得了伊里奇呢？伊里奇祇要一出全力，宣告勝利便完了。」』

『伊里奇若不得監視人的許可，連去打獵都不行。偶然因購買書籍，需要往明

留辛斯克一行的時候，更須得當地警察或憲兵隊長長的許可。凡是寄給伊里奇的書信，都將在明留辛斯克被檢閱一番。

『伊里奇的住所，不時的受搜查，可是事實上絲毫也得不到什麼。而伊里奇也並不把對他的嚴格監視放在心上。他終日總是在緊張的工作中生活着。他每天必須出去散步，散步的時候，他老是兩手緊握在背後，垂着頭向前走。可見他在散步的時候，也經常的是在耽於深思。』

克魯加洛夫斯卡亞女士在她的著作中，也追懷着這個流刑的時代。她說：

『自從一八九六年的檢舉以後，我和彼得堡的同志們整兩年斷絕了聯絡。一八九八年，我在明留辛斯克纔和被流放到這兒來的同志們會合起來。於是纔把晤了列寧和他的夫人，克魯加諾夫斯基，斯太爾可夫，萊伯辛斯基，彼得堡的工人夏波爾，巴寧，恩格伯特，波蘭社會民主黨一派的柴卡里斯，可瓦萊夫斯基，普羅明斯基，以及後來由葉尼賽斯基轉流來的倫克尼克，瓦萊夫，薛華文等人。這些人雖然

都是散居在明留辛斯克的各地，可是在這個時期中，都有共同的工作，相同的傾向和思想，並且相互間經常的保持着密切的關係。同志間的聯絡，在各種妥善的方式和名義之下通着信息，或者探訪。即便是大會也開成過。流刑地社會民主主義者的中心，不消說，是列寧了。他和所有的同志往來書信，由他的手和同志們結成聯絡網。由他的主動，我們還組織了一個書報雜誌交換會，交換閱讀從俄國（西比利亞的俄國人稱俄國爲歐俄——日譯者）寄來的本國或外國的讀物。

『列寧的日常生活是愉快的，活動的，內容豐富而緊張的，因此，他成了衆人的表率。雖說是在流刑地，然而我們是毫不鬆懈的樹立了生活的基調。在我們的流刑地，從不會發生過倦怠，空疎，放縱，含有不規律的氣氛的齷齪問題。我們會談着關於將來的活動，和工人們一塊兒研究着俄國的問題——這纔是真正愉快的生活。』

五 流刑期滿

一九〇〇年一月，列寧的流刑期滿了。因為他取得了可以選擇居所的通過證明書，所以他首先便選擇了許多同志們居住的布思科府而住下來。居留大都會他是被禁止的。但康絲坦娣洛維娜（列寧夫人）的流刑尚未滿期，因此，她便和列寧一同到烏發，和她的母親住在一塊兒了。列寧在烏發住了一個短時期，他在那裏認識了當地的社會民主黨員，以及流放在那裏的邱盧帕（Tsinupa）——後來被推為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史維古爾斯基（A. I. Swederski），與克羅夫馬爾，佩特倫珂諸人。佩特倫珂關於當時和列寧的把晤，談道：

『是晚間七點鐘的光景，來了一位前額雖已光禿而看來僅有三十許的青年。他和我們許多人都是一樣的，穿着非常樸素的服裝。披着一件不清潔的大衣，圍着一條毛線結的圍巾，他脫下大衣放在進門處，便顯出是一件灰色的短衣和馬甲，下身也是一條灰色的褲子，走進了房間裏來。襯衣上還鑲着舊式的綢領，打着黑領帶。和他一塊兒來的，還有一個年青的女子——那就是烏拉狄密爾·伊里奇·烏里雅諾

夫，和他的夫人拿對資達·康絲坦娣洛維娜——原姓克盧普絲茹雅女士。

『伊里奇在那兒住了不久，便於一九〇〇年二月十一日離開了布思科府，但那不能不在流刑地烏發度過最後一年的克盧普絲茹雅女士却依然留在那裏。她之和她所敬愛的老母居住在布思科府，成了伊里奇和政治犯的一個聯絡。經過她的手，我們和伊里奇通着信，知道了一些政治上有趣味的消息。』

列寧當時也常常往來於他母親所居住的玻多利斯克，和克盧普絲茹雅女士在流刑期中所居的烏發兩地之間。他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簡直不能活動。任他往什麼地方去，憲兵隊和保安處總有人尾隨着他。現在如果打開憲兵本部的當時史料來看一看，列寧當時的一舉一動——他住在什麼地方，往那兒去，和誰談了若干時間的話等類事情，全部真是歷歷如見。但是列寧却沒有停留在任何一個地方伏而不動。他祇規定布思科府是他的根據地之一。因為當時在那地方有許多政府認為妻人的流刑犯。其中，現在在莫斯科的就有斯妥帕尼，萊伯辛斯基，克拉西可夫，蘇珂羅夫等

人。

列寧在布思科府的時候，把這些同志們的思想，引到了一個固定的方向，給了他們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已經明白的自覺到有建立勞動階級指導中心的必要。他在布思科府還召集了一個會議，其中後來成爲孟塞維克（少數派——譯者）的馬爾托夫，婆陀萊沙夫，以及成爲立憲民主黨員的斯特魯威，巴拉諾夫斯基等都參加了。在這會議上作成了在國外發行革命的書報的計畫方案。列寧在流放於西比利亞的時候，便想到要在外國發行一種刊物，以組織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並且已經預定這個刊物的名稱爲「火花」。是後不久，列寧的這個計畫果然實現了，在國外出版了新聞「火花」。這「火花」成了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組織者，由這「火花」燃成了俄國大革命的火焰。

列寧因潛入彼得堡，又遭逮捕，拘留了三個星期。他覺得無論如何不能在國內平穩的再生活下去了。他相信還是亡命到外國去，從事於革命的事業——寫作，宣

傳，組織，教育工人，指導黨的活動，爲着他個人，爲着革命運動都比較有利。但是，他在出國以前，曾再度祕密到烏發的克盧普絲茄雅的地方去過一次。他始終不會忘記過利用這些旅行的機會，把當時尚未成爲龐大團體的各地社會民主派的團體加以堅強的整頓，與他們取得密切的聯絡，以及準備黨的建設。

六 亡命國外

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九日，列寧亡命到國外了。列寧在最後的一次逮捕和亡命國外以前，曾歷遊各大都市，在各地盡可能的培植了勞動黨的基礎，接洽了和同志們或團體之間如何通信，怎樣利用收受信件の住址等事情。因爲如此，他出國以後，始可以立刻就和許多同志們取得聯絡，纔有指導他們的可能性。他到了外國，便着手於發行「火花」，他自己當了主筆——指導者之一。跨越國境祕密輸送到俄國的「火花」，把革命的力量和革命的活動分子組織起來，使得他們開始向着一個

固定的目標前進。

當時輸送「火花」與其他在外國出版的刊物回國，遇過非常的危險，因此不得不想盡方法，用盡手段，逃過那些監視國境之憲兵的眼睛，比方把報紙裹在身上，或者裝在夾底的皮箱裏輸送過來。假若被發覺了的話，那就得需要不惜獻身於監獄，流刑，或孤島的人物。這些獻身的人物，爲着要把「火花」遞送到俄國工人的手裏，必須具有不惜任何犧牲的覺悟。在今日回想起來，新聞對於整個的革命運動，是具有如何重大意義。新聞的題名「火花」，是怎樣的表現着它的任務？列寧之重視新聞在革命運動中的任務，是如何的證實了他的深謀遠慮之確固適切，與夫他的學識能力之高超遠大？

此時已經痛感組織政黨的必要了。在以前——一八九八年，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當時已經稱爲社會民主派了）爲統一政黨建立一個一般的計畫——例如怎樣行動，怎樣對資本公司，地主，專制政府鬥爭，曾經在明斯克（Minsk）召集過一次大

會。當時的評議會叫做「勞動階級解放鬥爭同盟」。在明斯克的祕密大會上，彼得堡，莫斯科，開輔(Kiev)，埃卡吉利諾斯拉烏里(Ekaterinoslavri)等地的工會，以及猶太人勞動者同盟(Bund)，都有代表出席。

在這個大會上，雖僅產生一個草案，但却已經決定了綱領，選舉了黨的中央委員會，並推選了列寧為黨報「勞動新聞」的主筆。同時也計畫了建立祕密印刷所，從那裏把新聞印刷出來，散發到各都市去。不過列寧這時候不便執行這個計畫。他祇好在外國實行他長時間所理想的計畫了。在這個大會上，列寧還因如何組織政黨的問題，和同志們起了衝突。因為當時各都市裏的團體可以說是在所謂「無舵也無羅盤針」的情形之下，在沒有一般的統一的指導機關的狀況下活動着。沒有政黨是沒有一統一的指導的。勞動黨僅能在勞動階級之進步的分子為一般的鬥爭而結成，他們有統一的指導和統一的綱領時，纔可以組織起來，可是當時還沒有這樣的東西。然而為準備這樣的政黨，首先就有研究如何組織政黨的必要。況且在俄國的各都市各

地方，還有許多曲解勞動階級之任務的組織團體。並且前面也已說過，在當時的革命者之中，還存在有不理解政治鬥爭之任務的經濟派，也還有不理解爲什麼有組織這一般的鬥爭之中心的必要的同志，與不把自己的活動與勞動羣衆聯繫起來，僅從事於宣傳暗殺有力的支配者與重要的官吏，以威脅政府的同志。因此，「火花」派，爲着結集並統一這些人們，啓發他們，爲着要把勞動運動領導到政治鬥爭之遠大的道程上去，必須要使得他們理解爲什麼非組織政黨不可。

七 由火花到火焰

列寧是用了什麼言詞，並且是怎樣的把布爾希維克(Bolsheviks)派結合起來的呢？他認爲首先有發行全俄新聞「火花」爲初步工作之必要。因此，他異常的努力從事於此。「火花」必須成爲把未來的布爾希維克周圍的一切力量結集起來的戰鬥機關。當時被稱爲火花派之未來的布爾希維克派的人們，力說有創立整個團體統一指

導的中心之必要。而為整個團體所承認為發布指揮命令之中心的，又認為必須是「火花」。在「從何幹起」的一篇論文，和「什麼是要幹的」的一本著作上，列寧是非常明快而率直的把這個認識敘述出來。尤其是他的那本小冊子「什麼是要幹的」，當時給了人們絕大的意義和影響。他這本著作上，提起了關於黨的組織之任務，規定了組織黨的成分，以及黨員必須要是階級鬥爭的前衛戰士——「職業的革命家」等問題。列寧的這種思想，對於黨有如何重大的意義是不消說明的了。舉凡老的布爾希維克都能感覺到他自己就是一切工作面前的試金石。到今日誰都知道，由於列寧在臨出國的時候，到處聯絡，在火花派所活動的一些都市裏，列寧所安設的聯絡網成了中心，委員會始得發展起來的事情。他的活動是首先接近進步的勞動者，至一九〇二年，又聯繫到農民運動。黨報——「火花」——委員會，是以對這些運動給與正確的見解與方針為其本身之緊急的任務的。

「火花」最初是在德國巴伐利亞(Bavaria)省的閔行(München)發行的，所以列

寧和克盧普絲茹雅女士都不得不遷移到該處居住。當時和列寧的「舊火花」的工作有關係的同志們，都還能追懷起當時的情形。柯哲妮科華女士在她的「舊火花時代」一書中，有如下的敘述：

『烏拉狄密爾·伊里奇，一九〇〇年流刑期滿，逃到外國，結合自身周圍的黨員，開始發行「火花」，以為「匿名者」，「職業革命家」的根據地。當地的警察並未加以無理的限制和壓迫。「匿名者」在那裏的生活亦頗相安，因之，俄國的流刑犯從流刑地或者流刑的途中，開始大批的逃走起來。於是他們也就蜂湧到他們在外國的「火花」編輯局——革命思想之中心，為聯絡國內活動分子之中心的地方來。是後，他們便改換名姓——所謂「匿名者」——為實際活動而往來於國內外。』

克魯茹諾夫斯卡亞女士在她的「火花的意義」一書中，也有如下的敘述：

『火花和俄國之間有着密切的聯繫，在那裏作成了有權威的思想之結合與組織之中心。那簡直如同貫通着俄國實際生活的一張弓，成為在外國發行的新聞中最

完全的新的典型。而其弦則由對於俄國比任何人認識得清楚和痛感得迫切的烏拉狄密爾·伊里奇拉着。

「我們抱着非常明確的希望，在闖行向成功的道路上開始出發。俄國革命運動的浪潮也隨而逐漸的高昂起來。「火花」變成了火焰燃燒起來。火花委員的人數也急激的增加起來，勞動羣衆也日漸的投到團體中來。跟着我們的運動的發展，由西比利亞流刑地化名逃出國境，投身於黨的指揮之下的同志們，有如雪崩潮湧一般。他們由委員會爲其部署，經過向各地的「秘密交通」之手，於國外與國內之間輸送着秘密出版物。不論何者，莫不經由佈置工作之司令部的所在地，而幹着秘密輸送的工
作。」

葛耐夫君在其「第二次大會以前」一書中，敘述其在從西比利亞流刑地逃走的途上，讀「什麼是要幹的」所受的感動之深刻的回憶，他說：

「我好似熱病的患者一般，澈夜不眠的讀盡了「什麼是要幹的」那本小冊子，受

了激動的銘感。我立刻就曉得那化名爲「列寧」的，一定是那我很早就認識了的彼得堡「鬥爭同盟」的創立者 D. I. 烏里雅諾夫。我在這本小冊子的作者之中，這一次不僅是從理論的方面，並且也感到具有異常強固之意志的組織力。從那時候起，我對「火花」的親熱便一天一天的強烈起來。」

那時候列寧和列寧夫人都非常的活動。當時在「火花」編輯局工作的柯齊妮科華女士還有如下一段的敘述：

「火花的出版和送發，與在俄國的同志們聯絡，以及祕密暗號的編製和記憶等，都是編輯員們的工作。但是主要的還是伊里奇和克盧普絲茹雅女士兩個人負擔着。伊里奇除很少的飲食時的休息外，差不多是上午九點鐘起，終日的工作着。記得我曾和他到過劇院和美術館。常常在竟日的工作告畢時，已經夜了，他急忙的向我說，「好，我們僅去休息半個鐘頭。」伊里奇隨便什麼時候，都正確的守着休息的時間，回來的時候，看看時鐘又說：還有兩分鐘，快去吃杯茶來。」

八 列寧夫人的回憶

當時列寧的私人生活究竟是怎麼個樣子？許多人都對這個問題感着興趣。列寧夫人在她的列寧回憶錄「關於烏拉狄密爾·伊里奇」的一書中，比任何人都描寫得精詳生動。現在我們引用一部分敘述如下：

「最近有很多人著述關於烏拉狄密爾·伊里奇。在那些回憶中，往往把他描寫成好像一個「聖人」，或是一個善良的信教的家長一般。其實他並不是那樣的人。他是一個絲毫也沒有越出常人範圍的人。他一生愛好各方面的生活，把各種各樣的生活吸收到自己方面來。我們的生活完全像「窮困」那兩個字所形容的一樣，但那不是真實的。我們並不是真窮困到連麵包也買不起的樣子。亡命的同志們果然都是那樣的過活了的嗎？也有互兩年之久毫無收入，而從俄國寄來的款項也停止了，誠有如文字上所描寫的那樣餓着肚皮的人們。但我們沒有這種情形。樸素的生活，那是

實在的，然而生活的快樂是在乎飽滿和浪費嗎？伊里奇懂得如何在生活之中追求生活的樂趣。他很愛好自然。關於在西比利亞的時代，這裏姑且不說，即在亡命中，我們也爲着要飽飽的呼吸一些大氣而跑到很遠的地方去。直到爲新鮮空氣所沉醉，爲運動所疲倦的時候，方始歸來。我們所取的生活方式，和其他亡命者的生活方式大不相同。他們歡喜聚攏來慢慢的飲着茶抽着煙談個不休。可是伊里奇却常常感覺到這種饒舌的疲倦而說要去散步。在我們亡命生活的頭一年，有一次馬爾托夫和安娜·伊里尼綺娜（列寧的妹妹）來，要我們陪他們一塊兒去看看我們喜歡去的地方——充滿着野趣的伊塞耳（Isar）河岸。到那裏去是必須要穿過一條荊棘的小路的。可是不到半小時的光景，他們就感覺疲倦了。我們祇好用渡船把他們送回市中心，我們這纔回到我們自己的地方去。即使是在倫敦吧，我們也總要設法去融和在自然的懷抱裏。不過要想逃出那爲煤煙所污，爲迷霧所吞的都市，特別是因爲要乘公共馬車不化費到一個半便士以上，是不大容易的事情。

「後來在瑞士，我們買了一輛自行車，於是我們的散步領域便擴大了。有一次在倫敦，有一位先生，認為伊里奇祇是一個埋頭工作或者死坐圖書館的人，對於他的散步非常的奇怪起來。記得維娜·紮絲麗綺也不滿他的這種行為，說「他太愛好自然了」。我以為「那是實在的」。

「伊里奇還非常喜歡觀察各國人的生活狀態。我們閱行，倫敦，巴黎都去過。他就愛尋覓各色社會主義者，在小咖啡店或者在英國教堂裏集會的廣告。他不論什麼時候都留心考察德國，英國，法國等國勞動者的生活。他不在大的集會上去觀察同志，他留心在親密的同志之間，考察他們說些什麼，想些什麼，以及過着怎樣的生活。他祇有在巴黎選舉以前的一次集會不會到。在巴黎我們也曾有過眷念着一個法國革命俳優的時代。伊里奇也是一個非常天才的革命歌謠的作者，並且還是一個唱歌的能手，和蒙台久斯還是很好的朋友。巴黎共產黨員的兒子蒙台久斯是勞動街上的名人。伊里奇一時高興起來，高唱過他所作的「第十七聯隊的兵士們喲，向你

們表示敬意」的一首歌。這是一首歌頌法國兵拒絕向罷工工人開槍的歌謠。伊里奇對於被無自覺的農民所選舉，每年有一萬五千法郎之收入，在國會中諷刺出賣人民自由之社會黨的這位蒙台久斯先生的歌，愛好得了不得。我們常常去看戲。伊里奇喜歡在巴黎陋巷中的戲院劇目上，尋覓蒙台久斯演出的廣告。我們常常手拿着一張巴黎的地圖，跑到很遠很遠的陋巷中的戲院裏去，在那裏和羣衆一塊兒看那法國的布爾喬亞所稱賞的，充滿猥褻而感傷的，教育勞動者的戲曲。接着，蒙台久斯出台了。勞動者們雷震一般的鼓掌歡迎他。他穿着工人風的皮外衣，和法國的工人一樣；頸項上圍着一條手巾，憤激的唱着，諷刺着布爾喬亞，鼓勵着勞動者的互相扶助。巴黎陋巷中的羣衆——勞動者羣，一旦看見劇中有戴着流行的高帽子的馬丹 (madam，意即貴婦人)，走到要使得滿場憤慨的地地方來，便轟轟然的怪叫起來。「畜生，壞種」——勞動者們向那扮演對年青的女婢喋喋不休的女主人的脚色，這樣的惡罵。伊里奇便喜歡混和到這種羣衆中去。蒙台久斯曾在我們俄國人的

夜會上出演過一次。演完以後，半夜深更的和伊里奇對坐着，談着關於世界革命的事。這兩位一個是巴黎共產黨員的兒子，一個是俄國的布爾希維克，談着關於各個人所懷抱的未來的革命。所遺憾的是，蒙台久斯從戰爭一爆發的時候起，便彈着愛國的歌調了。

「還有另一個時代，這就是到處光顧選舉以前的演說會。因為勞動者的家庭無人可托，於是便攜着孩子們前來集會。那裏有許多誘引民衆，使人感動的演說家。在會場上我們曾被一位用興奮的眼光凝視着雄辯家的鐵匠，和一位與父親同樣傾聽着演說的兒子的姿態恍惚住了。我們聽見過社會黨議員怎樣在勞動者面前演說。我們也去聽過同是他們這些人，在知識分子和官吏聽衆居多的演說會上，又說些什麼。我們看見了那種震盪勞動者集會之偉大而熱烈的思想，經同一個雄辯家在小布爾喬亞泥面前，是怎樣的塗上一些柔和的顏色。所有這些，都無非爲的是要更多取得些投票。從這些演說會上歸來的伊里奇，口裏總是哼着蒙台久斯諷刺社會黨議員

的歌曲。

『在倫敦，爲着要聽佈道大會的演說，我們常到海德公園(Hyde Park)去。』
個人演講關於神，另外一個人又喊着店員的生活是如何的悲慘，第三個演說家則論着改良公園的問題。我們也到過倫敦的猶太人街。在那裏和俄國人的水夫們以及猶太人的貧民們談得非常親熱，還聽過他們表示深深絕望的歌唱。還有一個社會主義者的「七姊妹」教堂我們也去過，見到一位社會黨的黨員當了社會主義的牧師，幹着一種奇特的說教。在他以前有一個年青的雄辯家演講關於地方自治的社會主義。他說猶太人之逃亡埃及，是勞動者從資本主義的王國逃亡到社會主義王國的模範。這位年青的雄辯家顯然是帶有機會主義的傾向。』

九 視察外國的勞動運動

其他俄國的舊社會主義者們，雖然住在外國，但是就像某人吧，他從不會出席

過勞動者的集會。可是列寧對於外國勞動者的集會，却感到非常的興趣，深深的留意觀察着。克盧普絲茹雅女士所說的，和其他同志們所說的是毫無二致。托羅茨基(Троцкий)在他的「列寧與舊火花」中，也追憶過他在倫敦的時候，常和列寧一同去參加這一類集會的事情。他說：

「在某一個星期日，我和烏拉狄密爾·伊里奇，克盧普絲茹雅女士三個人一同到了一個唱着敬神的讚美歌的倫敦社會主義的教堂。在那裏講道的，的確是一個從澳洲回來的排字工人。烏拉狄密爾·伊里奇把他那小聲的，至少在當時可以算得是革命聲調的演說，翻譯給我們聽了。隨即看見聽道的人們全體站立起來，口裏似乎唱着「萬能的主啊，領我們到社會主義的王國吧」這一類意思的歌。後來走出教室，伊里奇向我們說，「在英國的普羅列塔利亞之間，革命的社會主義的要素倒培植下來了。不過總是和保守主義飽和着，爲宗教與信仰所凝固，無論如何是不能突破外殼而置自身於自由的」。我在這裏附帶的說一說絮絲麗綺，馬爾托夫等都祇完全

埋頭於火花的工作，把英國的勞動運動當做好像與自己不相干的這件事，想來不是沒有意義的事吧。列寧則不然，他總是單獨的研究着英國勞動運動的流派。」

關於這些事，葛耐夫也有同樣的追懷：

『列寧一到晚間，就去參加英國人的演說會——我和他同去過好多次。一半雖是爲着政治的趣味，但一半也是爲着他非常熱心的學習英語，實習會話的原故。他會就某個知識分子的地方學習英語和英國文學，同時他教俄語和俄國文學以爲交換。因此，在我未到倫敦以前，在那裏祇不過住了一年光景的列寧，已經能夠自由的說英語了。在這一點上，他和其他的亡命客是不同的。例如維娜紫絲麗綺到商店裏去買東西，必須要指着東西問價錢，她和列寧比較起來就有霄壤之別。列寧唯一的娛樂，是常到他所愛好的音樂會去。』

十 列寧爲人的風趣

列寧在那時候就成了追求革命運動，與夫獻身於革命運動的人們的柱石和中心。他的那種探尋人們生來的素質和各人的所長，以給與適當工作的見識，使所有的人都佩服。例如托羅茨基，就曾把蒲列哈諾夫和列寧兩個人的素質比較的在其回憶錄中敘述着。I·麗麗娜女士，關於列寧是怎樣的吸引着青年們，也有如下的一段追懷。

「他是怎樣的在人們面前披瀝着胸襟？又是怎樣的接待着日漸衆多的黨的青年？他在同志們關於某事需要了解的時候，便纏綿不絕的給以詳細的說明和解釋，從無倦意。祇要一向烏拉狄密爾·伊里奇說一聲「我不大懂，請說明一下」，他便向之解釋，比喻，訓誨，非至對方完全領會不止。青年們體會得烏拉狄密爾·伊里奇的這種性格，不由得不尊重他敬愛他。即使是一件很細小的事情，他也絲毫不吝指教。關於這件事，我倒想起了一件事——季諾維埃夫，烏拉狄密羅夫，斯太夫斯基等三個人，有一次爲着去訪問蒲列哈諾夫和列寧，特由柏林跑到日內瓦(Geneva)。

後來他們三個人在我面前談着和他們兩個人會見的印象。

『斯太夫斯基向我說：

『蒲列哈諾夫招待我們到應接室，用很小的茶杯饗我們以咖啡。像我這樣的勞動者，讓我坐着弱小的椅子，拿着小的咖啡杯子，我真感覺到危險。蒲列哈諾夫教訓了我們一頓，並且祇是教訓了我們一頓而已。可是後來到列寧的地方去，不料他竟領我們到他自己的房間裏，互相長時間的談起話來。談話後，便饗客以茶。他又領我們到了廚房裏，那裏的桌子上放着盛滿着開水的藥罐和茶碗，麵包，牛油之類的東西。拿對資達·康絲坦娣洛維娜女士又倒茶來給我們。我們之間於是痛快的談着俄國的形勢以及黨內的問題。及至和他告別的時候，還有些戀戀不捨的樣子哩。』——他們三個人都這樣的向我談起這件事。

『記得又有一次布爾希維克派的安德萊夫告訴我說，他向蒲列哈諾夫問：「足下在大會的時候，和布爾希維克取着一致的行動，爲什麼後來又跑到孟塞維克

那一方面去了呢？可否說一個道理給我聽聽？」蒲列哈諾夫聽了這話，便大發雷霆的說：「你向我這樣的質問還談不到，當你還在追隨着你的父親和母親的時候，我已經就是社會主義者了，你知道嗎？」

蒲列哈諾夫用這樣的警句來拒絕了同志們非常掛念着的問題，但是列寧就從不會有過一次用「你還年青」這樣的理由來威嚇同志們。同志們年青倒反而使他歡喜。因為他和同志們以及同志們和他總是一塊兒如青年一般的共着事的，列寧是這樣的使得受着他的感化在他底下學習着活動與鬥爭的青年黨員成長起來，教育了他們。

柯哲維科華女士也說：

「隨便什麼時候也不會忘記的，便是烏拉狄密爾·伊里奇所發揮出來的精力和使人感服的魄力，以及他的那種終日愉快的工作的精神。我們從他那裏學習了不使精力疲倦，總是適應着環境，任何事件該當今日做，決不延至明日，總是盡可能的把他處理掉，以及像這一類的工作方法。我們又從他那裏學到愛惜工作，在責任之

前，決不以爲恥的幹着；在把工作移交給別人的時候，總先要把自己所應盡的義務和責任完成；對於工作，總是正確的，着實的，並且在工作上，愛工作如自己的生命一樣的那種精神和態度。」

十一 布爾希維克黨的誕生

布爾希維克黨是一九〇三年組織起來的。在社會民主黨的第二次大會以後，即自一九〇三年以來，始被稱爲布爾希維克黨。這一次的大會是在外國召集的。雖說是比贊成馬爾托夫和蒲列哈諾夫的票數並不多幾票，但大會的多數是屬了列寧。布爾希維克（多數派）和孟塞維克（少數派）的名稱就是從這兒產生的。在許多人看來，大會的爭點是一件極細小的事情。甚至有許多人連所爭之點在什麼地方都還不知道。許多人都以爲馬爾托夫所提議，大會所通過的，在黨規中無論如何規定，不都是一樣嗎？都說「凡承認黨的綱領；以物質的方法支持黨；並且對黨，在黨的一個

機關的指導之下作個人之盡力的，皆得爲黨員」，這和列寧所提議的黨規第一項「凡承認黨的綱領，並且在黨的機關之一中，以物質的方法與個人的參加支持黨者始得爲黨員」，有什麼兩樣呢？換句話說，即一方面主張的是凡同情於黨的綱領和目的者皆得爲黨員，另一方面主張必須確切的於黨中工作者始得爲黨員。這在表面上看來，固然是沒有多大的區別。所以有一位出席大會的老工人說——在他聽到爭論的時候，他簡直不知道所爭的是什麼。他在會場的廊沿下，想抓住一個論爭者之一，勸他們「不要徒弄無謂的口舌」。但是，從這細小的意見之不同，到後來便生出重大的意見之懸隔。所謂「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就是這件事的說明。最初的問題是：黨應該由參加黨的機關的各個人，即由對黨的機關作親密之個人的參與的同志組織呢，或者由在黨中不參加黨的機關，換句話說，即由不論於何處工作，祇要對黨作個人之盡力的人皆得爲黨員以組織黨。

時至今日，問題是愈益明顯了。茲爲更易於究明問題起見，再取一個實例，說

明如下。

譬如在俄國，現在是不乏援助俄國共產黨的團體存在。在布爾希維克的提案上，是僅以實際已經加入了黨，在黨的機關中工作，服從黨的全部決定，履行其全部決議的人始得爲黨員的。可是孟塞維克則認爲雖不是共產黨員，對共產黨的決議不負責任，祇要加入了援助共產黨的團體的人，皆得爲黨員。問題是在於列寧要求，要嚴格選擇黨的內容，並且要不因徘徊動搖的各種分子的波濤陷黨於洪水之中。孟塞維克則謂：「我們應該要求連教授，中學生們都須要直接在黨的內部工作嗎？」布爾希維克的回答是：「沒有這樣的教授和中學生也行吧；祇要加入黨爲黨員，在黨內活動的勞動者分子多……」在這個問題上，列寧這一方面是少數。但是在勞動階級應該怎樣鬥爭的這個問題以及其他的問題上，列寧在大會中却取得了多數。

在這次的大會上，不消說，列寧爲堅持其見解，是猛烈的反對了馬爾托夫一派的。其論爭之激烈，在一件很小的事件上可以表現出來。當選舉誰應該參加「火花」

的新編輯局時，列寧提議蒲列哈諾夫，馬爾托夫，以及他自己。可是在這久長而激烈的爭辯之餘，這一提案雖被大多數通過了，但馬爾托夫則依然拒絕參加。

這一番口角——在籠罩着倫敦會場的恐怖大氣中，業已久遠而似乎是成了抽象的事件的那一番激烈的冒罵，在今天看來，似乎是事過境遷了。可是牠們是成了歷史而保存下來。但是這個年青的黨就這樣的在誕生的時候就分裂了，却也不是偶然的事。有些參加會議的代表似乎是爲那爭辯而感覺得鬱悶，但列寧在他的「一步前進，兩步後退」的著作上。敘述着一段和一個「中央」的代表的談話。

「在我們這會議上，空氣是如何的沉悶啦」，他怨然的向我訴說。「這樣激烈的鬥爭，這樣互相的攻擊，這種尖銳的論駁，這種非同志的態度！」

「我們這會議是多麼光榮啊」！我回答他。「有機會給我們公開的鬥爭，給我們發表意見，各種傾向也表露出來，派別也分清了一舉手便表決了。宿營撤去了。前進吧！那是我所喜好的！那便是人生！那是和無結果的倦怠的知識分子間的辯論

不同。他們結束了，不是因為他們把問題解決了，而僅僅是因為疲於討論了。」這位「中央」的同志看着我，一若無所措的樣子，聳了一聳肩。我們是用不同的言詞談了話的。』

當時出席大會的多數人，已經覺得勞動階級在自身的鬥爭中，非將在人民之中最受壓迫的小資產階級農民引到革命的同盟上來不可了。布爾希維克在那時候就已經知道，在奪取政權的那一瞬間，必須要有農民與勞動階級共同行動纔行。所以他們從那時起，就立下了特別與農民接近的方針。然而孟塞維克則聲言與政府鬥爭的，是布爾喬亞泥，印貼利更追亞，以及進步的布爾喬亞泥，勞動階級反而會刺激這些布爾喬亞泥的感情，而且要使他恐怖起來。

「布爾希維克」的名稱就是從這兒發生的。當時略稱布爾希維克爲「B·K」，稱孟塞維克爲「M·K」。對彷徨於兩者之間的，則稱爲「非B非M」。

直到後來，纔知道分裂的原因是由另一個問題。那問題是關於革命中普羅列塔

利亞的任務與意義，農民的任務，以及奪取政權等的問題。

總之，在俄國，革命運動是開展了。一九〇二——三年的羣衆的罷工運動開始了，羣衆的農民騷亂，對大地主之莊園的掠奪也爆發了。知識階級，尤其是青年學生也感覺到國民大衆都出動了。這些知識分子也突進起來。當時，所謂學生騷動也表露出來，並且大學生還向政府提出政治的要求。還有所謂自由主義者——以爲俄國的專制制度非改革不可，貴族的支配權非縮小不可，而成爲新興勢力的布爾喬亞商工業者的支配權必須擴大；並且主張知識階級必須取得參政權，在不觸犯布爾喬亞制度的基礎，不損害資本家與大地主的條件下，應該把國民纏轡略鬆弛等，像這一類有教養的人們也動搖起來。在地方自治派中也有這種自由主義者，尤其是在官吏，公務員，醫生，技師，教育家之間，這種人特別多。

當時社會革命黨(簡稱S·R黨)也一面重復其腐臭的俄羅斯之特殊性，俄國沒有真正的勞動階級等類的無稽之談，一面也着手進行於政黨的樹立。

社會革命黨自稱是農民的真實好友。——在他們之中也許有精神上真是農民之友的，不過不懂得真正的途徑罷了。這些人，後來大都脫離了S·R黨，而加入到布爾希維克這方面來。——他們打着「到民間去」的口號，為農民籌劃着「土地與自由」。他們的手段便是運用恐怖政策，專一圖謀暗殺皇室要人；他們大多相信用這種手段可以改良制度，獲得自由。自由主義者則代表的是新興布爾喬亞氾的利益，也是專一圖謀暗殺重要官吏，以取得布爾喬亞氾的自由。實際上S·R也好，自由主義者也好，祇不過是用不同的方法，朝着同一個方向走而已。S·R向政府和沙皇說：「給我們憲法呀，否則我就要暗殺你們」。自由主義者也說：「給我們憲法呀，否則我就要槍斃你們。」

這樣一來，勞動階級便成了看客，剩餘在看客的席上了。列寧當時便已經豫料到，他們是在演着背叛革命的角色。所以他在三十餘年前，就擁護了「這些政黨的行動是阻礙普羅列塔利亞之統一政治的獲得與社會主義的完成，以及對專制獨裁

政權之整個國民鬥爭的」這個決議。列寧主張：「我們黨的任務，是在要使勞動階級參加鬥爭，使他們爲示威而跑上街頭；不僅使他們向資本家要求工資的增加，並要使他們向政府作政治的要求；我們不僅要在勞動羣衆間活動，且要在農民羣衆間活動，設立黨的領導機關。」當地方自治派及其他知識分子向政府提出請願書的時候，孟塞維克便高興的說：「看吧，他們對於勞動階級是多麼好的同盟者，勞動階級自己不應當使得布爾喬亞汜恐怖，這是最聰明的辦法。」

托羅茨基記錄着一段列寧和維娜·紫絲麗綺（後來成了孟塞維克）的關於自由主義者的談話。自由主義者，當時爲取得憲法的頒佈，曾欲利用勞動階級的鬥爭，與社會主義者提攜。但是，那憲法是立憲民主派的布爾喬亞必要的憲法，却不是勞動者所希望的東西。那時候，立憲民主派的首領斯特魯威和米留可夫（*M. N. Mikoyan*）跑到國外，辦了一個名叫「解放」的祕密刊物。但是這個刊物是沙皇的大臣們感到滿意而讀着的東西，是唆使他們鎮壓民衆，誠惶誠恐的奉仕於專制主義，擁護

資本家和大地主的東西。

列寧是毫不容赦的曝露了這種欺騙。這是沒有被孟塞維克所注意到的事。托羅茨基把紮絲麗綺女士對列寧的行動認爲是非常的唐突這件事表露出來。

「……」請看啦，他們是怎樣的努力着和我們聯盟啊！」紮絲麗綺避着列寧的面而特爲要給他聽的說着。「在最近的『解放』上，斯特魯威不是在向俄國的自由主義者們說着叫他們不要和社會主義者斷絕關係，否則，德國自由主義者那樣可悲的運命便要威脅到俄國自由主義者的頭上來，並且舉着若累斯（J. L. Jaures）爲例，要求他們學法國急進主義者對社會主義者的先例嗎？」

「列寧戴着一頂沖巴拿馬的帽子，立在桌子旁邊。會議已經散了，他正打算歸去。

「所以依然有打擊他們的必要。」列寧故意要使得紮絲麗綺心裏不舒服的樣子，輕輕的微笑着說。

「噢，是啦，是啦！」她完全絕望的叫喊起來。「他們帶着好意不遠千里而來，我們倒要給他們打擊。」

「那自然啦，斯特魯威向他們那一派的自由主義者們說的是——叫他們不要學德國自由主義者那樣的愚蠢的對待俄國的社會主義者，要學更巧妙的法國的例子，非要使得他們依照和若累斯妥協了的法國布爾喬亞急進主義者的流派，去誘惑，籠絡，欺騙，墮落不可。」

十二 「兩個策略」與「給貧農」

列寧是這樣毫不客氣的嘲笑了自由主義的與孟塞維克的聖人們，曝露了自由主義者與地方自治派中立憲民主派的虛偽和欺騙，指出了在勞動階級裏面有勞動階級本身的道路，勞動階級必須徹底的前進。可是另一方面主張勞動階級此時不應該與自由主義者以打擊，不應使得自由主義者恐怖，而應該與之提攜。這便是當時「B.

K「和」M・K」的兩個不同的態度。「兩個策略」是列寧當時關於這個問題所著作之論文的題名。

列寧當時雖然打擊自由主義的布爾喬亞，曝露他們的虛偽和欺騙，反對與之提攜。但是列寧決沒有反對與自由主義的布爾喬亞作一時的局部的提攜。他祇反對把自由主義的布爾喬亞與普羅列塔利亞站在一條線上去同等的看待。他認為與自由主義者的提攜，祇有在對於普羅列塔利亞有利的場合，纔可以與之締結協定。他指示出自由主義的布爾喬亞畢竟是布爾喬亞，因而他們決不願意和普羅列塔利亞在革命中提攜到底；他告訴勞動階級要知道並且不可以忘記普羅列塔利亞在政治鬥爭中爲着自身最後的目的，卽愈是接近普羅列塔利亞革命，則自由主義的布爾喬亞將愈成爲反革命的。所以和自由主義的布爾喬亞提攜，祇能是短時期的，並且是革命過程中極短的一部分。

列寧在一九〇三年爲農民而寫的著作中，已經把這件事情指出來。這個著作名

爲「給貧農」。在這個著作中，列寧向農民說明了爲什麼必須起來與普羅列塔利亞聯合，向自己的敵人布爾喬亞汜對抗。他說：

「沒有土地的農民從什麼地方賺錢呢？爲着賺錢便不能不找「工資勞動」。有一匹馬的農民，也和連一匹馬也沒有的農民一樣，祇好由「工資勞動」來度日。「工資勞動」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有一匹馬的農民，一半，把他的主人的資格放下，成爲被雇傭的人，成爲普羅列塔利亞。這種農民叫做半普羅列塔利亞。他們也和都市勞動者是親生的弟兄，因爲一切的主人用着一切的方法，把他們聚集於自己的剝削之下。他們爲着對一切的富農，對一切的私有者鬥爭，除團結起來與社會民主主義者聯合以外，沒有別種逃避的方法，沒有別的得救的方法。敷設鐵道是誰在勞動着？承包人剝削什麼人？是誰在山中伐木？是誰在水中運木？是誰佃作？誰變成日傭勞動者？誰在都會的碼頭上幹着臨時的勞動？——這不都是貧農嗎？這不都是沒有馬和祇有一匹馬的農民嗎？這不都是農村的普羅列塔利亞和半普羅列塔利亞

嗎？而且在俄國這種人是怎樣的多啊！在俄國全國（除卡夫加資和西比利亞外），每年就有八百萬，有九百萬人的旅券發下來。這都是出外做工的勞動者。他們名義上是農民，實際上是被雇傭者，勞動者。他們全部非和都市的勞動者結成同盟不可。照臨農村的光輝將藉這同盟的力量而強烈起來。」

當時貧農，農村普羅列塔利亞以及半普羅列塔利亞的階級意識，常常爲富農反對大地主的事實所蒙蔽。所以列寧又向農民警告道：

『每個農民試把各個自己的周圍觀察一下吧。富裕的農民們是怎樣的在唱着反對支配階級和大地主的論調？他們又是怎樣的在訴說着給與人民的壓迫以及支配階級的土地日趨荒廢的苦況？他們又是怎樣的在喋喋不休的說着要把土地由農民之手取回來。我們可以相信富農們的這些話嗎？不，他們之希望土地並不是爲着人民，而是爲着自己呀？他們已經把分割的土地和租借的土地都弄到手了，但是他們還覺得不夠哩。所以農村的貧民和富裕的農民一同去反抗地主，總是不能繼續。我們祇可

以在最初的一步上和他們一同出發，到了後來便各走各的路了。爲什麼要把這最初的一步和其他的步數，即後來的步數明確的區別開來呢？農村中的最初一步是要求農民的完全解放，爲返還被分割的土地而設立農民委員會。最後的一步，都會與農村一樣，是要沒收一切土地，沒收一切工場企業，建立都會勞動者與農村貧農的聯合政權。在最初的一步與最後的一步之間，必須要經過不少的鬥爭，而把最初一步與最後一步混爲一談的，纔是要妨害鬥爭，要在無形中蒙蔽農村貧農的眼睛的人。

「最初的一步是農村貧民和一切的農民一同出發的。即令是農村的榨取者，一百個農民中或許有個把不惜附庸於大地主，但所有的人們總是一同舉步的，因爲全部農民都感覺有平等權利的必要。對地主的附庸關係是要束縛一切人們的手足的。然而最後一步則斷斷不會一致了。那時候，所有的富農將起來反對貧農。因此我們豫料，貧農有和信任社會民主主義的都市勞動者締結堅強同盟之必要。向農民說最一步和最後一步都可以一致的，那是欺騙農民的人。那是忘記了在農民本身之

間，有貧農與富農之偉大的鬥爭的人。」——「給農民」

列寧在當時便已預料到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後所發生的現象，以及在內亂中「白」派顛覆了蘇維埃政權的各地地方所發生的各種現象的可能性。

「或許富農立刻與大地主分手，想要推翻大地主的政權也未可知。好的，那是我們非常希望的。並且社會民主黨將向農村與都市的普羅列塔利亞勸告作沒收在大地主之下的所有土地，將此項土地提供於自由的人民國家的要求。社會民主黨將以其炯眼監視着農村普羅列塔利亞，在這時候，不受欺騙的，讓他們爲最後的鬥爭與普羅列塔利亞的完全解放，更強固的團結起來。」

「恐怕不會有這樣的事，並且已經沒有這樣的事了。富農和許多知識階級分子祇要一旦把大地主之不良的附庸關係加以限制，加以剝奪，立刻即將與之提攜，一切農村布爾喬亞泥將起來反抗農村普羅列塔利亞了吧。那時候，我們如果祇向大地主鬥爭纔是滑稽哩。那時我們一定要向所有布爾喬亞泥鬥爭，爲使得鬥爭有利，首

先必須儘量的要求多量的自由，爲使勞動者的鬥爭容易起見，必須要求其生活的安全。總之，無論如何，我們第一主要的工作是在於加強農村普羅列塔利亞以及半普羅列塔利亞與都市普羅列塔利亞的同盟。」——「給貧農」

須知道，列寧在一九〇〇年的初頭，就已經把社會民主主義者對中產農民的態度，與他們在革命的立場給以充分的說明了。列寧在「給貧農」中說：

「不論在什麼地方，凡是在富者與貧者，私有者與勞動者之間開始鬥爭的地方，中產農民位於其間，是不知道應該往那一方面去的。富者要他們到自己這一方面來，便說：「你們不也是主人嗎？你們有土地呀！你們和一無所有的勞動者有什麼關係呢？」勞動者又說：「有錢的人輕視你們，束縛你們，你們在一切與富者的鬥爭，除參加我們這一方面，是沒有得救的方法的。」關於這種中產農民問題的論爭，在社會民主主義者爲勞農階級解放而鬥爭的任何地方任何國家都有。在俄國，這種論爭還剛開始。因此，我們特別仔細的調查這件事，富農在用着怎樣的欺騙政

策誘引中產農民？我們怎樣的把這種欺騙打到清水裏面去？怎樣的去援助中農發現他們的真實的友人？這些事情都有明白理解的必要。若是俄國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立刻就站上真實的道路，則將能比德國的同志兄弟們更快的結成地方勞動者與都市勞動者之強固的同盟，勤勞大眾將能迅速的走上對其敵人之勝利的道路上去。」——

〔給貧農〕

十三 蒲列哈諾夫與列寧

上面都是說列寧怎樣透澈的認識了農民階級與其他階級的關係。尤其是列寧在分析究明各種階級對革命的態度上，黨內簡直找不出可以比類的人來。是後一切的鬥爭都證實了列寧之估量與分析的正確。然而當時却有許多人認為列寧觀察得非常「狹隘」，而說他是異教徒。這是因為他的非妥協的，確信的精神，以及對他自己所認為正確的問題堅持了不動搖的忠實的原故。

布爾希維克，即列寧派也曾被人給了一個「硬漢」的綽號。然而在爲着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利益之必要的場合，「硬漢」是少不了的。往往因傾向之不同，即連斷絕私人的交誼與一切的關係也是必要的。昨日的好友今日可以成爲不相容的仇敵。

列寧因見解之不同，當然不得不和親密的同志斷絕交誼。有許多人甚至以爲列寧是一個冷酷的人，是沒有個人愛的人。但是決不是這樣的。然而在爲着勞動階級的事業，必要分裂的時候，他是不惜與其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同志分裂的。這在他一生的事業上都是如此。關於這，克盧普絲茄雅女士在她的回憶錄「關於烏拉狄密爾·伊里奇」一書中說得好：

「烏拉狄密爾·伊里奇最愛朋友，並且是熱烈的愛朋友。譬如他和蒲列哈諾夫就是一個例子。蒲列哈諾夫在列寧的成長上給了很大的感化，是援助他尋覓正確的革命道路的人。並且蒲列哈諾夫對於他有長時期的光榮。無論一件怎樣微細的事，祇要他和蒲列哈諾夫發生了衝突，他便感覺得非常痛苦。在分裂之後，他也常常傾

其注意聽着蒲列哈諾夫所說的話。他最高興聽到蒲列哈諾夫說的「機會主義者不願死」的一句話，把這句話不知重覆多少次。當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伊里奇一方面準備着在蒲列哈諾夫應該出席的洛桑演說會上反對戰爭的提案，一方面還非常擔憂的說：「他是不應該不理解的」。在同志萊伯辛斯基的回憶錄中，有一個完全不對的地方。萊伯辛斯基在書中說有一次列寧向他說，「蒲列哈諾夫在主義上是死了，但我則活着。」這是不會有的事。大概是萊伯辛斯基聽錯了吧。伊里奇從不會和蒲列哈諾夫對比過一次。年青的同志研究共產黨史，恐怕也不能正確的把握和孟塞維克分裂的理由是什麼吧。

『伊里奇非但愛蒲列哈諾夫，並且也愛紮絲麗綺和阿克賽羅德。伊里奇在我到閱行的第一天晚上，就向我說：「你可以看看維娜·伊華諾芙娜（紮絲麗綺），她是一個極純潔的人。」他並且也曾長時間的爲阿克賽羅德的光榮所圍繞。

『最近，他在將死的不久以前，還拿阿克賽羅德的事情來問我。指出報紙上登

載的他的名字問我：「什麼？」要我打電話去問卡美萊夫（Kamenev）。我在打電話的時候他就熱忱的聽着電話中的談話。當我把卡爾莫伊科瓦的事情告訴他的時候，後來他又問我：「什麼？」我知道他問的是婆陀萊沙夫的事情。我把我所知道的告訴他了。他還叫我「再詳細的調查一下」，並且做出否定的樣子搖搖頭。他在已經不能發出聲來的不久以前還向我說：「不是聽說馬爾托夫也死了嗎？」他的說話之中，完全籠罩着一種柔和的聲調。然而對人們的個人愛却不曾有一次影響過伊里奇的政治立場。他不論是如何的愛蒲列哈諾夫，愛馬爾托夫，然而在工作上的必要上，政治上也非絕緣不可。隨着政治的絕緣，於是他和他們個人之間也就不得不絕交了。如像整個的生活繫於政治鬥爭的他，却也不得不如此。

然而伊里奇對人們的個人愛。在分裂使他感到非常痛苦的事情上可以表現出來。現在我還記得，當第二次大會上，與阿克賽羅德，紮絲麗綺，馬爾托夫等的分裂，業已表明不可避免的時候，他是如何的苦悶啊。他徹夜的坐在那裏興奮着。假

若伊里奇對人們的個人愛不是那樣熱烈的話，他或許不會這麼早死吧。他的那種睿智和自己的判斷以及行爲中所含的政治的良心（在這句話的真實的深刻的意義上）超過了一切親睦和反感，是任何人所不能有的，即在有這種良心的人，這也是不容易的事。

「伊里奇對於人類也常有莫大的興趣。人類這個東西的一種不斷的「誘惑」，在他也是有的。一旦發現人類中什麼有趣味的一面，他便會被那個人所吸引。記得他和那位以其組織的天才誘惑了他的納坦生（Natanson，民意派的首領之一——編者），還有兩個星期的「羅曼斯」——這祇不過是一個逸話罷了……伊里奇常常會見由俄國來的人。隨便什麼時候，因伊里奇的談話，人們總是被他的神氣所吸引，不知不覺間在他面前把自己的靈魂之善良的部分表現出來。披露着真實的「我」。這在他們的工作關係上，進行上，結果上都反映着。他們總是把自己的工作詩化起來向伊里奇報告。伊里奇是可怕的爲人們所魅，也爲工作所魅。這種誘惑也就川流不息

的來纏繞着他。所有這些把他的生活極頂的豐富起來，使之緊張，使之充實。他把生活在所有生活的複雜性與多面性中吸收着。卽令聖人——禁慾家，恐怕也不會是這樣的吧。」

第四章 第一次革命的時代

一 戰爭與叛亂

這時俄國的工人之進步遠過了九十年代彼得堡罷工的時代，而列寧是抓住了其中之有力的部分的。一九〇二年，在羅斯妥夫（Rostov）與一些別的都市裏，他們參加了學生羣衆的政治示威，在街頭上和警察與憲兵巷戰。在這後一年中，有一次總罷工幾乎彌漫了全南俄。大批的工人們如狂潮一般擁進一個被禁止的集會，那時社會主義的演說者正在廣大的羣衆面前向專制政治挑釁，說暴風雨的種子是由俄國專制政治播散而其收穫當然是一個巨大的果報，但是監視着集會的警察也不敢怎樣

施以干涉。

在農村方面，則情形也不見得好些。租稅以及土地的價格過度的騰漲起來。在地主一方面，則收穫日見其豐，並且大獲其利的運至歐洲市場上去銷售。在農民一方面，則受着不堪忍受之債務重重的壓迫，使用牧場受着百般的限制，悲慘的運命，有增無已，眼睜睜的看着他們的農場荒廢，他們的收穫喪失，而飢餓與窮困則相繼襲來。不僅這樣，他們之中雖也有一小部分由於某些事情的改良，可以發達起來，可以領有一個碾米機，可以雇用幾個勞動者，或開闢一處果園，或存款於土地銀行。但是這種改良的途徑，祇有使得廣大的羣衆對地主的怨恨愈益深沈，對土地的慾望更加迫切，而他們之要求真實意義上的「解放」的實現也就可怕的厲害。但是事實上，他們較往日農奴的身分反更爲惡劣。他們反而因爲解放失去了最好的土地，他們的肩上加上了債務的重荷，而地主雖不復能以之交換獵犬，然而也沒有義務去維持他們的生存了。在另一方面，則由當地地主豪紳委任的村長對於他們的統

治，則藉助於村警——另一種可恨的，新改革，動輒與以可以說是殘暴的鞭笞。

在烏克蘭 (Ukraine) ——俄國土地最富腴的地方——的許多鄉村中，農民已經沒有什麼可希望的了，把死也置之度外了，在一九〇二年發生了一次叛亂。在這叛亂中，地主的房屋被燒掉，喊出了分配土地的口號，有些富於迷信的農民則固執的相信「小天父」(Little Father)——沙皇——是同情於他們的，將幫助他們反對地主豪紳。當成羣結隊的兵士衝至他們的面前時，他們還相信兵士們是不會開槍的；在大屠殺公然開始了以後，他們還說：『小天父——沙皇對於你們這種行為將與以懲罰。』

繼此以後的鎮壓是更可怕的酷烈起來。人們動輒被鞭笞至死，囚禁至數月之久，再拖出來，已經是半痴了，不成人樣了，還要送至法庭判以發往西比利亞的礦山上充奴隸之罪。罪犯的狀態已經是如此的惶恐了，而所確定的證據又是如此可怕的一種性質，但往往檢察官還必須給一個期限讓他自己到外面去休養，使復原狀。

樸列非(Plievé)——沙皇的親信，內務大臣——是一個由於鐵與血的政策取得位置的人，他在一九〇四年輕蔑的宣佈俄國「革命的人民」是宣傳者的無稽之談。但不久，被他自己的部下猶太人阿瑞夫(Azev)的暗殺組織炸死了。阿瑞夫是恐怖者的社會革命黨的中央委員，幾次想組織革命者暗殺政治警察的內應。然則他究竟是怎樣的負責任將他的主人炸死了的呢？

阿瑞夫祇自信以他的死與受嚴刑之自我犧牲及其熱忱作內應爲反專制政治的鬥爭。幾無懷疑的，他之作內應是受了人們的觀念之某種程度的影響，而他的高尚行爲成了對他的憎惡。樸列非是組織對猶太人殺戮的第一個政府大臣，他以殺戮猶太人作其反革命的一部分，雖然猶太人在革命分子中佔的數量極少。其最恐怖的行爲要算在比薩拉比亞(Bessarabia)的基新尼夫(Kishinev)了，在那裏，有好幾百個男女小孩子被謀殺了，全區都被劫掠又被焚燬，好幾千人都被弄殘廢或受傷了。自省長以至守備隊的司令，沒有一個人不參與其謀。

這在基新尼夫的屠殺畢竟被加於其主謀者的恐怖力量衝散了。知道他的入都說，阿瑞夫如同着了迷似的，當他聽到這個消息，不用懷疑的，那便是在他的心頭種下賭其不足道的生命之極大陰謀的機會——暗殺撲列非。

「革命」由使用炸彈手槍的無能為力的觀念論者表象着，不過是尼古拉及其幕僚們的預兆吧。那些知識分子，他們和下層人民的羣衆運動毫無聯繫，他們使農民空想化而忽然視勞動者。並且又因爲他的密探們，監獄，以及絞首架已經減少了恐怖主義者的數量，所以撲列非纔如是自信的聲稱俄國沒有「革命的人民」。阿瑞夫的暗殺陰謀便是給這個狂妄之自負的回答，但是另外還有一個，還有一個更可怕的在被歷史準備着。

帝俄向遠東方面的擴張，使得它自身不得不與新興而猛烈的亞洲資本主義的日本發生公然的衝突。日本自然要尋出一個時機來，報復它在一八九五年爲俄國阻止其取得中日戰爭後應得權益之辱。滿洲的佔領，戰略的新鐵道制度的建設，太平洋

上的要港——旅順與大連——之擄奪與築壘，所有這一切引起日本強烈的反抗。但是俄國有強有力的後援，不僅是由巴黎證券交易所 (Paris Bourse) 直接把法國的資本輸入俄國，尚有歐洲列強與以後援，因為在它們看來，俄國正是一個城防，而且是「文化」的憲兵。戰爭的避免或許是可能的，或者至少可以展緩，但是因為尼古拉自己的貪婪與痴妄，畢竟未獲避免與展延。

羅曼諾夫是一個大家族，其中有五十個人要由帝國的國庫供養，還有一個皇室的太子必須生活在一種適當的體統上。一位現代德國的小說家會滑稽的論到這著名的帝國舞曲學校當作是替這位大公的床第訓練夫人們的。但是縱令是一個歌舞的女子，好好的訓練，也必須要使成爲一個皇室的貴婦。他也曾小遊至歐洲，那些皇室隨從的遊民們也得計算在內。帝國皇族的預算遭逢着恐慌了，而尼古拉也決不顧非常識，便讓他自己被誘入莽撞的冒險以購買朝鮮的割讓。

這割讓可以有價值，也可以沒有價值，但日本是已經把朝鮮當作一個殖民地

了。俄國的侵入——沙皇的聲言——是不堪忍受的。但是聖彼得堡的朝廷則於一九〇四年的二月，毅然強行戰爭，相信這戰爭將是一個僅有的炫耀俄國軍隊的行動，對於這些軍隊則舉出一些奇異的理由，飾以妄誕的言辭騙稱他們決不會在戰爭中失敗。

爲什麼要和日本作戰呢？戰爭究竟是爲誰的呢？這都是俄國所不知道的事。但是龐大而繁重的戰爭機器却緩緩的漸漸開始活動起來。連遠僻的寒村荒野都不在例外，所有的農民孩子都被放在灰色的大外套裏面，兩肩上滿懸着戰時用具，新式的連珠砲他們拿不動，則以扛架運之而向萬里迢迢的西比利亞的征途前進。軍用列車則無晝無夜的向東方往遠離着的滿洲開去。千百萬的農民與勞動者被送上了爲護國而死的道路。

日本政府方面對於這個戰爭，不消說是相當的準備了的，但俄國政府則誇大的顛狂的認爲「日本不堪一擊」。最初的報紙上雖不斷的登載着某處獲勝，某處大

勝，勝利了！勝利了！等類的謊報，然而等到事實終於曝露了可悲的真相，則民衆間的動搖也就隨之而來了。

列寧最初就是反對這個戰爭的。他的一雙炯眼早就看到了在這個戰爭中，將爆發一個偉大的民衆運動，戰爭對於俄國的民衆，決不會平穩的結束的。而事實上，當俄國的艦隊在對馬（Tsu-hima 高麗海峽中的一島嶼——編者）全滅，旅順要塞失守，以及在瀋陽城外，遼陽，與夫鴨綠江一帶，俄國的軍隊遭了慘敗，無數的兵士遭了屠殺的時候，俄國軍隊的內部就已經開始發生叛變和騷亂了。

並且在這軍隊和艦隊的叛亂以前，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不堪忍受資本家之暴壓與不必要的戰爭之重負的勞動者們，相信沙皇可以給他們同情，決定前往宮廷直接向沙皇請願減輕他們的重負。這不是叛亂，而是請願。他們爲信賴沙皇，攜着十字架，幡旗，聖像，以及沙皇的肖像，排成行列，靜肅的向宮廷前進。他們既沒有唱「國際」歌，也沒有唱勞動歌或任何革命歌。他們祇唱着「天父啊，拯救我們吧，

人們都是屬於你的哩！」這一類的聖歌。而在他們的最前面率領着他們的又是一位爲佐巴托夫 (Zubatov——當時保安部長，憲兵司令) 所信任的青年牧師喬治·加逢 (George Gapon)。他們確信此番請願決不會受到何種的阻礙和留難。因爲他們不是沙皇的叛徒，而是疲乏了的孩子們走向他們的父親懷中去的。當時就聽到羣衆有人說：『我們到父親的地方去訴說那些強盜們是怎樣的使我們受着苦難。』

可是當請願的行列走出了大道，迎頭遇着的便是遮斷了他們去路的武裝軍隊。羣衆們還請他們讓開路來給他們前進，但是沙皇的軍隊則以槍擊來回答他們。

雖然如此，但是依然有成萬的羣衆衝進了宮前的廣場。然而廣場却被軍隊包圍起來了。在廣場的正面，則衝鋒的號聲吹奏起來。民衆們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擠進去看熱鬧的也頗不少。孩子們則攀上樹頂去看軍隊的操演。忽然從正面平靜的霧中揚起了微塵，接着便是連珠的槍聲，第一次的槍聲……第二次的槍聲……最後第二次的槍聲是向着樹上的孩子們發射的，於是他們便大多落下地來，露着慘苦而

不自然的臉孔躺在雪中，而哥薩克的騎馬便向着奔散的羣衆追喊起來。這一天內，醫院中收容了一千二百十八具死屍和五千人以上的負傷者。但是還有多少死者被警察祕密的埋葬了，就沒有人知道了。這是一月九日的事件，所謂「血的星期日」。列寧是第二天在日內瓦知道了這件事的。

據克盧普絲茄亞女士的回憶：『烏拉狄密爾·伊里奇和我正向圖書館去，並且途中還遇着了盧那卡爾斯基(Луначский)夫婦。我還記得盧那卡爾斯基的夫人安娜·亞歷山德羅芙娜(Анн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女士的容態，她簡直興奮得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只是絕望的捲動着她的暖手筒。我們四個人一塊兒到了萊伯辛斯基的僑居者飯店內，那裏已經聚集了許多聽到了彼得堡的消息後，本能的走到這裏來的布爾塞維克。我們自然需要一次集會。但聚集在這裏的人們簡直沒有彼此談話的。他們是興奮到了這樣的程度。大家都帶着一付緊張的面孔唱着革命葬儀的行進曲。每一個人都被一種沉思壓服着，這沉思便是革命業已開始，忠於沙皇的束縛掙斷了，

現在是十分接近專制崩潰人民興起的偉大而自由的時候了。」

真的，如果有人自己宣佈自己死刑的話，那末這就是沙皇尼古拉第二在一月九日所行的事了。這次請願的羣衆最初是抱着一種超階級超黨派的，對他們父親的宗教信仰，在當日的早晨出發的。然而當羣衆在排槍射擊之前狼狽的後退時，他們祇有一個想念，即武裝與復仇。當日晚間，在威堡(Viburg)地方便有失了羣的官吏與警察途中遇着了粗暴的正義與柵門閉塞的事，而在瓦西里(Vasili)島——彼得堡勞動階級的核心——上，布爾塞維克的勞動者們則奪取了一家印刷所，火急的印刷了一種宣言散發出去以號召勞動羣衆奪取武裝。列寧雖遠在日內瓦，但他的吼聲却在彼得堡的血街上响着。

沙皇是想給他的人民一個「教訓」的。列寧由聽得這「教訓」的消息的那個動情的集會上，由那葬儀行進曲的歌唱中回寓以後，立即提筆寫他的論文。他在他的論文上冠以「俄國革命業已爆發」的標題，痛論：「那是一個偉大的教訓！俄國的普

羅列塔利亞特別是不會忘記那教訓的……勞動者階級在內戰中接受了一個偉大的教訓。」

那個牧師喬治·加逢在第一次開槍以後便逃走了被朋友藏匿起來，他也發出了一個告彼得堡的工人書，稱：『我們不需要皇帝了！血渠把人民與皇帝分開了。自由鬥爭萬歲！』

列寧宣稱：『戰爭是在俄國宣佈了！革命就是戰爭，而且是一個歷史上有名的戰爭中僅有之合法的，公平的，真正偉大的戰爭。』他又引用英國通信員在莫斯科的街頭上聽到的一羣工人的談話。內中的一個人說：『不，你不能用斧頭反抗騎馬隊。你不能用斧頭砍倒他，用小刀更不行。不，我們要的是連珠槍，至少是連珠槍，最好是步槍。』

不久，加逢到了日內瓦，並且要見列寧。加逢或許是警察的暗探，至少他後來所遭受的這樣運命，被後來成爲巴力斯坦(Palestine)之百萬富翁的一個實業家所諷

刺的事情上可以看出來。雖然如此，但列寧却熱忱的要會一會他。因為作與他部分的意識上做了警察的工具，但無論如何在加逢的農民性質上全部民主的唯心主義却因那個星期日的可怕事件而激昂起來，他的全部感情是集注在所組織的飢餓羣衆的身上，姑不論他使用的是誰的錢，他是領導他們得到了一個「教訓」。在他的心上確是無需乎沙皇了，他覺得是上了一次卑鄙的大當。

列寧在這些事件上看到了新俄和舊俄之劇烈的對立，古老的農民對「小天父」的忠實，與夫在彼得堡的勞動羣衆之間革命者的產生等。他記得在三十年代的飢餓的英國，一個牧師——約瑟夫·雷納·斯蒂芬斯 (Joseph Rayner Stephens) 號召民衆於午夜在約克夏 (Yorkshire) 的草原上作戰，那成千帶着切望而深沉的面孔，當他們看見槍尖上火把的光芒，他們第一次感覺得新生命的跳動。斯蒂芬斯是在基督教的名義之下號召民衆武裝的，並且是在對國王的忠實之下宣布對新興布爾喬亞氾的憎恨。斯蒂芬斯也和加逢一樣，在暴風雨勃發的時候不見了，他的地位便被改進黨

的無神論者(Chartist, Atheist)和革命者如哈尼(Harney)和厄納斯特·瓊思(Ernest Jones)等人取而代之了。列寧注視着加逢行動的一切效果，聽着彼得堡，莫斯科，加科夫(Климов)的勞動者們的談話，清晰得如身臨其境，他三年前在他的「什麼是要幹的」一書的結尾上寫道：『想像一個人民的叛變吧，在目前，一切都將確然的同意想到這件事，並且準備這件事。』現在牠是來了。伊里奇等不及的要會一會加逢。不論他是不是牧師，是不是暗探，總之這個人是民衆叛亂中生存的部分。他們倆在一家咖啡店內會見了，列寧勸他教育教育自己，保持經常的交往，但必須要拋開感傷的受激動的牧師身分。加逢願意祕密運輸軍火回國，列寧正對勞動羣衆已經不願再拿斧頭和小刀去對付連珠和步槍的事表示絕望的憂慮，聽到加逢願意幹這樣的事，便給了他一個彼得堡組織的援助。但是這唯心主義的革命者在他一旦走到實際的任務上便靠不住了，而在波羅的海中的島上等候軍火的勞動者們祇得失望而回。

克盧普絲茄亞女士描寫加逢的缺點以及他和進攻沙皇到底的人主要的不同點，說：『非法的生存，挨餓，與完全的隱姓匿名，所有這一切和毫無危險的在大庭廣衆的集會上講演是完全不同的，組織和運軍火的事，僅能由和加逢具有完全不同之革命特性的人，與準備着非廣告性之犧牲的人去幹。』

加逢裝運軍火的船是在霧中波羅的海的淺灘上不見了的。他自己是在他所煽起的暴風逐漸轉爲颶風的當兒消失了的。在他出發以前，全世界都知道他，但是可以保險的說，除開他的同志和沙皇的警察外，沒有一個人聽到這位小小的禿頭的人勸加逢讀書，而他自己也以懷疑的「哼，哼！」走進日內瓦的公共圖書館，一點鐘一點鐘的熟讀深思，一天一天的研究關於戰爭藝術，巷戰，策略等類的書籍和小冊子。那位荒唐的牧師連把船上的軍火運上陸都辦不到；這位小小的禿頭，當革命業已過去以後還是沒有人知道的，組織了並指導了爆發於是年十一月而蔓延至兩年以後的武裝叛亂中的戰鬥員。

整個的夏季，鬥爭執拗的把力量集中起來，這裏罷工，那裏示威，槍擊，鎮壓，恐慌與殘酷在沙斯可埃·賽羅 (Tarskoe Selo) 的皇家別墅中交流着。在對馬——那最後的恥辱——有一個時候那波濤會淹沒了無數被謀殺的水兵，而現在又好像要吞沒謀殺者的樣子了。一個水兵的叛變爆發在名「普屯金」(Polemkin) 的裝甲巡洋艦上，當她正在黑海演習射擊的時候。六月十六日，「普屯金」開至窩台薩 (Odes) 港內拋錨，當市內的羣衆蜂擁而來對港口表示驚奇，或者羣集在那峻峭的石堤上面的廣闊而鬱蒼道路上的時候，她的桅桿上竟飄起紅旗來。這一剎那間真好像是劇的表演。正當窩台薩發生一個總罷工，軍隊向羣衆開槍，每個人的心裏都在想着暴動的時候，紅旗忽然會在晨光曦微中出現在黑海艦隊之第一流軍艦的桅桿上。那時是不是有如革命的陸軍一樣的革命的海軍呢？

二三天以後，這叛變的消息雖然在被檢閱官嚴密的封鎖着不使有絲毫洩漏，然而也竟跳過了那分開列寧與其本國的「可詛咒的距離」。他馬上就看到了這事件之

非常的重要性，理解了立刻就要採取的行動，以及已經發生的錯誤。他就迅速的決定了派遣布爾塞維克祕密工作者的最優秀的一員——瓦西里埃夫·尤金（Vassiliev Eugene）回國。據尤金在其「巡洋艦普屯金的叛變與列寧」一書中說：

『事件是這樣的，黑海艦隊的水兵間，很早以前就有了巧妙的宣傳。特別因為對我們的宣傳表示共鳴的水兵最多的，要算巡洋艦「愛克台里拿第二」(Ekatelina II)，所以我們的期待主要的是在這一隻軍艦上。因為夏季的艦隊演習臨近了，艦上充分的積載着軍需品，完畢了航海準備的艦隊，在啓旋以前是集合在秦德爾島的。巡洋艦「普屯金」首先出發，其餘各艦則留在塞瓦斯波里(Sevastopoli)。

『普屯金』的水兵們，對於上自艦長哥里埃夫(Goriet)下至幹部將校等輩苛酷的態度與他們的濫發官威，懷着非常的反感。又因為在航海的頭一天，水兵就遇着了腐臭爛肉的午餐，於是他們就發生了不平而提出了抗議。另一方面，將校門對於水兵擺足了威風施盡了惡罵來威嚇他們，艦長(如果我的記憶不錯的話)甚至於拿出

手槍來打死了一個名華克林秋克的水兵。水兵們實在是忍無可忍了，於是便拿出手槍來反抗。數分鐘的血鬥以後，所有的將校都被他們由船舷上拋下了海。而叛變也就開始了。當時選出了以馬特賢珂爲主席的委員會，在這個委員會的指揮之下，軍艦就起了錨開到窩台薩來。「普屯金」叛變的消息隔了不多幾天就傳到了國外。這個消息在亡命的革命家之間引起了怎樣的興奮，是不必想像的事。「回國去！回國去！」的聲音是不一而足。據說烏拉狄密爾·伊里奇因急事要找我。可是在我正打算往列寧的寓所裏去的當兒，他倒已經到我這裏來了。他剛一住足，便是簡單的幾句話：

「尤金君，中央委員會決定你明天動身到窩台薩。」伊里奇一開口便是這樣說。

「今天都行，如果是必要的話。什麼任務呢？」

「任務非常重大。恐怕窩台薩的同志們不能正確的運用戰艦（普屯金）的叛變。你無論如何必須要叫陸戰隊上陸。無論如何，你得尋着戰艦，上去說服水兵

們，要他們必須堅決的幹。如果必要的話，決不猶豫的去轟炸政府機關。我們一定要佔領城市，佔領後，立刻就武裝工人，並且用最決定的方法在農民中開始鼓動。提議奪取地主的土地，與工人聯盟作一般的鬥爭。對農民要更多的注意。在火蓋已經揭開了的鬥爭中，我認爲工人和農民締結同盟有絕大的意義。」

「伊里奇顯然是被事變昂奮起來。我從不曾見過他的這種態度，尤其是他的遠大的計畫使我吃驚。」

「此外，必須要盡力把其餘各艦抓到我們的手中。我相信大多數軍艦是要響應「普屯金」的。祇需澈底的勇敢的行動。如果可能的話，立刻派一隻汽艇來接我，我從羅馬尼亞回國。」

「你當真以爲那是可能的嗎，烏拉狄密爾·伊里奇？」我不由的忍不住的這麼問。

「當然，我認爲完全是可能的。祇需行動得堅決與敏捷。」他確信的回答。

那都是興奮嗎？列寧是簡單的由於興奮，或者那怪誕的「派汽艇來接我」的命令沒有什麼根據嗎？完全不是的，事件已經證明在這番對話中的每一個字都是根據於完全了解窩台薩的地位。「普屯金」的陸戰隊上了岸嗎？他們有和當地的守備軍聯絡，逮捕了反動的軍官，必要時炸毀了險要嗎？他們為革命佔領了城市，決然的號召了其餘的各艦嗎？一切列寧所迅速的具象起來的都是可能發生的，祇不過叛變的水兵們一件也沒有做到罷了。他們把制先權讓給了敵人，結果是一無所得。

又據當時身在窩台薩的雅羅斯拉烏斯基 (Y. Roslavsky) 說：『列寧所說的都是實在的。祇不過我們沒有很好的利用這個運動。——（我這是說我自己）——我那時正好是前一天，在十天的絕食之後從獄中出來，留在窩台薩。結果政府巧妙的沒有讓這次事變擴大起來而將它鎮壓下去了。』

窩台薩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不消說，對於領導這次運動是失敗了的。瓦西里埃夫到時，一切都已經成為過去了，而槍斃，屠殺，監禁等一時就如同致命的打擊要

向那個帝國襲來似的統治着那個地方。列寧爲這個叛變的消息所驅使，覺得事件真實得好像自己身臨其境一般，領導、組織，以其偉大將軍的所有本能不斷的與以決定的打擊，再繼以嚴重的打擊。

「普屯金」事件自然是革命慘劇的前兆。人民在變亂中，士兵與水兵們都動搖着，政府則在恐慌中，然而沒有領導者，沒有顯明的目的，祇是從那些羣衆他們自己偶然的誇大的發覺出來的無限熱情在這運動的先頭而已。並且結局，政府恢復了原狀，且更慘酷的無情的打擊着革命的羣衆，投機的領導者們有的被捕下獄，有的駭極而逃，民衆們便也受挫而分散了。

當時社會民主主義者還沒有克服他們的分裂。論理他們是一個聯合的黨，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雖同居於一個中央委員會，但實際上他們已經是兩極的分裂着。孟塞維克簡直不相信勞動者有領導革命的能力。他們認爲革命是布爾喬亞性的，換言之，是反對專制和土地貴族的，是爲民主的，資本主義俄國的，因而必須要由布

爾喬亞汜來領導。布爾塞維克也認為革命是布爾喬亞性的，但他們充分的理解俄國的中間階級不能領導任何革命，專制政治僅能由勞動者與農民聯合起來在前者的領導之下，纔得推翻，農民問題纔得根本解決。

列寧的觀點便是要由這種叛亂來建立工農獨裁，其目的是要由地主財產的沒收來作土地問題的根本解決。他沒有忘記一七九三年賈可賓獨裁制 (Jacobin Dictatorship) 和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 (Paris Commune) 那樣的政權。勞動階級及其政黨的任务要是加強其本階級的地位，以作純粹勞動階級獨裁的政權之基礎而建立社會主義的國家。

那時布爾塞維克的力量不能不說還薄弱，他們的指導者大都亡命在國外，在事前緊急的時候不能回國；雖然他們的黨已經成長起來，已經吸收了新的力量，已經開始為廣大的勞動羣衆所注意。直至四月底纔施行黨的真正動員，而列寧在一九〇四年的困難時期中刻苦奮鬥的結果纔得召集起一個會議來。

那個會議仍然是在倫敦開的，並且完全是布爾塞維克的分子，因為孟塞維克拒絕派代表參加。主要的討論了武裝暴動反對專制，如何組織並參加臨時革命政府，以及黨的組織等問題。以蒲列哈諾夫，馬丁諾夫 (Martinov)，托洛茨基等為領袖的孟塞維克則反對參加臨時政府，並稱勞動者黨應當跟社會主義對立。托洛茨基則更進一步的否定革命的一切布爾喬亞性，竭力主張必須打出「反對專制，建立勞動政權」的口號。

列寧到底是一個更偉大的現實主義者，他理解了俄國的勞動者還不足以掌握權力，而農民問題在要求着最迫切的解決，但是除非勞動者階級——最革命的階級——參加革命的政權，那纔是真正的反革命。他們必須參加政府去爭取民主自由的勝利，以加強他們本身對資本主義鬥爭的力量。孟塞維克的計畫，托洛茨基的口號，實際上祇是把整個的領導權送給資本家階級，輕視農民是可能的同盟者，完全忽視俄國農村方面嚴重的動搖，積年累月的壓制，到現在業已成熟。

列寧在這個會議上關於這兩點是取得了絕對的多數。不過在第三個問題上，即關於組織的問題是失敗的。黨在受嚴重壓迫的條件之下，祇得組織一個小而祕密的委員會，並且是革命的知識分子居大多數。列寧要求這樣的組織必須改變，要組織以勞動者分子居多數的委員會。這個問題在列寧好像是絕對的必要。誠然，假若勞動者要領導革命，假若黨要吸取他們來加強力量，則他們是必須領導牠們的。

在會議上有一個同志說在彼得堡黨的委員會裏面，祇有一個勞動者分子。列寧聽到這話馬上就叫起來：『那是一個恥辱！』他簡直被這個問題所縈擾。即令是在倫敦，在平靜的日內瓦，他也覺得革命發生了，深刻化了，新的創造力發揮出來了，他覺得他自己如同在革命的行動中一般。他不斷的寫指導的，爭論的信給國內的委員會。他們是在工作着，所以他必須做一切他所能做的，直到那偉大的日子到來，他和他們聚合在一塊兒，或是勝利的在戰艦上飄着紅旗，或是，當確有這樣事情的時候，則祕密的化裝用一張假護照。那時幫助和力量便可以遞給他們，假使他

們知道如何去運用的話。他的信裏面簡直充滿了這種廣大創造力的意識，並且對同志們必須要組織得幫助得無微不至。

他在四月初寫信給古賽夫(Grigor)——彼得堡委員會的指導者，力說一個革命者，主要的要能在警察逮捕他以前，決定在適當的瞬間便要離開那危險的地方，再換一個新的地方。他就好像覺得古賽夫已經被人跟住了的樣子，向他說『根據我自己的經驗，並且許多同志都有的，我知道對於一個革命者，最難者是及時離開危險的地方。』

正好當一個地方臨到非常危險的時候，並且也非常有趣起來，列寧允許那地方的人離開，但是『我有責任堅決的要求你及時離開彼得堡……否則，要受極大的損害。離開的損害倒是很顯然而不足留意的。攜着你年青的助者們及時前進吧，在一兩個月以內補上領導的地位，的確……那將是僅有的偉大利益。年青的人們要從更負責任的工作上學習，無論他們犯了怎樣的錯誤，我們要立刻糾正他。除非是爲

警察所破獲，那就破壞了我們進行中央工作最重要的時機。」

又一次，是在年頭上吧，他曾寫信給在莫斯科獄中的絲泰沙華和她的同志們，談關於革命者對法庭的態度問題。他寫的完全是是否可能利用法庭作鼓勵的事。他說那鼓勵必須要是爲着「我們」黨的，不僅是一般社會主義者的。隨後便是一段關於法律保護之獨特的遊戲文章。

『對待律師必須強硬，並且要下戒嚴令：：首先告訴他們：你這淫婦的兒子，假若你略帶非禮或政治的機會主義（這是說關於幼稚，社會主義的錯誤，關於爲感情所騙，關於社會民主主義者不相信暴力，以及他們的教育和運動之和平的性質，諸如此類的事情，）那末我——被告——就要當場破壞你，喊你惡棍，宣佈我放棄這樣的保護，等等。要把這些恫嚇見諸實行。要請聰明的律師——其餘的就不必要了。』

又進一步的對可憐的法界中人指導如下：

「自己要守法，不要重視證人和告發人，但是不要觸及被告的判決，也不要暗示你關於他的判決和行爲的意見。因爲，我的小自由主義者，你不能理解這些判決，縱當你稱揚他們，除非你有點蠢笨。你也不能去幹。當然，要把所有這件事客氣的，婉轉的，讓步的，機敏的，謹慎的向律師說明！」

凡寫這樣信的人，不論何人的意見，總難覺得他具有如這樣一個領導者之熱烈的真誠使人感服。他姑不論，祇是這一點，就是使得同志們敬愛他了。

現在，這位衆望所歸的領導者聯合他的同志們直接參加的，自他哥哥的犧牲顯示給他之俄羅斯帝國的真實性，在人類的深處工作的力量以來，卽爲他所夢想的，爲其一生僅有之事業的革命到來了。

一一九〇五年

在遠東方面，凶兆是接踵而來，及至八月初頭，可恥的和平交涉於美國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總統的監視與美帝國主義的保護下在樸資茅斯 (Portsmouth) 開始了。另一方面，則叛亂的火是燃燒了一個長夏，並且彌漫了整個的俄國。在鐵符列斯 (T. lis)，里加 (Riga)，科富諾 (Kovno)，華沙 (Warsaw)，以及所有遠僻的省分，不斷的發生罷工；在每一個大都市中，則示威槍擊等時有所聞，對猶太人的殺害，工人們已經起來武裝自己反抗殺害者了；最後，當收穫的熱天逼近的時候，一個極嚴重的農民暴動也在農村裏開始了。

在這個年頭，農業勞動者的罷工本來是司空見慣的事。然而這一次，懦弱而反動的知識分子常常把他當作神聖的蠢貨形容的俄國農民 (Muzhik) 也參加了。深夜裏禮拜堂的鐘聲拖着一种淒涼的金屬的噲噲然的反響，籠罩着暗黑而枯燥的田野，一似收穫的呻吟不易休止的樣子。激昂的農民羣衆集合起來，滿洲屠殺中遺留下來的少數武裝的退伍兵士在前面，向地主的田宅前進。他們毀壞了他的機械，搶空了他的穀倉，瓜分了他的牲畜，遣散他的奴僕，並且整整有條的，以一种幾乎是

愛的謹慎，焚燬了莊園和農場。

紅雄鷄出現了！夜復一夜的那廣大而令人惱傷的俄國地平的黑暗線總是被這跳進的火焰衝破，那深沉的農村裏的靜寂被那重濁的鐘聲擾破。有時那地主被打一頓；不過沒有被殺掉，但祇常常被捆縛起來。農民們堅信假若他的莊園被破壞了，他就不能恢復了。

祇有在庫爾蘭(Courland)，波羅的海上，以及高加索的山中，這一類的農民運動變成了武裝鬥爭，但是這些日漸成長起來的人民叛亂，為的是力爭自由，而沙皇則又不欲與以自由。不過大學校獲許自治，於是學生們便立刻將它用為永久集會所，而各黨各派也就利用為避開警察自由示威的地方。社會主義的雜誌，社會主義的日刊，布爾塞維克的日刊「新生活」也在內，都開始侮蔑官吏，並且也沒有人敢干涉。革命的政黨都已經在半公開的狀態下工作了。但是沒有人知道列寧現在已經回國了。

列寧在十一月初離開日內瓦到斯篤克霍爾姆——瑞典首都——在那裏勾留了兩個星期，等一個替他辦假護照的同志。他等得看着那條把他和革命隔離開來的狹而長的海面發愁。十一月十八，他到了赫星法斯 (Helsingfors, Finland)，在那裏被一個名洪那·卡斯特倫 (Hunar Kastren) 的大學講師隱匿着，兩天後，由卡斯特倫的幼子——大學生——帶領，到了彼得堡。

列寧到彼得堡，是正值運動高漲，專制政治與人民之間的決定鬥爭迫切的時候。從十月間起，彼得堡，莫斯科，以及其他各大城市已經爆發了一個總罷工；麵包師，律師，學生，藥劑師，鐵路員工，電車員工，工場工人，舉凡一切可以想得到的職業都參加了。罷工的領導是在「工人代表會議」(Councils of Workers' Deputies) 的手裏，這會議的行動，如我們所知道的，便是十二年以後的「蘇維埃」(Soviets)。十月十七日，沙皇會發表宣言，聲稱行將頒憲法，其目的是在企圖分散其敵人的力量。當日，他在餐室裏面說了這樣的幾句話：『我五點鐘簽署了宣言。』

自是以後，我的頭便沉重起來，我的思想也便紛亂起來，主啊，救助我們吧！使俄國安靜下來吧！』

尼古拉顯然是不忠於他的宣言的，當然那祇不過是在出征滿洲的軍隊調回以前的一個欺騙手段而已。罷工是繼續着；反動則以屠殺與暗殺報復着；對示威者的槍擊在實施着；而武裝興起，顯然是迫在目前了。

一個布爾塞維克的領導者——厄納斯特·鮑門 (Ernest Braun)，一位獸醫——剛剛隨着沙皇宣言的發表，因得大赦從莫斯科的監獄裏出來，還在歸家的途中，被一羣警官開槍射倒。十幾萬羣衆參加着他的葬儀；警察們雖然遇着，却也不敢開槍，及至到了墓地，死者的未亡人便公開的向羣衆號召武裝暴動。列寧對這謀殺事件嚴酷的抨擊道：『當武裝的力量尚在政府手裏的時候，有何自由可言？』

但是這好像是說武裝力量已經離開了沙皇。叛變發生在克朗什塔 (Kronstadt) 與塞瓦斯波里的水兵中，其所以被鎮壓下去者，祇緣領導者缺乏能力以及政治領

導的一般薄弱。

當列寧在他第一次的亡命中回國的時候，一九〇五年十一月的俄國便是如此。回國後，他就迅速的從他隱匿的所在與黨及黨的刊物發生了接觸，充分的與以領導，克朗什塔的叛變被些少的讓步破壞了，所餘者祇有塞瓦斯波里。正如列寧所說：「俄國的軍隊，如一八四九年遠赴邊陲去鎮壓革命的時代，是永遠的過去了。」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守備軍已在動搖中，遠東方面也來了消息，稱正在沿西比利亞鐵路與工人們攜手的歸國軍隊中也發生了事變。

同時德皇也在急遽的動員其海軍艦隊與陸軍師旅，企圖干涉俄國勞苦大眾的行動；而在奧國也爆發了爭普選的總罷工；權力者與君王都已不安於位了。列寧在其亡命瑞士時的最後一篇論文的結語上說：「你們並不孤獨啊，全國的工人農民們！假如你們推翻，擊敗，並且破壞封建的，警察地主的專制的沙皇的俄國勝利了，那末你們的勝利將成爲全世界反資本專制，不僅爲政治的自由，也爲勞苦大眾之經濟

的自由，爲取得貧困的人類之支配與社會主義之實現的一切鬥爭的信號。」所以假若沙皇在德皇威廉的軍隊中也保存着有力量的話，則列寧持有更強大的民軍。

在他歸國的不多幾天以後，他竟作其第一次的公開演講，不過他是剃去了鬍鬚化了裝的，並且用了一個假名字。這次演講是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彼得堡的蘇維埃大會上，勞動者們提出了八小時工作的要求，但是雇主方面竟以同盟休業來回答他們，而沙皇在其第一次的反攻上是勝利了的。於是產業布爾喬亞兀遂都叛離了革命而投到十月十七日的宣言之下，開始向其勞動者作防衛的進攻。在布爾塞維克的名義之下，列寧主張彼得堡蘇維埃必須號召一個全國總罷工——暴動的前奏——來答覆這個處置。

列寧的提案雖被取決了，但並未拿去執行。運動已經越過頂點了。蘇維埃本身則在一個名克魯斯塔羅夫·諾撤爾 (K. r. stalov Neger) ——後來是在托洛茨基的——領導下，雖然高喊着暴動，但極少準備。代表們大多數是擁護孟塞維克的，而

他們的傾向與其說在準備奪取政權的真實鬥爭，毋寧說他們把他們自身看做是一個指定的代替政權。在列寧未回國以前，彼得堡布爾塞維克的領導是非常的薄弱，他們簡直甘願置工作於不理。

整個的黨在準備暴動了。黨內有一個秘密的軍事委員會，領導者是克拉辛（Krasin），列寧則暗地裏和他們接觸，並且解決一切問題，甚至於連一個極小的技術工作他也不肯放鬆的，以其經常的細密週到，佈置這個暴動。譬如他在寫給彼得堡黨組織鬥爭委員會的信中說：『這裏，你們需要發狂的精力，並且還要比這更多的精力。恐懼——是的，一定恐懼——我知道你談到炸彈已經六個月了，但還沒有做成一個！那正是學者的空談……去向着青年人吧，紳士們！那是你們唯一的萬全的手段。否則，你們一定來不及（我能知道那是完全對的），並且祇不過剩一紙文章，計畫，雜錄，要略，佳妙的方劑，而無組織，無生命。去向着青年人吧。立刻去建立戰鬥的小隊，不論什麼地方，學生工人都行，最好是工人，諸如此類。立刻

去組織三乃至十，乃至三十人的小隊。」

一個計畫詳細得連小隊——革命軍隊的核心——的工作，他都給規定到。小隊的組織至少兩個人以上，但必須是獨立的，必須是不必求人的去武裝自己。他不主張他們應該用機關槍和裝甲車去武裝他們自己。他對於和平的知識分子主張祇要有一把刀就可以了，雖然陸軍和警官會立刻看出他們的真意。他說：『來復槍，連珠槍，爆彈，小刀，手杖，準備燃火的浸着煤油的布片，用繩索或繩梯，鍬鋤以備築障礙，棍棒，信號燈，以及反抗步兵用的有刺的鉛絲網和洋釘等等。』

小隊必須由居住在一處或常在一處集會的人去組織，為的是在緊急的瞬間不會分散，並且須有特別記號，要有在夜間每人都能識得的記號等等。他說：『你們必須不要忘記那是一個將要使你們吃驚的百分之九十九確實的事件，並且祇要你們能在可怕的困難的情形之下集合起來。』

雖然沒有武裝，小隊也能做許多事情；例如：嚴密的集合着，進攻徒手的警察

或遊散的哥薩克：當警察的力量薄弱時，則援救被逮捕的或受傷的羣衆；集合在屋頂上以石塊擲軍隊和警察，用開水澆他們等類的任務。小隊的訓練有雙重的特性，即理論的與實踐的，實踐的訓練最好是能用偵察和奪取政府建築，防塞，警所以及監獄等計畫，以及用反「黑白人團」(Black Hundred Bands)，或者在今天應該說是反法西斯蒂「挺進隊」(Storm-troops)的方法。

他力說各種各樣的人——老頭子，婦女，孩子們，甚至於弱者——都可以用一種方法去參加。這裏面有任何樣的人都可以擔負的工作。最後，他把他的最重大的論點追根究底的說，不要遲滯，不要猶疑，否則暴動就會喪失了的。他說：『最重大的決斷，最強大的精力，機敏的利用每一個適當的瞬間，迅速的鼓舞羣衆的革命情緒，領導他們到更決定的，到最決定的行動——這是革命者第一等的任務。』

然而暴動成功的瞬間終於過去了。暴動必須要在總罷工依然繼續存在，克朗什塔與塞瓦斯安波里約反變使得政府無力的時候。可惜當時沒有一個可以領導的政

黨。當時的兩個都相信暴動而個別地計畫這件事的政黨，祇有社會革命黨和布爾塞維克。但前者在勞動羣衆中毫無把握，牠的羣衆祇不過是些學生和知識分子，並且他們在羣衆組織中又毫無信仰。他們的戰術老實說就是恐怖政策，但他們在陸軍與海軍中却有很大的影響。布爾塞維克雖已形成了政黨，可是尚在幼稚時代——在一個月間尙祇有極少數的人，到了十一月間，雖然發揮了決定的影響，然而也祇及於很少的都市而已。

但是政府並沒有屈服。他看到繼海軍的叛變或總罷工之後，無所作爲，倒又強烈的進攻起來。彼得堡蘇維埃的人員於十一月間全被逮捕，而制先權已離革命而消失。然而那最後的一擊——最沒有希望的——還是施行了，在莫斯科，布爾塞維克是一個領導的政黨，十一月十九日，莫斯科蘇維埃宣佈總罷工，除少數在中央的小黨派以外，幾乎全市都在勞動者的手中。三天之內，總罷工在布爾希維克的領導下就轉變爲反抗守備軍的武裝衝突。革命黨的力量決不超過僅以極無用的戰刀作戰

的二千人數，但他們有全勞動人民的擁護與遭受可驚的極微細的死傷。

莫斯科的暴動是被由別的城市調來軍隊的援助而鎮壓下去的，並且總罷工也沒有如何的普遍。加之勞動者們已經疲於長年的鬥爭——這一年之中的鬥爭已經不下三四次了。

莫斯科的暴動表示着革命的最高點。農民騷亂，罷工，恐怖的行爲，以及高加索山中的遊擊戰爭，幾乎繼續至兩年之久了。然而政府還不覺得自身的動搖。在莫斯科的暴動以後，政府立刻向法國進行了一筆大借款，於是遂開始了震動全世界之血腥的反動，俄國的某犬儒學派之徒名之曰：『俄國人民向監獄中的大遷移。』

列寧到得太遲了。但是他的這一來倒是他所獨有的，而蒲列哈諾夫呢，他是始終居留在瑞士。蒲列哈諾夫對十一月事件批評道：『非但沒有拿槍的必要，即連武裝暴動也沒有發動的必要。』列寧的批評則謂：『但是關於莫斯科的十一月暴動，簡直沒有人提到是俄國一九〇五年中的「革命」哩。』

三 斯大林談列寧的印象

正當莫斯科暴動爆發時，布爾塞維克的領袖們在芬蘭的吞茂福爾斯 (Tammerfors) 有一個秘密會議，討論準備暴動的問題。列寧在這裏第一次遇着了一些黨的青年們，這一位他們祇聞其名而尚未見過其人的神秘領袖者，現在對於他們成了現實了。他們之中有一個便是斯大林。斯大林在這個會議上做了一個關於列寧的印象談，而這印象談是這位來自高加索的熱心的青年革命者光明磊落的當列寧的面傾說的。

『我第一次遇着列寧是在吞茂福爾斯的布爾塞維克的會議上。我會希望見一見我們黨的這一隻山鷹，一位偉人，不僅偉大在政治上，但是，假如你喜歡的話，即肉體上也是如此，因為列寧同志在我的理想中想來，是一個巨人的形像，魁偉而獨特。我是如何錯誤的幻想了啊，當我看見了這位極端平常的人，比常人還要小，正

確的說來，簡直和常人沒有什麼兩樣。我以為一個「偉人」開會總是遲到的，因而聽衆等他出現會等得心跳，並且當他露面時，在場的人會警告你：「晒！……不要作聲，他來了。」……我是如何的失望啊，當我知道他已在各代表之前到會了，藏在一個角落裏，簡單的極平常的和幾位極平常的代表閒談。」

斯太林回憶到列寧在那個會上的兩次演說，一是關於當時的地位，一是關於土地均分的問題，那會議簡直被他那令人感服之不平常的力量，明潔而清晰的辯論，簡短而廣博的語句，更正確的說來，以其表情的姿勢與措辭鼓舞着。他說：『我此後便沒有獲得如自列寧的演講方面那麼多的東西了，我簡直爲他那論理的無限量所神往。最初倒有些乾燥無味，但是越深入則越抓住了聽衆，漸漸的如同感電一般，終於爲其所囚。』

除莫斯科以外，許多別的都市裏也同樣的發生了武裝暴動，但都同樣的失敗了。革命的失敗以後，不消說，一定是一個嚴重的反動，尤其是對於革命領導者的

迫害，政府方面總是必得之始甘心的樣子。那時候的列寧雖然經常有被捕或者執行死刑的危險，但依然留在俄國幾近兩年之久，並未走開，不過隱匿着罷了。他的大部分時間都是耗費在來往於彼得堡與芬蘭之間，有時也到莫斯科去。芬蘭那時可以說是革命者在幾近全國人民——特別是勞動者——的武裝叛亂以後，於沙皇版圖內絕無僅有的一個差不多可以公開集會的地方，因為那地方的政治警察比較力量薄弱。

列寧在莫斯科失敗以後，絲毫沒有失望的情緒。反之，他覺得到來年的春季，勞動者們將會再度堅強起來，並且農民的騷亂也會重新產生出來。因為新國會(Дума)對於人民並不能有所建樹，而土地問題之另一種方式的解決，雖沙皇以屠殺方式的解決還差得很遠。所以散布在彼得堡之布爾塞維克的許多秘密委員會事務所小房子裏，常常有一個小小的衣着整潔，臂上掛着一把洋傘，看來好像一個銀行職員或者文官的樣子，決不像危險的革命分子的不速之客，進出其間。可是由於他的對

他們工作所在地的情形質問的周密，由於對他們的每一件極小的事情，例如假護照，暗號，安全與危險的記號，用款與武裝的供給，以及與其他黨組織的聯絡等，檢查得極其謹慎，他們便猜到他是誰，雖然他的介紹書上寫的是假名字。

此後，有一次當尾隨他的人實在尾隨得太嚴重了，他便在郊外火車站上找着了
一個不爲人注意的座位到了芬蘭站。在那裏，他藏在靠近海濱的樹林中的一所木製的屋子裏，每天有一個負責交通責任的人來看他，帶報紙和報告來給他；那交通等着他看完報，坐在書桌旁寫他的每天替布爾塞維克刊物的文章，當時首都布爾塞維克的刊物依然是在祕密狀態中。

他寫作得非常快，不用躊躇，一個鐘點要寫兩段，也決不翻一翻他那遇事必記的日記簿。「我明白了」，一個交通說，「在我面前進行的，不是一個創作的過程，祇不過是由伊里奇預先起草好了的東西再抄一遍罷了。」

在這些到芬蘭來看他的人之中，有的是布爾塞維克的軍事領導者，有的是勞動

者和知識分子，其餘的便都是軍隊中的士兵。其中有一個名愛米里昂·雅洛斯拉烏斯基 (Emilian Yaroslavsky) 的，和其餘一切與列寧接觸的人一樣，大大的爲列寧的對其工作的理解力，爲其熱忱，以及他所要知道的一切問題，不僅是一個大綱，即連最小的細事也都要知道的那些態度，給了一個極其深刻的印象。列寧對他們則詳細的詢問祕密的軍事學校是怎樣的進行着，小隊是怎樣的在受着使用並準備炸藥，使用機關槍及其他的武器，掘地穴，以及巷戰戰術等訓練。列寧極喜歡涉及瑣細，並以之作摘要的基礎。他不僅自身經常以此接觸現實，並且他也以此贏得每個與他談話的人的信任，因爲在他所談的裏面頗饒興趣。

那送報紙和消息到這林中隱屋裏來給他的，恐怕是蒲提羅夫金屬工廠 (Putilov Metal-works) 的一個勞動者。列寧見着他便問：『呀，蒲提羅夫的孩子們現在怎樣？彼得(註)的情緒如何？他們寫了些什麼？你常上那裏去嗎？』當這位勞動者緩

被開除出來？他在這裏是什麼地位？」隨後他便說笑，講故事，對他直接和工人接近一次而獲得甚多，湧現着非常的愉快。

勞動階級運動的高漲使得黨內的分裂不易繼續了。布爾塞維克在勞動者中取得了更大的權威；勞動者自身也要求着統一。一九〇六年四月，兩派遂在斯篤克霍爾姆開會，決定了這個統一的基礎。但是在怎樣估量當時情勢的問題上却引起了一番激烈的論爭。終局孟塞維克取得多數，而列寧是失敗了的。斯大林回憶道：「我又第一次看到失敗者的列寧。他沒有絲毫像那些領導者在失敗後做出的嗚咽啜泣的狀態。反之，失敗反使得列寧更興奮，更激昂，更富精力的鼓勵其追隨者走向新的戰鬥，走向將來的勝利。然而那是那一種的失敗呢？你祇要看看列寧的反對者，斯篤克霍爾姆會議的勝利者——蒲列哈諾夫，阿克賽羅德，馬爾托夫，以及他們那一派的人們。他們不大像是真實的勝利者，因為列寧同志對孟塞維主義的無情批

評，並沒有絲毫讓步。』對於那些感受到鬱悶的人們，列寧從他的壓緊着的雙唇突出的回答是：『不要喪氣，同志們；我們一定要勝利，因為我們是正確的。』

一九〇六年夏季的一個時候，爲任何人預料所不及的，迅速的證明了他的正確。農民的不安又在武裝力量中尋着反應，而陸海軍中叛亂又復疊起。其中最嚴重的要算斯威堡(Sveaborg)和克朗什塔的騷動了，這兩處要塞原是拱衛彼得堡的，然而現在水兵們却被布爾塞維克和社會主義革命者的煽動影響着了。列寧立刻組織了一個水兵的會議，並且艱苦的要爭取一個彼得堡勞動者的總罷工來擁護這個叛變，可是失敗了。

然而尚不僅此，沙皇雖然向他們的「失了寵」的大臣們頒下了一道訴苦的詔書，強迫他們下野，或放艇遠遊，或隱居鄉村。禁止他們重回首都，但他的地位則依然穩固。可是魔手又發現了新的方法去再度的抓住人民的咽喉。一些猙獰而殘酷的小

裁判，死於「斯妥列平的領帶」下。一九〇六和一九〇七年的許多事變，雖然是極嚴重，然而終歸成了最後而最艱苦的退兵時的一戰了。但這是不是說一切的死難與犧牲沒有取得什麼代價呢？

不，列寧的見解決不如此。荒誕的革命者如鮑列斯·撒芬可夫 (Boris Savin-

sky)——豐·樸列夫的劊子手——會陷於悲觀主義，用一個羅樸辛 (Roi-shin) 的假名，寫了一篇苦而美的奇妙的訴狀，或者又如里昂列德·安德萊埃夫，拋棄了他的一切顛覆專制政治的希望。列寧以為斯妥列平的「改革」，是表示革命至少爭取了部分的讓步，在半亞帝國 (Semi Asiatic Empire) 開了到資本主義的門戶。事實也告訴了我們，自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四年，由於斯妥列平的努力，掃蕩了中世紀的農村共同體，富農的附庸階級開始成長起來，繼本世紀初葉的恐慌以後，產業也急劇的發達起來。祇不過農民大眾陷於更深的窮乏貧困；產業的俄國依然保存着是世界

上最落後的國家之一；勞動者的狀態祇不過略微好些；並且最重要者，雖然已有選舉和國會存在，但權力則依然握在尼古拉二世背後的一羣反動的朋黨的手中。

四 托洛茨基與列寧

列寧是最熱情於接近青年人的。如我們在前面說過的，他認為青年人大都是蘊藏着豐富的希望和精力；他對於一個青年人，不惜以全付的精神去提拔，指導，訓練，造就，並愛護。托洛茨基最初在他看來是一個有望的青年，當他們兩個人第一次在倫敦會見的時候，是一個星期日的清晨。托洛茨基去看列寧，列寧尚未起身，兩個人便倚榻而談，這時列寧差不多被托洛茨基的神氣所吸引，因為一則當時「火花」在青年知識分子中還少有人擁護，二則聽說托洛茨基是從西比利亞冒險的脫逃出來的。然而我們要知道列寧決不是所謂「超人」之輩的人，估量一個決不會有絲毫錯誤，反之，他的那種衝動的人情倒常常會引誘他至於錯誤，因為他不忍拒絕任

何人的奮進和熱情。他的美德並不在乎他不犯絲毫錯誤，而在於假若犯了錯誤的話，他能即時改正過來。並且祇要他一旦發覺了某人靠不住，他決不再假意情感的與之糾結。他差不多將近一年的光景纔發覺了托洛茨基是怎樣的一個人。

此際，他們兩個人是費了很多的時間一塊兒相處的。列寧歡喜從櫻草山(Primrose Hill)俯瞰倫敦的全景，然後再走下去經過公園而到動物園。說到動物園，那纔是最使列寧留戀的所在。托洛茨基要和他同去，但是，如果我們根據他自己的回憶錄來評價的話，則他的主要的興趣是在談論他自己，對於列寧，他就覺得似乎有一種長者的優越。誠然，列寧是一個偉大的人物，是黨的領袖，但他是出身於伏爾加的半亞細亞的俄國人，而托洛茨基是一個歐洲人，是有歷代文化之教養的人。當列寧指示倫敦給他看，不經意的伸出一隻手來向着那個大禮拜堂說：『是的，那就是他們的威斯特明斯達教堂(Westminster)』，他把它當作一個陰謀的離心術去解釋。他們兩個人之間奇妙的結下來的友誼，差不多自他們最初認識的時候時就注定

了的，因為他們的小團體自誕生以來，內部便受其威脅的暴風即將猝發的樣子。並且列寧在挽救那行將遭受危難的小船以前，壓艙物中他必須拋棄的便是托洛茨基。

當革命的基本問題被提出來討論時，這兩個人的不同點便顯露出來了，並且在這些問題中的每一個問題上，直至列寧死後，他們都表明是在對立的陣營中。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他們兩人關於這個新黨之特質的問題會猛烈的鬥爭過，一方面認為黨應該是勞動階級革命的政黨，要具有明確的綱領和哲學，一方面的意見則以為黨可以是包含許多階級和不同觀點的人們之鬆泛的組織。在一九〇五年，他們兩人在革命的性質和動力的問題上是愈益分歧了，托洛茨基相信那次的革命要在俄國布爾喬亞的領導之下，而俄國工人的任務是在形成一個「對立」，直至歐洲工人階級興起的時候為止。他絲毫也看不起農民，在他看來，農民祇是一個反動的勢力而已。他更忽視中間階級的小市民。列寧——和馬克思，恩格斯是一樣的——相信農民中比較貧困的和比較多的部分將對勞動階級表顯一個有價值的同盟和後援。在一

九〇五年以後所運用的策略上，托洛茨基主張取消黨；在戰爭中，托洛茨基則反對列寧的「內戰」的口號和新國際的形成；十月革命以後，關於和平的問題，職工會的問題，以及紅軍之領導的問題等，他們兩人的政策都是完全對立的。

當這些問題都被弄明白了的時候，就可以知道托洛茨基爲什麼今日會與其同僚考茨基共事，成爲反對列寧一生事業之主要的宣傳者，那些不懂得俄國歷史的人就難以相信托洛茨基之布爾塞維克黨籍在他的一生中是一個短而例外的時期。

第五章 革命失敗後的反動時代

一 革命的總決算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是失敗了，莫斯科的暴動被鎮壓下去了，其他地方上的騷亂也被征服了。隨之，殘暴的反動時代也就到來了。「格殺勿論」的命令在近衛軍司令的佈告上大寫而特寫着。革命的羣衆不消說得，暫時取着退守的防線了。

孟塞維克是根本否定了這次革命的。還有許多人也隨革命浪潮的低落而意氣消沉了。但列寧則不然，他以其明慧的炯眼看透了第二次的革命高潮是要來的，從現在起必須作一切新的必要的準備。他對於失敗並不簡單的去處理，他必須要去究明

失敗之原因何在。他認為失敗的最大原因之一是缺乏最後的勇氣與驕進的攻擊。他在「一九〇五年」中寫道：

「十二月事件更深刻的是馬克思的一個立場，暴動是藝術，而這個藝術之根本的規範證明了是絕對的勇氣和直進的攻勢。我們沒有十分的咀嚼這個真實。我們自己既沒有十分的學習這個藝術，也沒有去教育羣衆。這個進攻的規範，無論如何是非履行不可的。現在我們自己必須以自己的精力去償還我們的損失。關於政治的標語，僅以團結是不夠的，更須有對專制政治以團結去進攻的必要。反對這個和對它無準備的人，必須毫不客氣地驅逐出革命的队伍之外，非把他們當作叛徒，當作懦夫去排斥不可。因為必須由我們的銳眼去認清敵人的事變和爭鬥的日子是相近了。」

列寧認為一九〇五年的失敗，在革命者看來祇不過是一時的失敗而已。他相信新的鬥爭行將到來，力說須澈底的準備那新的鬥爭。

孟塞維克顯然到達了機會主義的結論，而布爾塞維克則作成了革命的結論，其思想是深入到革命之最後的勝利爲止的。

關於一九〇五年革命的總決算，除列寧指出一部分重要的原因外，第一還應該知道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對於俄國的勞動階級，要算是一個最初的革命經驗。由於這次革命，幾個不同的政黨的革命領袖開始理論的作其革命戰略與戰術的檢查，革命軍最初受到實彈射擊與實戰的洗禮。因此，缺乏受經驗之嚴格的鍛鍊與理論充實之革命戰略和戰術，當然是革命失敗的原因之一。

其次，便是單一的有絕對權威的革命領導者的缺乏。一九〇五年的勞動羣衆當然沒有考慮到當時有布爾塞維克，孟塞維克，以及社會革命黨等根本不同的政黨存在。祇是對於個人的崇拜，或由某某革命家的幹才，勞動羣衆傾向於布爾塞維克，或孟塞維克，或社會革命黨。在這次的革命中，把每個政黨的真面目顯露出來，那一個政黨是真正革命的，那一個政黨有若干程度是革命的，都給了一個試驗。例如

孟塞維克即當革命鬥爭最嚴重之際，尚不欲與布爾喬亞沓撒手，實際上，在勞動者的面前表明他們是勞動階級利益的出賣者。而社會革命黨員本身也認識了他們的黨是農村布爾喬亞和都市小布爾喬亞的政黨。因此，勞動羣衆已經感覺到他們的行動和他們的利益不一致，而且實際上已經知道了，所以後來纔逐漸的走向布爾塞維克的這一方面來。

第三，從不曾經驗過革命鬥爭的普羅列塔利亞特對於革命還懷着非常恐怖的心理，所以在最初，他們祇努力於用一個什麼「和平的」方法來改善他們的境遇。第一，他們把他們的期望交托於「小天父」沙皇。所以當他們的期望在一月九日被打破了的時候，他們便打算盡可能用「溫和的」鬥爭形態——罷工——來達成他們的目的。十月罷工，實際上是得到了很大的結果；政府恐懼，已經大大的讓了步。但是，這祇不過是在勞動階級及其一部分指導者（孟塞維克）的意識中，「罷工的幻影」——即「罷工可以取得一切，罷工可以達成一切」的——這種錯誤的信念太強了

一點罷了。因此之故，在有更激烈行動之必要的時候，而且在以此更激烈的行動可以取得勝利的時候，依然沒有堅強的決心（特別在政府的胃口正宜於這付「藥劑」的時候是如此），還是信任終於失敗了的罷工。

最後，必須指出武裝兵士的離開革命，是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革命的團隊直至一九〇五年的秋季，還是幹着地下的秘密工作，他們的宣傳並沒有怎樣影響到兵士羣衆。加之軍隊又十分注意的警戒着「革命的傳染病」。因此，當時還沒有在軍隊內使得兵士們注意革命，並且也沒有如一九一五——一九一七年那樣的把他們利害關係和一般的國民密切的聯繫起來，使參加勞動與農民的聯盟來共同行動。在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中，兵士們雖不是武裝的國民，但實際上，他們是武裝國民的一部分。何況當時，士兵們尚且是國民的，即勞動者與農民之武裝的來源。

二 一九〇五年革命之肯定的結果

這次的革命，首先不僅打破了勞動階級的幻想，連潛伏於農民意識中的許多錯誤的幻想也被粉碎了。勞動者在一月九日喪失了對「天父沙皇」的信任，農民在一九〇五年的夏與秋之復仇的遠征（日俄戰爭）中也失去了對沙皇的信任。他們不相信從沙皇的手中可以取回自己的土地，他們的期望祇得寄托於革命了。革命成了勞動階級與勞苦農民結合的第一個擔保。正如同「付萬能的藥劑」，勞動階級隨革命的展開拋棄了對罷工有所期望之罷工的幻想，而且也向他們證實了列寧在一九〇五年三月間便已經說過了的，勞動階級祇有自己動手，纔可以取得他所需要的，並且纔可以保守他所取得的東西。

此外，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中獲得的重要結果之一，便是學到了勞動者必須要「把自身的利害與自身的政策和布爾喬亞的利益與政策嚴格的加以界限。在一九〇五年「社會」與政府開始鬥爭的時候，那時候，「全社會」——布爾喬亞知識階級與普羅列塔利亞特——都一齊舉起手來，好像是向着一個目的，在相同的口號與同一

面旗幟之下鬥爭的。這些口號就是憲法會議與「四個尾巴」，即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及其他。最初，布爾喬亞派和知識分子們確曾非常的同情於政治的總罷工。因此，有許多人以為勞動階級，在專制政治未推翻以前，必須和布爾喬亞派共同行動至最後為止。但是，當勞動階級一旦認真的起來用武裝暴動來開始顛覆專制政治的時候，則各種各樣的布爾喬亞派，以及持有各種不同心理的自由主義的布爾喬亞知識分子馬上便背叛了勞動階級。理由是很顯然的，因為布爾喬亞派對於勞動階級的興起，比死還要怕。在布爾喬亞派看來，與其讓勞動者自己動手來獲得憲法會議，倒不如祇要有一個最惡劣的憲法和發生癩疥的議會與專制政治妥協來得有利。

根據一九〇五年的經驗，勞動階級必須作成這樣的一個結論，並且是作成了的。即布爾喬亞派憎惡勞動者比憎惡專制政治還要厲害，並且也怕得厲害；雖因他們隱藏在革命的外衣之中，不能嗅得他們的臭味，但他們布爾喬亞派總是預備避免勞動者的興起的。看來，布爾喬亞派似乎是和勞動羣衆在同一面旗幟之下前進，也

和他們一樣的擁護着政治的口號，但在勞動羣衆拿出了不大靈活的手槍與家用的長槍，或從公園的鐵柵上拔出鐵棒來，爲擁護這口號而鬥爭的時候，則他們便會從這面旗幟之下逃開，吶出惡聲來。勞動者確切的認識了布爾喬亞汜是隨自身的方便而叛變的。

因此，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全部過程使得勞動階級認爲必須脫離布爾喬亞汜的政治線。這在一月九日的事件上，雖然已經表現得非常明顯，然而這次的革命，則更使得他們爲自己本身政治上的問題與自己階級的經濟的利害，必須走上獨自的道路。

最後，一九〇五年的革命證明了是有始終不變節，不向敵人讓步，不與敵人妥協，堅決的執行一切任務至最後爲止之勞動階級的真正的領袖的。一九〇五年以後，勞動大衆便選擇了布爾塞維克爲其領袖。

三 對議會的戰術

然而當勞動羣衆之新的活動感到異常困難的事情已經顯露了的時候，列寧則又勸說布爾塞維克此時應當參加國會。誠然，列寧在政府召集第一次國會時是反對過參加的，但那時因爲羣衆鬥爭的情緒已經超過了議會鬥爭，羣衆急於要武裝起來作更猛烈的鬥爭了。然而這時候羣衆是在失敗的情緒之下，又回復了和平鬥爭的幻想。自然，此時再叫羣衆拿起武器來和統治階級的專制政府血鬥顯然是不可能的事。那末議會便是一個很適當的鬥爭地盤。列寧勸告他的同志們參加國會，要在那許多人稱爲豬棚的國會講台上喊出勞動者與農民的切身要求，喚起他們的鬥爭。參加國會決不是向政府讓步，更不是和政府妥協。勞動者和農民在國會中決取不到自身的政治的和經濟的解放。參加國會，爲的是要揭開欺騙國民的假面具，從那裏面號召國民起來鬥爭。國會是被大地主，資本家，教授，律師，僧侶，以及富農們佔

去大多數的議席，勞動者團體選出的議員祇佔極少數的議席。列寧指示他們應該如何

何在議會鬥爭，他說：

『你們要像那些有教養的紳士們做出一派正經的樣子到議會去演說嗎？你們儘可率直的，一如勞動者似的，一如農民似的，指出勞動者的要求與農民制度的缺陷和大地主與資本家之不平來。你們要提出勞動者與農民之切身的極大限度的要求，那顯然是議會所絕對不能通過的，但是你們不妨把這些提案重覆的提出，直延到最後的一年爲止。這樣，勞動者與農民就會傾耳聽着你們的話，雖然你們所佔的議席是極其少數，但從那裏面會喚起鬥爭，使它結成一體。』

在這一點上，那時布爾塞維克的議員們，事實上的確完成了非常多的任務。

一九〇五年，在彼得堡，莫斯科以及其他的都市裏，問題已經開展到「勞動代表蘇維埃」之組織的程度了。並且在有些地方——克拉斯諾雅爾斯克(Красноярск)與赤塔(Чита)——已經組織了「聯合勞動代表蘇維埃」。一九一七年確立起來的政

治形態，便是列寧當時從這些蘇維埃之中發現出來的。他曾祕密的出席過「勞動代表蘇維埃」。他認為這些蘇維埃是「勞動階級所創造的政治新形態」。後來，俄國的革命走到了退潮的時代，這些組織的大部分都被破壞了，尤其是在斯妥列賓時代，極惡劣的如墓地一般的靜肅支配了死刑囚犯之運命的時代，列寧接受了黨內有力的勞動者的忠告，負着一顆沉重而且悲慘的心，再度的出國亡命，因為官憲的監視實在使他無隙可乘了，並為糾合新的力量準備新的鬥爭起見，也不得不如此。

一九〇六年夏，列寧出席了在斯篤克霍爾姆舉行的第四次大會，他在這個大會上竭力的主張土地國有以及在國會內的行動與其他許多必要的階級的戰術，猛烈的打擊了孟塞維克的機會主義。此後，他又回到彼得格勒，住在接近國境的地方指揮着運動。一九〇六年七月，克朗什塔與司威亞堡又爆發了叛亂，但不久便被鎮壓下去，參加者大都受了血的洗禮。列寧又移住到芬蘭指揮着國會議員的行動。他已經看到了在國會中可以比較自由的和國民大眾起着共鳴，在這個意義上，他堅決的主

張參加國會。

四 對孟塞維克的鬥爭

一部分比較進步的羣衆鑒於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失敗是缺乏統一的指導與指導力量的分散，要求社會民主黨應當再統一起來。因此之故，一九〇七年七月，社會民主黨召集大會於倫敦，列寧前往出席。他在這個會議上自然還是不放鬆對孟塞維克之無情的鬥爭。但是各國政府對他們已經加緊其壓迫了，迫得他們由哥本哈根（Copenhagen, Denmark）遷至馬爾摩（Malmö, Sweden），又由瑞典遷至倫敦。

有一次倫敦的報紙登載了一個奇特而滑稽的新聞，說列寧是一個安那其（無政府主義者），皇帝謀殺者的弟弟，大會中有一個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彼得·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和列寧一同在指導着。可見帝國主義者是怎樣的對革命者加以侮蔑和造謠。

大會中的鬥爭激烈到竟使敵方崩潰了。許多問題都是布爾塞維克獲得了勝利。而這個事實顯已說明，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確已沒有可能再相處下去了。

第二屆國會解散後，許多人又開始高唱起對議會的杯葛 (Boycott) 運動。一九〇七年夏，黨在威堡舉行全國大會，國會議員的選舉雖然對勞動者與農民的代議士加以種種限制，妨害其接近國會，但列寧依然澈底的力說應參加第三屆國會的選舉。一九〇七年八月，列寧參加在德國司徒嘉德 (Stuttgart) 舉行的第二國際的大會，和羅瑟·盧森堡 (Rosa Luxemburg) 共同提出宣言「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為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反對資本家政府的國內戰爭而奮鬥的議案。會議上，盧森堡女士指着她向克拉拉·蔡特金 (Clara Zetkin) 女士說：「你仔細的看看他，他就是列寧。看看他那頑強的固執的頭。一個真正帶着少許薄薄的亞洲線紋的俄國農民的頭。」大會畢後，他又回了國，但他覺得實在沒有在國內活動的可能性了，監獄在等着他了。中央委員會遂決議列寧必須再度出國亡命，並且信任他，派兩個人陪伴

他，帶着在瑞士從新建立一個布爾塞維克秘密新聞的任務。

五 一二次亡命

列寧第二次的亡命生活比較的是更困難了。那真是一個淒涼悲痛的時代。幾千個勞動者下了獄，數百人上了斷頭台，幾百個布爾塞維克的黨員在遙遠的流刑地繫上了足械，數千人被流至無遠勿屆的天涯。還有許多人則出賣了勞苦大眾，成了援助破壞地下秘密活動的叛徒。生成硬骨而又富於勇氣的傢伙們，雖嚙砂嚼泥也願留在黨內，則如同土龍般的深深的潛入地下。還有些勇敢而機敏的傢伙們，則或者往往拚着他們的腦袋破獄而出，或者從流刑地脫逃，又從新幹起工作來。

另一方面，也有些黨員對黨唱起弔歌來。特別是孟塞維克輩更為卑劣。他們唱着所謂「取消主義」，狂悖的力主取消地下的活動，說地下的政黨已經死亡了，那是一具死屍了，非將它埋葬起來不可。他們說，現在應該在帝制政府許可的範圍內作

公開的活動。他們說，凡是妨害公開活動的都必須排斥。列寧對此輩取消派竭其全力施與了沉重的打擊，猛烈的鬥爭。「火花」是很久以前就停刊了。他在一九〇四年開始發行了布爾塞維克的「前進」報；繼之，又發行了「普羅列塔利亞」與「社會民主主義者」；一九〇五年出版「新生活」報；後來又創刊「波濤」報；在莫斯科則有「炬火」流佈於革命的羣衆之間。

現在，唯一的任務是在集積已經消耗了的精力，從新將它聯結起來。因是，他在國外和一般馬克思主義者，爲教育勞動者的指導人材，創辦了一所學校。當時，知識分子的四分之三離開黨了。革命的紀念日，他們聚集在黨的周圍，可是當艱苦危難的時候一到，他們便作蝴蝶散了。列寧心想：『二十個三十個也好，祇要是進步的勞動者，把他們召集攏來，非以馬克思主義的知識武裝他們不可。』

由是，列寧便在外國設立了一所黨務學校，許多進步的勞動者都從俄國跑來在那裏集合着，對於政府的惡視毫無忌憚的在一處學習着，希冀從此輩人中造就出黨

的指導人材。列寧很早以前就看透了知識分子是靠不住的，阿德拉茨基(Adoratsky)在其「列寧追懷記」中敘道：

『一九〇四——〇五年正好是對專制政府作政治鬥爭的黃金時代。偉大的政治事變接二連三的展開來。列寧在國外便已經當了布爾塞維克派的領袖，指導着政治鬥爭。國內和在國外的黨的中央的聯絡便也日趨頻繁，幾乎每天都有同志從俄國到日內瓦來。列寧對每一個新從國內出來的人都要仔細的詢問他們關於各地勞動者的狀態。對於回國的同志們，則囑咐他們要盡力勸誘勞動者經常寫些關於工廠生活的通信寄到編輯部來。他見着從俄國出來的地方同志便問：「你們那地方的委員會裏有沒有勞動者參加着？」假若回答說「沒有」的話，則他便要問：「那是爲什麼原故呢？」像這樣的事簡直是常例。』

關於知識分子的逃避，列寧曾有一封信給在倫敦的羅斯士坦(F. A. Rothstein)說：『所有的知識分子，庸俗的原素都拋在黨外了；知識分子的退縮着實是不少。』

剩下的祇是一些真正的普羅列塔利亞特，並且公開地籌集經費也是不可能的了。」從此，黨不僅分裂，且亦沒有經營了。幾個月以前在倫敦舉行大會時，由喬治·藍斯伯雷 (George Lansbury) 和高爾基的援助，纔解決了他們的厄難。這時適巧有一個猶太人的製造家名約瑟夫·費爾資 (Joseph Feiz) 願意貸出一筆巨款，但是說明了一九〇八年的一月一日必須歸還。可是屆時實在是沒有還的可能了，列寧便央請羅士斯坦向費爾資君說明苦衷。參加大會的每一個人，不，是在布爾塞維克或孟塞維克都簽了一張 IOU (意即欠款借據)。這筆借款直至一九二三年布爾塞維克黨獲得了偉大的勝利後，纔還清了。

六 「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

關於創設學校的事，列寧也曾大大的鬥爭了一下。因為當時小說家高爾基與盧那卡爾斯基，波格達諾夫 (Bogdanov) 已札羅夫 (Bazarov) 、阿萊克辛斯基 (Alex-

insty) 等召回派，求神派，創神派——關於他們容在後面再述——也同時創辦了一個相同的學校。

他們的學校設立在意大利的加蒲里(Capri)島，從各處招集了一些勞動者，由波格達諾夫，盧那卡爾斯基，波克羅夫斯基(Pokrovsky)，李雅多夫，高爾基，斯太尼斯拉夫·伏列斯基，阿萊克辛斯基等擔任講師。列寧因為和他們的意見大相逕庭，所以纔在巴黎另辦一所學校。他把這個學校置於黨的中央委員會的管轄之下，自己便在裏面擔任講師。列寧所講的是一「土地問題」和「俄國以及外國的職工會運動」，季諾維埃夫講「俄國革命史」，加美涅夫講「黨的組織問題」，尚有其他數人則講其他的一些問題。這個學校裏面有一個鐵工名斯伊留夫的學生談起在學校裏面第一次遇見列寧的印象，說道：

「在我們到巴黎的第三天，相約去見列寧。晚間，我們被邀至在「普羅列塔利亞報」編輯所(是進門的一間房子)的中央委員會。季諾維埃夫出來招待我們。和季

諾維埃夫談了一些時候的話，但總是不感覺興趣，大家都在等着列寧來。不多時，從隣接的房間裏出來一個人，在窗前的椅子上坐下。穿着一件已經磨擦破了的西裝上衣，對於這個矮而前額光禿的人，誰也沒有注意。季諾維埃夫也沒有特別對這個人招呼，祇是繼續和我們談話。已經過了十五分鐘了，我實在有點忍耐不住了，便問季諾維埃夫：「我們已經等得這樣久了，到底列寧什麼時候可以來呢？」季諾維埃夫撲嗤一笑，向旁邊的那個人看了一眼，說：「列寧已經來了。」於是大家都笑起來。列寧便挨近我們的身邊。此後的談話也就活潑起來。隨着，和我們初見面的克盧普絲茹亞女士也進來了。她穿着一身樸素的衣裳，頭上用布包着。進來便立在火爐旁邊，看着我們，一直到談話完了，她還是立在那地方。列寧爲着我們求學的事，約定了到我們的旅館裏來。時間非常準確的，他來到我們的旅館，講關於「斯妥列賓之改革」。

波格達諾夫，阿拉克辛斯基等一派人在加蒲里島辦的學校，成績似乎不大高明

——因爲有一部聽講生離開了那個學校而到列寧這方面來了。於是他們便又在波羅尼市重新辦了一個學校。可是這個學校也遭受了同樣的運命。布爾塞維克的評議會由「普羅列塔利亞」編輯局發表了一個決議，在這個決議上，布爾塞維克宣言對召回派與創神派所辦的學校完全不負責任。

這班召回派與創神派究竟是怎麼個黨派呢？當時有一部分黨員認爲列寧是非常的穩健派，以爲列寧右傾了，迷惑了。他們以什麼理由稱列寧爲右傾呢？當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浪潮高昂得行將轉爲武裝行動的時候，列寧力主拒絕參加國會，對國會實行杯葛，認爲參加國會的選舉反足以使勞動階級和農民離開突進的政治鬥爭；反之，他認爲國會可以執行相當的任務，祇是在革命的勢力尚未充實，尚未完全結成的時候，纔主張參加國會選舉。這不是爲的要和大地主資本家們衝突，而是要從那裏實施徹底的民衆宣傳。由於民衆注意國會內的演說，列寧認爲從那裏可以號召羣衆的鬥爭。可是有一部分人以爲列寧背叛了革命，列寧是右派，而他們自己是左

派。後來這些人在國外便形成了要求從國會中召回勞動者議員的團體。因此便稱他們爲「召回派」。這些人中，有一部分在國外發行了他們自己的機關報「前進」。因着這個報的名稱，也有稱他們爲「前進派」的。列寧澈底的和他們鬥爭。他們也和「取消派」——孟塞維克——同樣的主張停止革命的祕密行動，列寧說，這祇是葬送勞動階級的革命而已。

此外，列寧向和「求神派」(God-seekers)與「創神派」(God-Creators)不斷的鬥爭着。對於革命失望的許多「印貼利更追亞」開始探求可以滿足對革命喪失了信仰的學說。一方面，當時的某些著述家們稱說爲使得已經覺醒於革命鬥爭的勞動階級滿足，有建設一種新的宗教的必要，說宗教和社會主義是一體，並且社會主義本身就是新的宗教。列寧對於這種對宗教問題的荒謬的態度，自然要澈底的無情的與以打擊，指出把社會主義當作宗教的祇不過是社會主義轉變爲宗教的一個形式而已。他和這輩求神論者毫不假借的勇敢鬥爭，甚至和盧那卡爾斯基鬥爭得斷絕了交誼，至

於爲着革命者的觀點，即使和其他的好友絕交，他也是在所不惜的。此外，他對創神論者也極端的反對。當時的創神論者也是主張建設新宗教的。他們說國民在自身的鬥爭中建設自己的宗教。列寧在這些見解中發現了非常的毒素。他和當時的創神論者之一阿萊克養伊·馬克西摩維支（高爾基），關於這個問題，互通了許多信件。列寧在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給高爾基的信中說：

「求神主義和創神主義拜神主義的差別，並不超乎黃鬼與青鬼的不同。反對各種各樣的鬼，神，並不是對各種各樣觀念的疫癘——其實一切的神也是一種疫癘，這和那最純潔的最理想的難以探求的神是相同的——表示反對，僅僅爲以青鬼區別黃鬼而談求神，較之什麼也不談起要百倍的惡劣。因爲各種宗教的概念，各種對神的概念，以及在請出神來以前，一切故作矜重的樣子，都是不堪形容的庸俗。尤其是爲民主主義的布爾喬亞汎所歡迎的（有時且以好意接受的），更是危險的庸俗，最是令人靈覺的「傳染病」。千百萬的罪孽，醜惡，脅迫，以及肉體上的傳染病，較之

以精緻的，靈性的外衣巧妙的改裝起來的思想——神的思想，要容易爲羣衆看穿，所以危險倒還小。

「姦淫處女的天主教僧侶——這是我剛纔在一個德國的報紙上看到的——較之不穿袈裟的僧侶，無頑固宗教頭腦的僧侶，以說教創造新神之理念的民主主義的僧侶，「在民主主義上」，危險要小得多。因爲前者的僧侶容易被認出，驅之並不困難。後者的僧侶，要被認出而驅逐之就千百倍的困難。因爲對他的裁判，在「懦弱」的可憐的優柔寡斷的」小資產階級是沒有一個人可以辦得到的。」

並且在那時，對於一些企圖修正改裝馬克思主義，在一些所謂馬克思主義的學說上隨處可以指出錯誤來的著者們，自稱爲老的馬克思的門徒們，也給了痛烈的打擊。他們爲着動搖並改造馬克思學說的目的，開始刊行了一些哲學的書籍。當時列寧爲要衝破敵人的要塞，自己非埋頭研究哲學不可。他日夜的坐在倫敦大英圖書館中，寫了一本關於哲學的偉大著作，向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布爾塞維克指示出一個

正確的方向。他在這本著作中，指出馬克思哲學的修正，在事實上，就是革命鬥爭之整個過程的修正，努力的維持着正確的方向。他的這本哲學的著作，在當時，對於布爾塞維克的革命者，簡直與他在革命浪潮中的指導有同等的重要。這著作便是「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同詩尚有一篇「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論文。

第六章 俄國勞動運動復活時代和帝國主義大戰時代

一 吼立在新的高潮中的列寧

從一九〇六年到一九一〇年的四年悠長的反動空氣，終於又被浪濤洶湧的俄國勞動運動席捲而去了。一九一〇年——就是列寧完成他的一部鉅著「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的那一年——是俄羅斯勞動運動的新的高潮時期，因為在那時，彼得格勒的工人齊集街頭，吹襲起一陣廣泛的大罷工的暴風，在這次暴風中，工人的罷工運動接二連三地發展起來，且有層出不窮之勢；同時，被俄國資本案殘害了的工人，為數實在不少，結果激起了許多頭腦純正的，優秀的工人們的反抗的熱情，形成了

明顯的或有意識的勞働運動。

一九一〇年末，列寧自己在國外繼續編刊「社會民主黨人」與「工人報」；同時又指導着俄國內的列寧的同志們所編各前進報紙的工作：即彼得格勒出版的「星報」和莫斯科出版的月刊「思想」。

在這時，取消派在黨內的活動，一天一天的接近於破壞黨的組織的趨勢了，列寧目覩着取消派正在破壞召集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的時候，便毫不留情地實行與取消派的分裂。列寧堅決的把應該分裂的機關實行分裂（例如對中央委員會的國外常務局的分裂），把應該向同志解說的會議上便給以解說（例如一九一一年七月舉行的巴黎第二支部的大會），總之，在這險象環生的當兒，列寧是從不表示絕望或畏怯的，却總是勇往直前，積極工作，並絕無倦意地作了不知多少次的關於黨的內部現狀的報告，以及關於取消派反黨活動的批評。內部鬥爭，顯然是達於沸點了。

列寧對黨內的鬥爭工作，還不止這些。當時，波蘭社會黨領袖蒂斯柯正懷着對

取消派的調和傾向，列寧便與蒂斯柯派斷絕了關係。

俄國組織委員會，在列寧的直接領導之下，產生出來了，這一組織，擔任了召集全俄代表大會的工作。這一次大會的產生，是值得注意的，是俄國革命史上的重要的一頁。因為它正產生於俄國的長期反動統治的後面，也正是產生於勞動運動再度高漲的當兒。

全俄代表大會的主要內容是：

- 一，宣佈這次代表大會為黨內的最高領導機關；
- 二，開除了取消派的黨籍；
- 三，通過了許多關於策略上的決議，尤其是關於時局及第四國會選舉問題的決議；
- 四，產生了新的中央委員會。（列寧當選為該委員會委員）。

這一次大會，是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八日開始舉行的，連續不斷地開了十三天之

久，地點是普拉格 (Prague)，因而有「普拉格代表會議」之稱。但這一次大會的順利進行，全靠列寧的佈置工作的完密，他在籌備這次大會之前，就早已對取消派、托洛茨基派、前進派、調和主義的布爾塞維克、波蘭社會民主黨人等，進行了無情的鬥爭了。

列寧在從一九〇八年「十二月代表會議」至「普拉格代表會議」這一時期的著作活動，據一個最可靠的綜合記述，大致如次：列寧的主要精力，大部集中於對取消派及調和主義者的反擊，以擁護自己的黨。當時，列寧在各刊物上分析了俄國革命的一切基本問題，證明布爾塞維克政策的正確，揭發孟塞維克、托洛茨基和別一些人立場之改良主義的、機會主義的實質。此外，列寧還做了下列的工作：發揮了社會民主黨的宗教觀；估量了各階級及各政黨對宗教寺院所持的態度，批評了立憲民主黨的名震一時的文集「指南」，稱之為「自由主義叛徒的千金裘」；在俄國文豪托爾斯泰逝世時，做了一篇論托爾斯泰的論文，分析了真實的藝術乃是時代現實

的客觀反映，並且稱托爾斯泰爲「俄國革命的鏡子」；在一八六一年農村改良紀念日，做了一篇論當時農村改良的文章；估計了斯特列賓的政策；寫了許多關於「第四國會」選舉問題的文章；作了一篇論俄國罷工統計的文章，分析了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罷工運動之經過以及其他等等的問題。

除了著作活動以外，列寧也曾在巴黎近郊的龍壽姆黨的學校裏作了許多次的講演。這是一九一一年的夏天。同年，九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他又曾出席於「國際社會主義常務局」的會議（在蘇黎支召集），在那次會議上，他擁護着盧森堡的立場，擁護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幫助盧森堡暴露一個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在國會改選時對於殖民地問題方面所犯的錯誤。

二 從巴黎到克拉克

俄國的勞働運動正在激盪不停的高潮中。

列寧感覺得現在是時候了，爲了黨的工作的展開，爲了個人活動範圍的擴張，都不得不謀向國內更進一步的接近。這時，彼得格勒是可以公開發行報紙的，於是他就積極地參加了彼得格勒的報紙工作。

懷着這一目的，列寧就在一九一二年七月初，從巴黎移居到波蘭的克拉科城。在這里，一直住到一九一三年五月爲止。

讀者當還記得列寧領導的「普拉格代表會議」，是曾經嚴重地打擊了取消派，各民族黨、托洛茨基以及僑外各組織（德國社實民主黨、波蘭社會民主黨）的路線的，因此而引起對方的攻擊和譁變，當然是極有可能的。取消派他們說：「普拉格代表會議」是暴行，是分裂主義。

首先是托洛茨基匿名寫了一篇論「普拉格代表會議」的文章，發表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中央機關報『前進』上面，爾塞維克當即給了那篇文章以明朗的駁覆，可是該報不肯予以發表。沒法，列寧使用德文寫成了兩本小冊子：「前進報上的匿

名氏」(一九二二年三月出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現狀」(一九二二年七月及九月出版)。此外，列寧又在「波蘭社會主義反對派」機關報上，發表了兩篇論黨內現狀和蒂斯柯的調和主義的論文。

在另一方面，惱羞成怒的托洛茨基，籠絡了取消派，托洛茨基派，猶太工人同盟派，萊多尼亞派等，組織了「八月聯盟」，跟列寧所領導的布爾塞維克形成對立——形成組織的對立和政治的對立。對於異端似的取消派和「八月聯盟」，列寧便在「真理報」、「教育」以及公開出版的「社會民主黨人」等刊物上面，進行了殘酷的鬥爭，使對方的歪曲理論被攻擊得體無完膚。

尤其是當着「第四國會」選舉時期(一九二二年)，列寧對取消主義的鬥爭更奏出了最猛烈的音符。在選舉的鬥爭中，布爾塞維克達到了偉大的勝利，那就是說：在工人選舉會議上當選的六個代表個個都是布爾塞維克。這證明列寧當時所提出的主張和口號，例如：堅持無產階級獨立的政策(包括民主共和制度，八小時工作

制，沒收地主的土地等口號）和主張由無產階級奪取民主派，使其脫離立憲民主黨人的領導，都是百分之百的正確。

選舉中當選的六個代表，跟列寧的關係一直沒有斷絕，倒是越來越密切了。他們曾經有好幾次到克拉科來會見列寧，而他也很細心地指導他們工作，經常地跟他們通信，給他們起草提交國會的綱領和演說草案。

事實上在「普拉格代表會議」之後，黨的中央委員會早已任命列寧和季諾維埃夫留在克拉科招待從彼得堡和莫斯科而來的同志，加上列寧的努力活動，更使克拉科不但是成爲了全俄通信網的中樞，而且成爲了全俄革命活動的總部了。

一九一三年一月十日至十四日（這是俄曆，按公曆係二月間的事），中央委員會在列寧的領導之下，在克拉科城，召集了一個重要工作人員的會議——即「二月會議」。列寧做了兩個報告：一個是「革命高漲，罷工運動和黨的任務」，一個是「對取消派應取的態度和黨內一致問題」。

這一時期，列寧的著作活動非常緊張，大都跟「真理報」和「教育」有關係。他差不多每天都給「真理報」寫一篇稿件。稿件的性質，不是與俄國問題有直接關係的，便屬於國際現勢的分析，而尤其偏重於國際勞動運動和殖民地革命運動。

三 從克拉科移居波羅寧

到了一九一三年五月中旬，列寧決定從克拉科移居波羅寧（在加拉西亞）。六月二十一日，他突然取道維也納，到達瑞士。八月初，又離開了瑞士。當他在瑞士境內勾留一個半月的光陰中，列寧曾經在許多城市里作過關於民族問題的演講。八月五日，正待離開瑞士之際，列寧也還出席於「俄國民主工黨僑外組織在伯恩城所召集的代表會議，並作了一個關於黨內現狀的報告。當列寧已經到波羅寧之後，中央委員會連同黨內工作人員，於十月三日至十四日，在列寧領導之下，召集了一個「夏季會議」。他在那次會議上做了「關於中央工作的總結」和「關於民族問題」

的兩個報告。

這時，黨內統一問題，顯然是嚴重起來了。一方面，孟塞維克的七人團，在國會中拚命排擠着布爾塞維克的六人團，並且堅決反對列寧所提出的六人團與七人團應受平等權利的要求。列寧便索性把六人團和七人團實行分家。另一方面，許多同志（例如彼得堡的一部分同志，甚至「國際社會主義常務局」的同志），都怕見黨團的分裂，企圖把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取消主義者調和起來，「統一」起來。列寧在他的一篇論文的標題上面，便很鮮明地表示出那是一種「藉主張統一之名來破壞統一之實的勾當」。

後來，「國際社會主義常務局」決定在蒲魯塞爾召集俄國一切社會民主派別代表開「統一會議」，希望從此造成「統一」。隻身在波羅寧的列寧，這時便代表中央草成了一個提交「統一會議」的詳細報告。這一報告，包括着作為跟取消派統一的哀的美敦書的十四項要求，內容大略是：

一、取消派及其他派別必須無條件地放棄自己的觀點；

二、接受黨的革命綱領；

三、服從中央及黨內各機關的一切決議；

四、消滅取消派的組織委員會等組織。

當然的，列寧的精神，跟「國際社會主義常務局」的精神是相反的，絕對不能容納無原則的「統一」。因此，「蒲魯塞爾會議」終於落得個「不歡而散」。

但是另一方面，勇於反對布爾塞維克的取消派，前進報派，托洛斯基領導下的「鬥爭報派」及其他各派，却又蠢蠢然結成了所謂「蒲魯塞爾聯盟」，表示他們反布爾塞維克的勇氣，依然不減於從前。

無結果的「蒲魯塞爾會議」，原先決定把「黨內統一問題」提交將在維也納召開的「國際大會」上去解決，但是終於還是無結果，因為當時，大會離會期還遠，未及啓幕，而在舞台暗轉之間，却突然在歐洲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展開了一幕新的活劇

——「歐洲大戰」，或者把它叫做「世界大戰」，也可以把它叫做「帝國主義大戰」。

四 列寧全生涯中的一個轉換點

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這個世界大戰，是一個轉變點：一方面表示着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嚴重的危機和崩潰的時期了，另一方面却響起了「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發動時間已到」的號角了。

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爆發，是在一九一七年的俄羅斯——帝國主義鎖鍊中的最薄弱的一環；同時也是在最前進的，最堅強的革命的社會主義的黨——布爾塞維克黨——和列寧的領導之下的。

這不但是列寧全生涯中的中心點和轉變點，而且是現代歷史上的中心點和轉變點。

「社會主義國際」，在它的決議中，早已豫示了這次將要來到的戰爭危機，以

及它那作為革命起點的重要性，並且早已一致地議決了一切社會主義黨派在這一形勢下的任務。第一次是一九〇七年在司徒嘉德 (Stuttgart) 召開的「國際社會主義者代表大會」上，第二次是一九一〇年在哥本哈根，第三次是一九一二年在巴塞爾 (Basle)，反反覆覆地說道：

「如果戰爭的危機迫於爆發的時候，各關係國的工人階級和議會中的勞動代表（由國際社會主義常務局作其支持）的義務，就是必須利用一切方法，即是利用階級戰爭和一般的政治形勢之下最有利於自己的一切方法，去防止戰爭的爆發。

「到了戰爭真個爆發了的時候，他們的義務就是設法使它迅速停止，並須努力運用因戰爭而引起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危機，以便喚起大眾，而促成資本家統治的沒落。」

一九一二年「巴塞爾決議」更強調了這一宣言，並直接地舉引「巴黎公社」的前例來證明它是普法戰爭的結果，舉引第一次俄國革命的前例來證明它是日俄戰

爭的結果。

我們已經在前面說過：列甯在一九一二年，曾經替「真理報」寫過許多篇關於國際勞動運動的殖民地革命運動的論文。在那些文字之間，他早已明顯地指出了一九一二年末國際形勢的特徵，跟往年不同。分開來看，便有下列的現象：

一、物價騰貴；

二、羣衆罷工；

三、各國趨向於帝國主義化；

四、國際間瘋狂的爲了爭取市場而鬥爭；

五、帝國主義大戰日益逼近。

總括了這些，便是如列甯所指出的兩個特徵：

一、勞資衝突的極端劇烈化；

二、社會主義實現的逼近。

此後的事實的演變，一一地證明出這種天才的分析之正確。

五 對大戰所持的態度

世界大戰的第一幕，是在一九一四年八月間展開的。那時列寧正居留在加里西亞州的波羅寧村。奧國的地方當局疑他是俄國政府的暗探，立刻把他下了獄。

在獄中過了兩週之後，列寧在幾個奧國社會民主黨人的斡旋之下，證明他是一個俄國革命家，是俄國專制政治的大勁敵，於是被釋出獄了。（八月十九日）

九月間，得到了奧政府的批准，列寧才離開奧國，到達了中立國的瑞士；從此就居留在伯恩城，至一年半之久。一九一六年二月，列寧才從那里移居到沮利克城。

帝國主義大戰開始以後，列寧便從加里西亞到瑞士，寫了一篇關於大戰的工作綱領。這篇綱領，是基於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的，題名為「歐戰中革命社會民

主黨的任務」(Tasks of Revolutionary Social-Democracy in the European War)。不久，這一綱領，便被國外和國內的黨人所採用，在十月間列寧便把它改寫成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的宣言，到十一月一日發表出來了。

在這篇綱領和宣言中，列寧分析當時的戰爭的性質是一種帝國主義戰爭；他又指出：「第二國際」已經宣告了自己的破產，「第二國際」的大多數領袖已經背叛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已經放棄了無產階級的利益，實行乞憐於資產階級的尾巴後面去了。

於是 列寧提出了新的口號：

——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

——使沙俄帝國打敗仗！

……等等。

沙皇的鐵蹄，在歐戰剛正開始的這當兒，便糟塌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喉舌

——「真理報」。但是聰明的列寧知道：有筆的時候提筆，有口的時候開口，乃是革命者適應環境的必要的武器。他既已目覩到沙皇統治的無恥，也感覺着當時社會國家主義的惡潮的可怖，因此，雖則沒有自己的報紙可以隨心所欲地發揮他對於戰爭和革命的見解，他也還是利用瑞士境內僑外社會民主黨人的大會，提出布爾塞維克的正確觀點。

困難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把困難克服過來。當然，在列寧的字典里是沒有「困難」這些字樣的，因為他有克服困難的勇氣和毅力。他首先設法把黨的中央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復刊起來。篇幅很少，每期出版時間又相隔很遠，運入俄國又須極端秘密，這些「困難」，在列寧都「履險如夷」地親身經歷過來了。

他又不斷地給黨內的取消主義者和動搖份子以無情的攻擊和有情的指摘，他極端鋒銳地批判了各種各樣的社會國家主義，公開的和隱藏的社會國家主義，以及俄國國內的取消派（普特勒索夫 Putelksov），國外取消派（馬爾托夫）、猶太工人同

盟，舍支派，托洛茨基的「我們的話派」所鼓吹的社會國家主義。關於黨的策略和口號方面，他指摘了布哈林(Bukharin)的擁護「牧師式的」和平口號是在實質上跟托洛茨基一鼻孔出氣的取消主義口號，他又批判了普列哈諾夫(Plekhanov)在「洛桑大會」中所作的含有社會國家主義觀點的報告。同時，他又熱情地指導了斯路普夫柯夫和李維諾夫去出席領導各種會議（「瑞典社會民主黨代表大會」和「各協約國社會主義者倫敦會議」等）。列寧更猛烈地搏擊了當時用最巧妙的方式替社會國家主義作辯護士的考茨基——「第二國際」的著名首領。因為他對於中途變節而贊助政府的戰債的「叛徒考茨基」之流的嫌惡，簡直像對資本家一樣嫌惡。

六 第二國際的死滅和第三國際的生長

世界革命史上有名的「齊美瓦爾德代表會議」(Zimmerwald Conference)，是在一九一五年九月五日至八日舉行了。這會議，可以說是國際反戰社會主義精神的展

開。除英美兩國代表外，各國都有代表到會。列甯也是列席了的。在這會議里，他積極地領導着左派的工作，並提出自己的獨立綱領。同時，在會議里，一個傾向於社會國家主義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勒德布爾站起來反對列甯，說他只是「在外國」喊革命口號，只是「從外國」把革命口號搬到羣衆中去。列甯當時從容地，嘲諷似地駁覆了他的斥責：

「我從事革命工作，已經二十多年，曾經從監獄裏，從西伯利亞戍地，從國外，給羣衆提出了革命的口號；我還要效法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八四八年代的故事，把我自己的革命任務徹底完成哩。」

他雖則並不拒絕跟齊美瓦爾德代表會議中的多數代表合作，但他也決不放棄對於動搖份子和機會主義份子的積極鬥爭。他宣告了「第二國際」的死亡，要求着新的國際的生長。

——「第二國際」死了，「第三國際」萬歲！

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三十日，列寧參加了第二次國際社會主義的會議——「基恩泰爾代表會議」(Kienthai Conference)。由於左派的爭持，「基恩泰爾會議」通過了比較急進的決議，但列寧的終極理想，依然不能在多數代表前面實現。

直到一九一六年末至一九一七年初，齊美瓦德的多數代表，一起走向社會國家主義的泥坑里去了。列寧便挺身而起，號召真實的革命左派起來組織真實的革命國際。

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大戰時代的具體形勢下，列寧對於戰爭的態度始終是運用着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路線的。由於一連串的短論，演說，決議和指令，(尤其是「一九一五年發表的『社會主義與戰爭』(Socialism and War)和『第二國際的沒落』(The Collapse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一九一六年的『帝國主義論』(Imperialism)和一九一四——一九一六年的一系列的短論，題名為『抗流』

(Against the Stream) 的一個集子)，同時，由於跟各主要國家革命運動的代表人物的直接交往，他的工作是無比的艱鉅。

在帝國主義大戰時代的初年，列寧曾潛心地寫成了一本「卡爾·馬克思」。在大戰以前，他也曾攻究哲學，從亞里斯多德、費爾巴哈、特別是黑格爾等人的著作中研究得最精細，而且耐心地從事於札記工作。甚至在大戰的當兒，他也還想繼續從事於這種哲學的研究，但實際上因大戰而激起的他的迫切任務，不容許他做這種工作。他自有擺在他面前的對於大戰時代的領導工作要首先完成。

我們在前面曾經說起大戰時代是列寧全生涯中的一個中心點和轉變點，在這里不妨下一註解，那就是說：在大戰以前，列寧是俄國布爾塞維主義的領導者；到了大戰以後，他却變成了革命國際主義的領導者了。這樣說來，帝國主義大戰，在列寧的全生涯中，也正可說是一個分水嶺。在他此後的生涯中，特別是從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後，他還有一個新的中心點，新的轉變點，因為到了這一點，列寧的生

活，顯然是變成了全世界革命的領導者了。

列寧在大戰時代領導黨的工作，其核心即在於一個總的口號：「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對於這一口號的提出，可不是曾經遭遇了一切直接反對派甚至社會主義領袖的拒絕嗎？然而歷史是最無情的事實揭露，此後不久，事實呈現出真理的所在——革命終於一九一七年三月在俄羅斯猝然發動了。

第七章 從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時代

一 第二次革命與列寧回國

俄國革命，從最初爆發的時候起，就一向是從下層掀動起來的羣衆性的反抗。它的開端，應該追溯到當彼得堡罷工工人走到街頭，一致高喊「消滅戰爭！」「打倒沙皇制度！」和「我們要求麪包！」這些口號的時代。繼續高漲着的罷工運動和示威運動，到了公曆三月（即俄曆二月）的初旬，已經達到了它的頂點，有幾千幾百萬的工人齊集到街頭。哥薩克拒絕了對於工人的鎮壓。同時，那些被派來掃射工人的兵士們，開始繼續不斷地參加到工人這一邊來，並幫助他們把沙皇的特別警察

掃射下去，這些事實，保證了革命的勝利。沙皇制度之前，再沒有別的路可走了，唯一的路，就是沙皇退位。

沙皇制度的慢性崩潰，由於戰後整個經濟上和行政上的失調和破壞，由於上層階級的徹底腐化和惡化，由於軍事前線上的慘絕人寰的屠殺，由於農村的破產和城市大眾的飢餓，就逐漸走向完全崩潰的道路了。

二月革命完成，純然是靠着工人大眾和兵士大眾的力量，除此以外，外界的任何力量都是不會參加的。當二月革命的時代，如果工人和兵士懂得怎樣運用政權或明瞭他們運用政權的目標時，那麼，一切的政權，實際上便都落在工人和兵士的掌握里面了。二月羣衆革命的目標，跟以後十月革命中最後實現了的目標，無論在本質上，或是在胚胎上，都恰恰是相同的，目標是在於和平，在於麪包，在於土地，在於新社會制度。

但是在當時，他們並沒有任何明確的政治意識，也並沒有任何實現這些目標的

必然之路的意識，除了仍然佔着極少數的布爾塞維克的前衛以外。因此，在從二月到十月這八個月中間，必然地需要經過了充分的政治發展過程，才能夠使他們的目的逐漸地實現起來。

關於這一時期的情形，我們特別屬意於蘇聯作家梭林 (Sulin) 的簡明的敘述，因為我們感到他所敘述到的地方，校訂得特別確切，補充得特別完善，很有加以援引的必要。他這樣敘述着：

當俄國二月革命的消息剛剛傳入瑞士的時候，列寧便決定馬上設法回俄國去。他這個目的是很難達到的。英法帝國主義者，無論如何不肯放走這一個俄國的革命的國際主義者。而俄國「臨時政府」(Provisional Government) 也不願意讓「敗仗派」(當時有人稱布爾塞維克爲「敗仗派」) 回俄國。孟塞維克的社會革命黨的「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蘇維埃」對這個問題，又採取旁觀的態度。當時，列寧已經深信，歸還革命俄國的「合法」道路是完全不能辦到了，而各種秘密渡過的計劃，又無法

實現；所以他便決意公開經過正在與俄國交戰的德國。關於向德假道，交涉的任務是由瑞士社會民主黨人（以普拉敦爲首領）擔任的。

德政府批准了僑民通行的要求；列寧便偕同一部分同志，經過德境而到達瑞典，再取道芬蘭而抵彼得格勒（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六日）；下車（按列寧等回國時，會陪騰着「被密閉的列車」the closed train，即指此而言的。）時，備受着彼得格勒布爾塞維克及工人羣衆的熱烈歡迎。資產階級和黑幫派拚命散佈誣蔑的謠言來反對列寧，說他跟德國有祕密關係。

當列寧尚未離開瑞士時，關於二月革命的經過情形，他還沒有得到充分的情報，那時，他在一封有名的「遠方來信」(Letters from Afar) 中對於二月革命及其起因，就給了一種詳細的分析，並規定了工人階級的任務，指出把政權移交蘇維埃，爭取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爭取社會主義之必要。

列寧抵達了彼得格勒，立即提出他那篇著名的「四月綱領」(April Theses)，

這篇綱領，隨即成爲黨的此後全部策略的基礎。這篇綱領，給與人們的影響是很巨大的。

列寧在「綱領」中所提出的基本觀念（在他所著的小冊子「俄國革命中無產階級的任務」Tasks of the Proletariat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和各種論文及演說中，他又把這些觀念加強發揮了），可以歸納如下：

在專制制度推翻之後，政府已經轉入資產階級（資本家）之手了，戰爭照舊還是帝國主義的；因此，無產階級不能幫助這個戰爭。「對革命的「護國主義」表示絲毫的讓步，即等於背叛社會主義，即等於完全放棄國際主義。」必須向羣衆「耐心地解釋」和證明，「不推翻資產階級，就不能用真正民主的（不以強迫的）和平來消滅戰爭」；現在時局的特徵，就是「兩重政權」(dual powers)，就是「除了臨時政府（資階級的政府）之外，還有另一個政府——特殊的，雛形的，但無疑地實際存在的，日益發展着的政府，即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對於「臨時政府」，不能表示

任何的信任和援助；舉國上下的一切政權，都應隸屬於蘇維埃，它是新的特殊的國家形式，它是跟「巴黎公社」相類似的；在目前這一時期，布爾塞維克黨還占少數；在蘇維埃里面，大多數人還是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他們都在資產階級影響之下，幫助資產階級，不敢和它脫離關係，不敢獨立地奪取政權。在當前的這一時期，「一切政權歸蘇維埃」這個口號，還不等於建立無產階級的專政，這個口號是等於要求把政權轉入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手里，以使小資產民主派脫離資產階級。現在，布爾塞維克還佔少數，廣大民衆（特別是農民，以及一部分工人）都在擁護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因此，我們要揭發這些小資產階級政黨的妥協政策，在羣衆面前指出羣衆自己的錯誤：在下層羣衆中間，在工人、兵士、農民中間，進行精細的，堅忍的工作，藉以取得他們的信仰，取得蘇維埃里面的大多數。可是當農民羣衆和工人羣衆已經根據本身的經驗而瞭解到妥協派政策之必然死亡的時候，已經根據本身的經驗而深信妥協派的無力脫離資產階級，無力解決基本的革命任務（

和平、土地、自由)的時候，當蘇維埃大多數已開始轉到布爾塞維克方面來的時候，「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便成了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的口號了。列寧的戰略計劃所希望的，就是要使大多數民衆(目前還相信妥協派和資產階級的民衆)相信布爾塞維克主張之正確，使廣大羣衆瞭解無產階級專政之必要，使他們瞭解只有無產階級專政才能使俄國脫出帝國主義戰爭，才能脫出因帝國主義戰爭而產生的經濟破產的局面。因此，列寧認爲革命的「第二階段」的任務，就是由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同時，他又警告自己的黨(黨在當時還是佔少數)，使它不要採取托洛茨基主義的策略——以「工人政府」馬上奪取政權爲兒戲；因爲如果採用這一種策略，就等於「跳過」現在還沒有完全放棄幻想的農民，而農民又佔全國人民的大多數，現在呢，又還在相信資產階級和妥協派。除了蘇維埃共和國口號之外，列寧又指出了下列的要求：立刻由農民沒收地主的土地(不要等待「臨時政府」所允諾召集的「憲法會議」)；把一切土地收爲國有。實現沙皇制度壓迫下的一切大小民族脫離

俄國而分立的自由；收一切銀行和「新狄加」爲國有，使其隸屬於蘇維埃的監督之下。列寧解釋着說：這些經濟設施，還不是社會主義，可是，這已經是走到社會主義的一個步驟；不走向前去——不走向社會主義，不走向無產階級專政，就不能脫出戰爭所造成的局面。他又寫着：『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將人類從戰爭、饑荒，幾千幾百萬人民繼續犧牲中救拔出來。』除此而外，列寧在「綱領」中又指出：發起建「第三國際」（不允許任何機會主義者加入進來，無論社會國家主義者也好，中庸主義者也好），這正是革命無產階級的義務。

在列寧未到俄國以前，黨在決定向前鬥爭的方向問題上表現着相當的動搖；可是，當列寧一到俄國之後，黨就馬上跟着列寧堅決地糾正了自己的路線，走上了爲社會主義而鬥爭的道路。「彼得格勒代表會議」和「全俄四月代表會議」（就它的意義上說，這次會議是等於全國代表大會），完全接受了列寧的意見。在「彼得格勒代表會議」上（公曆五月五日，即俄曆四月二十二日），列寧作了一個關於目前形勢和

對於「臨時政府」的態度問題的報告；而在「全俄四月代表會議」（公曆五月七日至十二日，即俄曆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上，列寧又作了幾個報告，論時局，論土地問題，關於修改黨綱問題，以及許許多多的演說。在兩次代表會議的過程中，列寧堅決地反對了右傾反對派（加美涅夫，里科夫）；因為他們企圖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模型來限制革命運動的任務，他們要求由革命無產階級來幫助「臨時政府」，「如果它是真正反動舊制殘餘的話」（他們認為資產階級的政府還能夠真正跟舊制度鬥爭），他們反對爭取社會主義，爭取無產階級專政之必要。同時，列寧又反對了那些否認民族自決權的左派傾向者（皮達科夫等）。這時，米留科夫發表了一篇有名的通牒，聲明「臨時政府」完全遵守與協約國簽訂的一切條約。這個通牒，引起了四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巨大的政治危機。黨的「彼得格勒委員會」採取了不正確的路線，企圖比中央委員會「稍許走左一點」。中央根據列寧的提議，向羣衆發出了和平示威的口號；而彼得格勒委員會却提出推翻「臨時政府」的口號。

在當時的形勢之下，這種口號的提出，乃是一種冒險的口號，因為大多數可靠的民衆，還沒有站在革命無產階級方面來；列寧堅決地糾正了這種冒險的路線。黨在列寧的領導之下，肅清了左傾反對派；同時消滅了左傾的「跳躍家」；從各方面向廣大羣衆解釋了布爾塞維克的政策，同時，又批評了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小資產階級迷信的和妥協的政策；在各國工廠和軍隊中間，建立了黨的嚴密的組織；其結果，使黨在羣衆中間的影響得到非常的膨脹，而廣大的羣衆都一齊團結在列寧所提出的口號之下而動員起來了。正唯由列寧這種正確的政策，黨在羣衆中的影響，才一日千里地增長起來。

二 七月事件前後

「七月事件」以前，列寧經常在「真理報」上發表自己的論文（他自己就是該報編輯人之一），許多次在工人和兵士羣衆大會上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同時，「

全俄農民代表大會」（公曆六月四日，即俄曆五月二十二日）和「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公曆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即俄曆六月四日至九日）上，他又作了許多長篇的演講；那時，這兩次大會的大多數代表，還是處於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影響之下。但同時，一切政治運動（例如蘇維埃選舉，區議會選舉等）和彼得格勒無產階級的一切羣衆運動，却都是在列寧的直接領導之下進行着的。

當「七月事件」剛開始時，列寧便立刻從彼得格勒附近的鄉村（他是因病住在這裏的），移居城內，以便領導彼得格勒無產階級自發的運動，並使這種運動帶最高度的組織性。這時候，布爾塞維克已經奪得了彼得格勒的全體無產階級和衛兵。可是列寧認爲布爾塞維克當時奪取政權的嘗試，只是一種時機未到的嘗試，因爲布爾塞維克當時還沒有奪得全國工人階級大多數和全國民衆的大多數。

彼得格勒工人的「七月鬥爭」，是在蘇維埃奪取政權的口號下發展起來的；可是因爲孟塞維克和社會黨人完全地公開地滾到革命資產階級的方面，因爲他們大批反

動軍隊都召集到彼得格勒城內，使革命工人和兵士的七月鬥爭遭受了一時的失敗。資產階級爲要被壞並搗亂革命的運動，公然拿出了警察局阿萊克辛斯基 (Alexinsk.) 所偽造的卑污謾罵的「證據」，說列寧是受德帝國主義所收買了的奸細，是幫助德帝國主義的偵探。當時，反革命勢力對列寧和布爾塞維克施行了極端慘酷的摧殘。「臨時政府」頒佈了逮捕列寧的命令。克倫斯基的軍官團，到處搜捕革命工人的領袖。

在這種情形之下，列寧才不得不依照中央委員會的囑咐，暫時地隱匿起來。在工人阿尼羅埃夫 (Anilov) 家里 (在彼得格勒近郊) 藏匿了幾天之後，就跑到工人愛墨爾盎諾夫 (Emeryanov) 家里 (在彼得格勒附近的塞斯特洛林茨克村) 住了一天。第二天，他又躲到一個離拉茲里夫車站幾里路的草房中去了；在這個草屋里面，居住了四十五天。九月初，他又祕密地逃往芬蘭。此時他化裝爲機關車的火夫，到達赫爾森法斯城，密居於一個忠實可靠的芬蘭社會民主黨人的家里。

當時，列寧雖處在隱居狀態之下，但是他依然跟中央委員會保持很好的聯系，努力參加中央機關報的工作（中央機關報「真理報」被抄封以來，曾更換了幾次名目）。在這個時期，他寫了許多指令式的論文和小冊子（如「論口號」、「論憲法的幻想」、「革命的教訓」、「災變、危險及怎樣和它鬥爭」、「俄國革命與內戰」、「革命的任務」、「危機成熟了」、「布爾塞維克能否保持國家政權」，這最後一篇文章是在「教育」雜誌上發表的），估計了因七月事件而形成的局面，並號召羣衆和黨去準備那種必然到來的武裝奪取政權的鬥爭。

存七月危機（這是革命行程中的轉變點）剛才過了之後，列寧就指出革命「和平」發展的時期已經完結；現在，在立憲民主黨領導之下的反革命已經得到了勝利，不進行國內戰爭，不舉行新的，第二次的革命，就不能奪取政權。在這時候，列寧一步一步地在羣衆面前揭露出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革命中的叛徒作用，說他們企圖使工農羣衆投降資產階級。他又特別向農民說明：「在民衆沒有拋棄自己對社

會革命和孟塞維克黨的迷信以前，」在政權尚未轉入無產階級之手以前，農民是沒有獲得土地的可能的。同時，列寧又給將來的革命政府擬定了經濟的綱領，提出了下列各項基本的方針：把一切銀行集成爲一個銀行；把一切銀行收歸國有；把各個「新狄加」——即資產階級最大的壟斷聯合（煤油、煤炭、冶金、沙糖等「新狄加」）收歸國有；廢除商務祕密制；調節需要等等。列寧認爲工人階級在當前整個歷史階段中的任務，就是：『或是死亡，或是趕上甚至超過先進各國』；並且再三強調地指出：『在二十世紀的俄國，在已經用革命手段取得了共和制度和民主制度的俄國，不走向社會主義，不實行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就不能有什麼發展。』

當列寧避居芬蘭時，他又指導了聯共第六次代表大會（半公開地在彼得格勒舉行的），大會研究到黨綱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他在「七月事變」以前就已經開始研究了（例如「關於修改黨綱的材料」，「對修改黨綱問題的意見」）。

同時，他在赫爾森法斯城，又結束了他那部題名爲「國家與革命」(Stat. and

Revolution) 的名著；在這一部書里面，他把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問題的學說——被機會主義者所忘却所曲解了的學說，恢復起來，並且把它提高到新的階段。他的從事於該書的著作，還在他僑居國外時（即二月革命以前），就已經開始了。他這一部書對於爭取自己專政的無產階級，不僅含有極大的理論價值，而且帶有特殊的實際政治的意義。

列寧在這一部書上說明：國家（資產階級的國家）是一種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的產物；無論它蒙着什麼民主制的或代議制的外衣，在實際上，它總是資產階級（少數人）用以壓迫被剝削者和勞動大眾的工具。列寧特別根據了「巴黎公社」的經驗（由馬克思所總結了的經驗），向工人階級指出這裏的任務：「破壞」和「打碎」資產階級的、官僚主義的國家機器，而以自己的無產階級的國家來代替。『無產階級國家的代替資產階級國家，只有經過暴力革命才有可能。』無產階級國家的任務是什麼呢？『無產階級必須建立國家的政權——集中的權力組織，集中的暴力組織，

爲的是要壓倒剝削者的反抗，爲的是要領導廣大民衆——農民，小資產階級，半無產者，共同來「處置」社會主義的經濟，『無產階級把自己組織成爲一個統治階級之後，就應當『領導全體民衆走向社會主義，領導並組織新制度，應成爲全體勞動羣衆和被剝削羣衆的教師，指導者和領袖，指示並且領導他們來建設（不要資產階級，而且反對資產階級）自己的社會生活。』無產階級專政，是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所必需的；可是它已經不同於一般國家的內容了，它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因爲它是代表極大多數民衆和勞動羣衆的利益的。『在歷史上，無產階級專政，第一次給民衆和大多數人以民主制；同時，它又必須壓迫少數人——剝削者。由於人類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由於階級分化現象的消滅，國家也要跟着消滅下去，失其作用。』在這部書里面，列寧又研究到從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共產主義社會的過程，說明國家消滅的經濟基礎；同時，他又給將來共產主義社會裏面最重要的特徵及其發展所經過的兩個階段（低段——社會主義；高段——共

產主義)，作了一種非常寶貴的分析。

三 十月革命的到來

當時，列寧雖因客觀的原因而不得不避居於遠離工人階級直接鬥爭舞台的芬蘭，可是他對於革命的行程，却是十分留意的，他細心地研究着羣衆的情緒，他精密地觀察着新的革命浪潮向上高漲的徵兆。

當科尼洛夫 (Kornilov) 反革命暴動被鎮壓了之後，當黨在「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蘇維埃」和「莫斯科工人代表蘇維埃」裏面獲得大多數以後，列寧便向黨提出了直接準備和組織武裝暴動的任務。「布爾塞維克應該奪取政權」——這就是列寧給黨「中央委員會」，「彼得格勒委員會」，「莫斯科委員會」那封信的標題（公曆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即俄曆九月十二日至十四日）。

從此以後，列寧在擁護武裝暴動的煽動中，消耗了極大的精力，他的苦心孤

諂，堅忍不拔，隨機應變，因勢制宜的精神，真是誰也不能跟他一比的。

九月二十九日，列寧堅決地要求立刻奪取政權，痛斥了任何要求延期暴動的情緒。

十月初，列寧寫着：

「延遲，就是罪惡。」

到十月八日那一天，列寧又寫着：「要立刻暴動！」

同時，他又強調着說：

「延遲，實際上就等於死亡。」

爲要愈加接近革命事件的中心（革命的彼得格勒），列寧就遷居到維柏爾格城（公曆九月末）；隨即祕密地移居彼得格勒的近郊（十月初）。十月十日至十六日，在祕密狀態中舉行了一次「中央會議」（曾吸收了積極份子去參加了第二天的會議），在那次「中央會議」上，列寧作了一個報告，通過了一個列寧所提出關於實現武裝

暴動的決議。在中央委員會中，贊成這個決議的有十人，反對者有兩人（季諾維埃夫和加美涅夫）。在十月十日那一天的會議上。成立了一個「政治局」，擔任指揮暴動的工作，列寧被推為「政治局」委員之一。當時，列寧就再三堅持馬上組織武裝暴動的意見，無情地痛斥了加美涅夫和季諾維埃夫兩人的機會主義的立場，要求把這兩個「工賊」開除出黨（加美涅夫和季諾維埃夫曾在黨外的報紙上公開發表暴動並反對中央決議的意見）。十月二十四日，列寧召集黨內領導工作的各同志（他經常都是跟他們保持着最密切的聯系的），來到他自己家里，討論各種關於暴動的問題，說明京城內面的情形，並且給他們以指示。同時，列寧又給中央各委員寫了一封信，要求他們立即實行武裝暴動：

『我以全副精神忠告各同志：現在，一切都已危急萬分，有如千鈞一髮，眼前的問題已經不是會議和代表大會（就算蘇維埃代表大會也好）所能解決的了。眼前的問題，要由人民，羣衆，武裝羣衆的鬥爭來解決，也只有由他們來解決……。不能

等待了。無論如何，今天晚上，今天夜里，必須把政府人員劫持起來，必須解除軍官團等等的武裝（如果他們反抗的話，就得把他們打敗下去）。不能等待了！！千鈞一髮哩！！政府在動搖了。無論如何，我們總是要結果它那條狗命的！！」

經過幾個鐘頭以後，列寧就離開了自己的祕密藏身的地方，改換了服裝，一溜煙似的跑到「斯木爾大學」里去，以便在那邊直接領導武裝暴動。實際進行暴動的這個任務，是由「革命軍事委員會」擔任的。在十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這個緊急關頭的兩天，以及此後消滅克倫斯基進攻彼得格勒行動的時候，列寧不僅是在政治上指導了「革命軍委會」的工作，而且曾經實際地指導它來規定並實現軍事行動的實際計劃和辦法。

十月二十五日，在俄國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日，列寧在「彼得格勒蘇維埃」裏面作了一個演說，這是他從「七月事件」以來公開向彼得格勒工人說話的第一次。次日，「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根據列寧的報告，通過了幾個含有歷史

意義的法令：「和平令」和「土地令」等等。代表大會組織了工農政府——「人民委員會」並推列寧為該委員會主席。列寧任這個職位多年，一直到他逝世為止。

四 革命勝利初期的黨和農民問題

在「十月暴動」以後的幾天內，一方面，列寧和黨必須十分地努力組織蘇維埃的政權，鎮壓「臨時政府派」反革命的行動；他方面，在黨的中央委員會裏面又發生了嚴重的危機：加美涅夫，季諾維埃夫，里科夫以及其他幾位同志，堅決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主張跟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建立聯合政府；而列寧和他所領導的中央委員會，則竭力反對在政權上表示任何的讓步；結果，加美涅夫，季諾維埃夫和里科夫等人，在十一月四日辭退了黨的中央委員會的和人民委員會的各委員的職務。列寧在他那篇「告全體黨員和全體勞動者」的宣言上面，痛斥了上述各同志這種臨陣脫逃的行爲。當時，黨員和工人階級都是堅決地幫助黨的中央委員會方面

的。

列寧認爲由無產階級來幫助農民，含有很大的意義。因此，在「十月暴動」時代，他在許多篇論文中，以及在歷次農民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都曾經充分地注意到向農民解釋黨的立場。列寧向農民解釋着說：

「在僱傭工人和勞動者以及被剝削農民的利益之間，是沒有什麼根本分歧的，社會主義完全可以滿足兩方面的利益。而且也只有社會主義，才可以滿足他們的利益。」

正因爲當時一部分農民還是跟着社會革命黨人跑，所以列寧提議吸收幾個左派社會革命黨代表，加入到蘇維埃政府裏面來。同時，列寧又領導着蘇維埃政府頒佈了涉及新的蘇維埃制度的各項法令（例如關於「廢除等級制」的命令，關於「銀行收歸國有」的命令，關於「工人監督生產——這是把各工廠收歸國有的第一步——的命令」，關於「承認芬蘭及烏克蘭自決權」的命令等等）。

五 憲法會議的始末

在十月革命成功後第二日，蘇維埃政權便在列寧的領導之下頒佈了許多於勞動大眾有益的法令，這已在上節說過了，但在那時，還仍然存在着不少的反對派的謬見和偏見，因此列寧便竭力主張中央集權，以建立無產階級的獨裁制。

一九一八年一月三日，憲法會議開幕了。這個會議，確定了蘇維埃共和國立國的基本原則。大會並通過了列寧所起草的「勞動者和被搾取民衆的權利宣言」，大意如下：

「我們現在宣佈俄羅斯爲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共和國。凡中央和地方的全部政權，都歸屬於蘇維埃。」

「不論哪一個政權機關里面，都不允許搾取者有立足的餘地。」

「勞動者和被搾取民衆的權利宣言」中，又說明了蘇維埃政權的基本任務：

「蘇維埃政權的基本任務，是消滅人對人的一切榨取，完全剷除社會階級的劃分，無情地鎮壓榨取者，確立社會主義的社會組織和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

大會上把這些勞働階級的利益列舉出來，請到會的代表承認。然而這個會議是依據舊時的代表名單召集的，因而他們已經不能代表或反映羣衆的意見；而且到會的大多數代表，都是孟塞維克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他們向列寧進攻，說列寧的行動無非是攘奪政。雖經列寧多方面的辯解，而「憲法會議」的大多數代表始終不肯承認蘇維埃政權。且進而跟無產階級專政取極端對立的態度。當這一態度被完全發覺後，蘇維埃政權便根據列寧的意見，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九日，（即俄曆一月六日）勒令解散了這個不中用的「憲法會議」。

第八章 爲布列斯特和約而鬥爭的時代

一 給國家以和平與休養

在二十世紀的開頭，列寧就在他的一部小冊子「幹什麼？」What Is to Be Done?——原譯「什麼是要幹的」——編者。）里面寫着：

「歷史，在現在，已經使我們面向着一個當前的任務——較任何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所面向着的一切當前的任務更革命的任務。這個任務的完成，以及不但歐洲的，而且連（或許可以這麼說）亞洲這個最強大的反動營壘的破壞，使俄國的無產階級站到了國際的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前衛的地位。」

（「幹什麼」第三十面）

這個預言，終於在俄國實現了。實際上，俄國的無產階級是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之中擔任為國際無產階級的前衛了，是在「十月革命」之中決定地擔任為國際無產階級的前衛了。

這一任務的性質之理解，以及完成這一任務的方法之發見，在列寧的心目中是十分瞭然的。領導世界革命，搏擊各帝國主義敵人的鎖鍊，建立俄國的新的制度——這些是千百種的任務中同時發生的工作，如今是落在布爾塞維克黨和列寧領導之下的俄國無產階級的肩上了。為着從事於這個任務之下各方面的工作，列寧個人更運用着他自己的思想和意志的一切力量，擔任着蘇維埃政府的領導者，擔任着共產黨的領導者，擔任着「共產國際」的領導者，從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三年的緊急年頭起，一直到逝世為止。

列寧在這一時期中的工作，是沒法在任何簡略的傳記里面寫得完全的。他的工作範圍，涉及下述的全部領域：世界政治，國內戰爭，對各帝國主義的關係，建立

新的蘇維埃民主制度，建設那向着社會主義前進的新經濟制度，對農民的關係，共產黨，「新共產國際」，以及直接參加並領導世界各國的勞働運動。

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乃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開端——最初的階段。

然而世界革命的發展，顯然是比列寧和布爾塞維克黨掀起「十月革命」時所希望的更悠長，也更複雜了。當初，他們會希望着革命在幾個月之間快快地傳播到歐洲的主要各國。同時，主要的爲着保障並鞏固這初生的蘇維埃政權，他們更不得不爭取對外的和平。

十月革命成功後的第二天，列寧領導着「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就向着參戰各國及其國民建議，立即實行和平談判。這個主張，是列寧的提議，同時也是他的一貫的革命的見解。以前，我們不是說過：列寧是主張「變國際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階級鬥爭」的嗎？而現在呢，「十月革命」既然已經達到勝利的階段，那麼，對於尚未結束的帝國主義大戰，難道還不應該宣告脫離嗎？

在這個時候，俄國的黨和蘇維埃政府的當前的中心問題，就只有這麼一個，就是：「打仗呢？還是講和？」或者更切實一點，那就是提出了這個危迫的問題：「怎樣脫離帝國主義戰爭？」

天才的策略家列寧，當時就研究了而且解決了這個「或戰或和」的問題。他認為那時蘇維埃政權還剛建立起來，正式的軍備當然是談不到；單是一些赤衛隊和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武裝工人隊伍，也是沒有多少勝利的把握，而主要的一點是：赤衛隊已經消失了不少的戰鬥力了，對於戰爭的生活也已經厭惡，甚至普遍地發生着一種危險的現象：「逃兵」。

列寧又認為不但是軍事上承認赤衛隊戰鬥力的消失，而且在政治和經濟上，蘇維埃政權也還沒有鞏固起來。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以及沙皇制度遺留下來的政府機關的技術人員，產業界，銀行界的僱員等等，正利用着各種各樣的方式（例如蔑視法令，實行怠工，破壞業規，組織暴動等），企圖摧毀蘇維埃政權。

在這樣的情勢之下，他的結論無疑的是主張立即開始對外和平談判，以脫離帝國主義戰爭。

但在那時，英法等帝國主義對於這個建議，表示了拒絕的態度。蘇維埃共和國便決定單獨對德奧議和。

當時德國向蘇維埃共和國竟提出一個嚴酷萬分的割地賠款的和約。這個和約，苛刻誠然是苛刻的，痛心誠然是痛心的，然而列寧主張忍痛接受它。許多同志，都禁不住目瞪口呆，有的人疑他發瘋，有的人護他無恥。但列寧仍然堅決地主張接受，這個接受，是含有積極意義的。他認為只有在支付了這個代價之後，全國才能夠獲得「休養」，積聚力量，保衛政權，充實軍備，鞏固國防。

列寧說：

「倘果真進行所謂「革命戰爭」的話，那麼蘇維埃共和國必然會陷於滅亡。」
論到這個和約的時候，他又強調地說：

「人說，這個和平條約是滅亡條約，我更說，這是加倍的滅亡條約；人說，這個和平條約是不名譽的條約，我更說，這是加倍的不名譽的條約。」

但是列寧之所以忍痛接受，是因為他估計到：這個和約，倘被拒絕接受，則一方面，後來的條約，恐怕就更更亡國，更更不名譽了；至於協約國那一方面呢，雖可以對於這一舉動表示好感，但也決不能給蘇維埃共和國以實際的援助。因此，他堅決主張馬上簽訂這個和約。

最初擁護這個主張的，除列寧自己以外，就只有斯太林和季維諾夫等少數同志。

一一 革命戰爭派和托洛茨基的罪惡

當時反對跟德國簽訂和約的，竟佔着多數。中央委員會大多數委員和大多數下層黨員，都表示反對或懷疑。尤其是布哈林，拉狄克等幾個中央委員，反對得非常

猛烈。他們認爲簽訂這個和約是一種屈辱的和平。因此，他們號召着所謂「革命戰爭」，所謂「革命的，光榮的犧牲」，代替國內迫切需要着的暫時的「休養」。他們簡直是忘掉了自己的軍力的不夠應付和政權的尙未鞏固；他們更無視「社會主義建設的準備工作」。

托洛茨基提出了折衷主義的口號：「既不戰，也不和。」他認爲和約用不着簽訂，反正德國是不會來進攻蘇維埃共和國的。然而狡猾取巧的折衷主義，到底是經受不起事實的打擊的。後來的事實證明了德國的軍隊是會進攻的，是要求着蘇維埃共和國簽訂和約的。試問：倘若不簽訂和平條約，你怎樣對付德國呢？你的實力在那里呢，除了討厭戰爭而且失掉戰鬥力的軍隊以外？你更將用什麼方法去維持並強化新生的政權呢？

持着錯誤見解的托洛茨基，在一九一七年間，竟被蘇維埃政府派赴布列斯特。列托夫斯克 (Brest-Litovsk) 去跟德國進行和平談判了。他去是去了，却仍拒絕簽

約。次年二月初，當托洛茨基接到了列寧和斯大林代表蘇維埃政府拍發的「速即簽約」的電報的時候，也還是擅自拒簽和約。

三 和約的簽訂

被托洛茨基認為不會來向蘇維埃俄羅斯進攻的德國的大軍，在拒簽和約的當兒，終於又來加緊進攻了。

列寧的估量一點也沒有錯：厭惡戰爭的俄國軍隊，看到德軍進犯，便從每一道防線上，紛紛地倒退下來，甚至於一點兒的抵抗力量也沒有表現出來。一剎時，德國便已經進抵蘇維埃共和國的腹地：波蘭、立陶宛、芬蘭、和白俄羅斯的一部分，都被佔據去了。

蘇維埃政府看見形勢危迫，便重向德國要求和議。這一次可不同了，這真如列寧所預示的「加倍的滅亡」和「加倍的不名譽」了。不消說，條件比以前要嚴酷得

多，甚至要求撤退駐守在芬蘭和愛沙尼亞的赤衛隊，並要求恢復烏克蘭富農的「拉達黨」的政權。

到了這時，托洛茨基的罪惡，才昭實於天下。同時，布哈林等「左派」共產主義者，也還是不知悔禍，一意孤行的繼續反對簽訂和約，主張「革命戰爭」。

——要生存呢？還是要滅亡？

——要和平呢？還是要戰爭？

路子只能從兩條中選出一條。許多同志，還在暗中摸索——摸不着他們唯一應走而且必走的路子。

就在這時，列寧向「中央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辭去本人的職務。在這一威脅之下，列寧的主張，才通過中央委員會而定下了一個關於議和的決議。

然而餘波還沒有完全平靜下來。關於和平談判的問題，又在一九一八年三月間舉行的「聯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引起了猛烈的論戰了。

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列寧曾作了一個論戰爭與和平問題的報告，非常緊張而有力，聽者都爲之動容；大會終於以列寧和斯太林等的和平路線，寫下了他們的決議，回答了那些「幼稚病」患者「左派」份子布哈林，托洛茨基。

同時，大會通過了關於改變黨的名稱問題的決議：把「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改稱爲「俄國共產黨」。

我們要知道：列寧的正確路線，是在對內不正確傾向的鬥爭中鍛鍊出來的，不是風平浪靜之中流行出來的。就像在這一爲議和而鬥爭的緊張時期，列寧曾作過許多出色的論文和演說：（如「關於立刻締結單獨割地賠款條約問題的綱領」，「論革命的詞句」，「論疥癬」，「和平或戰爭」，「不幸的和約」，「沉痛而必需的教訓」，「奇聞怪事」，「中央會議的演說詞」和「聯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演說詞」），說明了議和的必要，並暴露了「革命戰爭」派主張之危險的與小資產階級的本質。

四 和約的尾聲

當列寧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一九一八年三月間舉行)里面堅持簽訂「布列斯特和約」的時候，他曾經說過：

『在目前，我們是在極端的困境里；我們的同盟者是不能衝過來給我們以援助的。國際的無產階級，現在也還不能夠就來幫助我們，然而這個日子是一定就會到來的。』

列寧的這個信念，終於由事實證明了。就在這一年的十一月間，德國的無產階級突然起事，當即推翻了「德皇制度」(Kaiserism)，撕毀了「布列斯特和約」，於是，世界大戰才宣告了最後的結束。

第九章 國內戰爭和戰時共產主義的時代

一 內戰的爆發

憑着「布列斯特和約」的簽訂，列寧預期着可以從此獲得國內的和平與休養的機會，而以組織紅軍，加緊國防，開始和平建設爲這一時期的主要任務，然而，在帝國主義的強盜和沙皇制度的餘孽尚未根絕的現在，蘇維埃共和國所要求的和平與休養，顯然是還不能馬上實現。

列寧當前的工作，就是要徹底搬掉重重的暗礁。

實際上說，帝國主義戰爭的最後一年，就已經有暗礁開始存在：西方的帝國主

義國家正竭力企圖摧毀這個年青的蘇維埃政權。大戰的結果，正給了他們發動這一行動的鼓舞。

一九一八年夏天，外國的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從此爆發了。這個時代，在歷史上叫做「內戰時代」，它包含着相當悠長的年頭：從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〇年。最初是捷克斯拉夫人在俄國境內發生了暴動。接着是一系列的外來的干涉戰爭：英、法、美、日各帝國主義者於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〇年間，在各個戰線上侵略蘇維埃統治下的俄土。英國軍隊聯合法國軍隊，進攻俄國北部，襲取諳爾曼斯克等城市，又在南部和東南部佔領了巴庫和中亞細亞一帶。「協約國」軍隊佔據了高加索各大城市，包圍了俄國南部。

除了各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而外，反革命勢力的暴動和騷擾也相繼地節節緊逼，簡直把這一時代的蘇維埃共和國陷於內外夾攻的危急情勢中了。許多城市（例如莫斯科、耶魯斯拉佛爾等）都發生了暴動。加以社會革命黨人對蘇維埃共和國領

袖份子的陰謀和暗殺行爲（例如列寧就會於一九一八年八月卅日被該黨所行刺，受了重傷，因此造成了他的早死）。

在內外情勢如此危險萬分的當兒，蘇維埃共和國之所以能夠渡過難關，不爲反革命勢力所撲滅，這全然是列寧的估計的正確和處理的適當的勞蹟。他的估計和處理的工作，除了少數在文字上發表的以外，大多數是傳達給各種會議上的——歷屆「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全國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莫斯科蘇維埃全體會議」，「職工會代表大會」，「工廠委員會代表會議」等等。關於這些，下面還要詳述一下，現在先把內亂爆發以前的現實形勢，鉤出一個簡單的輪廓。

一九一八年夏天，蘇維埃共和國的各城市發生大飢荒。列寧就號召全國工人階級，集中注意於這個救濟飢荒的問題。他主張工人立即組織「糧食收集隊」，組織「貧農委員會」，組織各種反對農村資產階級，富農和糧食投機商人的鬥爭活動。

列寧當時會這樣說：

「我們必然要發動一個偉大的「十字軍遠征」，去反對那些糧食投機商人，富翁，寄生者，搗亂派和被賄買者；去反對那些破壞國家從事於糧食的收集、運輸和分配的森嚴秩序的分子。」

差不多也是在這個時期，列寧又曾指出工人階級的任務是：

「要十分親密地跟貧農聯合，甚至跟他們完全溶化在一起；要對中農讓步，甚至跟他們妥協；要無情地壓倒一切作爲暴徒，吸血鬼和人民劫掠者的富農，同時要壓倒那些利用飢荒而大獲其利的投機商人。」

然而，當時就有人反對列寧這個主張，反對組織貧民委員會，又反對組織糧食收集隊。這些反對者，就是「左派社會革命黨」份子。他們跟布爾塞維克對立起來了。列寧就在七月四日至十日召開的「第五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席上，指導了關於救濟飢荒問題的工作以及關於反對「左派社會革命黨」傾向的鬥爭。

這時，「左派社會革命黨」黨人，突然於七月六日，在莫斯科大舉叛亂，造成

了殺掉德國駐莫斯科公使米巴哈的慘案，藉以挑撥德國對蘇的惡感和戰爭。他們更舉行了反對蘇維埃的暴動。

列寧對着這些反動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份子的叛亂和暴動的行為，自然是受到一番慘痛的教訓，但是他仍然從容地佈置對付他們的適當方法。他首先領導蘇維埃政權鎮壓了他們的叛亂，同時，又跟德國政府保持密切的，和平的關係，使德蘇兩國不致發生齟齬。這中間，德國政府曾給了蘇維埃共和國以一紙牒文，要求派遣德軍一營，常駐在莫斯科，以便在必要時保護德國公使館和僑；列寧對於這個無理的要求，却給以堅決的拒絕。在他這種和平的，英勇的周旋之中，才把德蘇關係調整起來了。

在七月至八月間，大飢荒的形勢愈形恐慌起來。捷克斯拉夫人的暴動，就是在這個時候發生的，繼起的還有不少地方的反革命的叛亂。列寧仍然從容地佈置他的革命的事業：一方面，積極地組織紅軍，實行國防工作；另一方面，廣泛地救濟飢

荒，安定人民生活。

爲了加緊這些工作，他曾經在各種工人大會和羣衆大會上舉行公開演講，甚至一日之間，連講四次，號召工人羣衆去跟反革命勢力鬥爭。曾經有許多次，他的同志們規勸着他說：

『有人在暗算你，你還是避避人家的眼睛吧！』

他還是好像沒有聽見這種警告似的，不以個人的安全爲慮，他只怕革命的不能完成。他終於還是繼續作公開的宣傳，作英勇的鬥爭。

當時，「社會革命黨」已經組織起暗殺隊，活動得非常積極，也就是很可怖。一九一八年八月三日那天，列寧從「米里松工廠」（舊名稱）工人大會上演講完了後，剛走出廠門，突然有一個女子向他行刺，而且刺傷了。這個女子，就是「社會革命黨」女黨員——卡布蘭。

這次受傷的程度，是十分厲害的，倘若在一個常人身上受這樣的傷，或許是會

危及性命的；幸而列寧是個體強力壯，有如銅牆鐵壁一樣的人，雖然受傷得厲害，但是經過半個多月的醫治和調養，終於又恢復了健康的常態了。

在列寧被刺之前，就是在同年的夏天，布爾塞維克要人奧魯達斯，已經在彼得格勒被人（當然也是「社會革命黨」黨人）刺殺；列寧的被刺，可說是「社會革命黨」黨人第二次的「勞蹟」，而其結果却是「勞而無功」吧了。反動的「社會革命黨」不肯罷休，又在同一日，達到了刺死彼得格勒非常委員會主席烏里茨基的目的。

這一年的德國的政治危機和革命運動，已經有了顯著的發展。列寧在十月三日舉行的「全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上，以後又在各種工人大會上，積極主張「集中全力，幫助德國工人」，同時更提出「積儲糧食」，「將紅軍增至三百萬人」的具體辦法。

列寧說：

「我們一定要立即準備。我們要向全世界證明：當問題已經不僅是關於俄國一國工人革命，而且是關於國際工人革命的時候，俄國工人是能夠努力工作，更是不惜拚死鬥爭和犧牲性命的。」

爲了進一步說明他對於國際革命運動的見解，列寧就在同時寫成了一部題名爲「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Renegade Kautsky)的重要著作，痛擊了考茨基和萬德維爾等國際孟塞維主義的英雄的那種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而擁護資產階級民主制的行動，揭發出他們對於專政和民主的相互關係的問題——國家、蘇維埃、國際主義、國際無產階級革命及其他個別的鬥爭問題——的曲解。

列寧又在「給美國工人的一封信」(Letter to the American Workers) 里面，特別指陳了布爾塞維克的政策，擊破了國際的機會主義，並切實表示了他對於國際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信心。

一九一八年，列寧發起組織了各種協助布爾塞維克的團體。他又提到了利用合作社機關，改善蘇維埃機關以及由職工會密切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和生產組織事業之必要。同時，他更指示了黨對中農問題所抱的政策。

列寧所主持的「共產國際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是在一九一九年三月三日開幕的。一連開了五天的大會，通過了列寧所提出的「關於資產階級民主制與無產階級獨裁制的綱領」以及他所作的關於這一問題的一個報告。此後一直到死，他都是積極地參加着「共產國際」的全部工作的。

「共產國際第一次大會」散會以後，列寧曾到彼得格勒作了幾天的旅行，同時作了多次的演講。

二 革命對反革命的鬥爭

這里又要敘到國內戰爭的情形了。

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捷克斯拉夫人暴動的事件；這次暴動的結果如何呢，一句話說，就是沒有結果。因為不久，蘇維埃政府就把它鎮壓下去了。

但是這次事件的幕後人各帝國主義者是不肯鬆手的，它是存心要消滅他的眼中釘——蘇維埃政府。因此，過了幾個月之後，各帝國主義對蘇維埃政權的進攻，就變本加厲。

在一九一九年的春天，英法等帝國主義者，就利用了帝制時代留下的餘孽高察克(Kolchak)大將的軍力去進攻蘇維埃政權。英勇的紅軍，加上了英勇的抗戰，阻止了高察克軍隊的進襲。

到了四月末，英勇的紅軍，在佛朗才將軍的指揮之下實行反攻，給了高察克軍隊以重大威脅和損傷，使它開始陷於最後的潰退。於是，蘇維埃政權，才把失去了的全部區域收服過來了。

這一時期的列寧，便進行着指導蘇維埃政權對反革命的高察克部隊作全面鬥爭

的工作。正是在高察克軍隊進攻的當兒，列寧出席於三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在莫斯科舉行的「聯共第八次代表大會」。他除了作許多關於基本問題的報告以外，更作了關於紅軍現勢問題的演講。在大會上，關於建設紅軍的方法問題，尤其關於紅軍中利用專門家的問題，曾引起了劇烈的論爭。經過了很長時期的爭持以後，列寧才能夠使「起草委員會」所提出的草案得到一致的通過。

此後，列寧所注意的問題，除了加緊於組織武裝國防（紅軍的給養和接濟等）而外，更關心於克服糧食和燃料的困難和從事疫癘的防治等等嚴重的戰時問題。

高察克軍隊於一九一九年秋天被紅軍擊退以後，英法等帝國主義者的進攻的野心，還是沒有死去。他又企圖假手於鄧尼金（Denikin）將軍了。不幸，這一次紅軍的一部分戰略是托洛茨基擬定的，而他的戰略是錯誤的，因此，使鄧尼金軍隊得以長驅直入，幾乎釀成敵軍逼近莫斯科的危局。蘇維埃政權立即把托洛茨基免職，任命斯太林指揮軍事。斯太林就任之初，即一變托洛茨基的作戰方針，同時又獲得了

伏羅希洛夫 (Voroshilov) 等將軍的協力合作，所以不久，就把鄧尼金部隊打得「潰不成軍」了。

野心未死的帝國主義者，哪里肯從此歇手？到了一九二〇年春天（四月間），第三次向蘇維埃共和國的進攻計劃，又憑着波蘭老將畢蘇茨基 (Pisutsky) 和白黨英雄佛蘭格爾 (Wrangl) 的武力來實現了。可是他們仍然落在鄧尼金和高察克所遭遇過的運命中，在紅軍的面前，潰退了下去。紅軍在列寧的擁護之下，甚至把波蘭軍隊一直反攻到離華沙僅幾哩路的地方。反攻華沙，在軍事策略的觀點上說來是值得討論的，而且必然地要接着退却的。但列寧堅決斷定這次反攻，是有其收穫的：第一，因為它給西方各帝國主義表示了蘇維埃統治的力量，並且由此阻止了它那不斷的進攻政策；第二，因為它給了歐洲勞動運動（英國工人反對干涉蘇聯的「行動委員會」即其例子）以巨大的刺激。

三 對波戰爭前後

在「對波戰爭」（紅軍對波蘭的進攻所引起的戰爭）發動以前兩個月，即一九二〇年二月間，列寧指出了工人階級的任務是：

「給國家收集並輸送大批糧食的屯積，恢復破壞了的工業，用軍事速度，軍事毅力和軍事紀律來實現這些辦法。同時，又要施行下述各種跟上述辦法有密切關聯的辦法：實現蘇維埃政權機關工人化；消滅蘇維埃政權機關里面的怠工現象和官僚主義；提高勞動生產率到最高限度；發動全國力量去恢復國民經濟到最大限度。」

當蘇維埃共和國從國內戰爭轉入經濟建設的時期，黨內又引起了關於工業管理方法的論爭。當時，列寧主張「單一管理制度」，堅決反對里科夫（Likov）湯姆斯基（Tomsky），沙普朗斯基（Shaplonsky）等所主張的「集團管理制度」。

關於這個問題，列寧的鬥爭是極其苦辛的，曾給過無數次的解說和批評；可是

反對者的影響很久不能消滅下去，一直到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五日舉行的「聯共第九次代表大會」上，才獲得了勝利的解決。

一九二〇年四月至五月，正是列寧籌備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的時期，他寫下了一部公認為名著的「左派共產主義的幼稚病」(Left-wing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這是馬克思主義戰略原理和策略原理的燦爛的發揮。在這一本書里面，列寧對西歐的「左派」共產主義者的錯誤，給了一種透澈無遺的批評；這些「左派」共產主義者否認參加資產階級與國和黃色工會的必要，不瞭解綜合公開的和祕密的鬥爭方法的必要，而在黨和階級之相互關係等等問題上，又犯着許多嚴重的錯誤。在當時的局勢之下，「左傾」是妨害革命的最大危險，因此，列寧曾經極端堅決地反對了這種傾向。

在西歐革命運動高漲到了頂點，「共產國際」影響擴大到了最大限度，紅軍在「對波戰爭」中獲得了偉大的勝利的當兒，「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七

月十九日至八月六日）舉行起來了。最初是在彼得格勒，後來是移到莫斯科續開的。列寧特別努力地參加了這次大會的工作。大會的一切重要文件——決議和綱領（「關於土地問題的決議」，「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關於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的決議」，「關於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的基本任務的綱領」等），都是列寧起草的。大會在列寧的領導之下，又糾正了「左傾」的錯誤，造成了共產國際各支部里面思想上和組織上的團結力。

自一九二〇年冬天起，內戰的時代是告終了，因為佛蘭格爾軍隊已被掃蕩淨盡，而「對波戰爭」也已經結束。列寧此後的工作，便完全集中在經濟建設問題上面。

四 勝利基礎的總結

國內戰爭和軍事共產主義的時代過去了，這個難關之所以能夠安然渡過，自然

應該是首先承認列寧的英明的領導（例如反對「左傾」的行動，實行戰時共產主義等）及其對於當前現實形勢的正確的估計。

但是，這種說法是不夠的，而必須加以補充。四年的帝國主義戰爭和三年的國內戰爭之後，全俄的人民已經變成了一「飢寒交迫的奴隸」；紅軍以少數的軍力，打退向俄國北部侵入的英帝國主義；打退向南俄窩台薩侵入的英法聯軍；打退彼得格勒近郊的猶敦尼基（Yudnich）；打退西比利亞的高察克；打退烏克蘭的柏德羅拉（Petlura），打退南方的鄧尼金，——一切這些被西歐各帝國主義者武裝了的而且指揮了的反革命軍隊的力量，自然是百倍於紅軍的力量，結果還是敵不過紅軍，第二個原因，就是軍民一致的抗戰基礎的鞏固，而尤其是由於以全國人民的羣衆性的反抗爲動員基礎。所以參加抗戰實踐的，不但有紅軍的主力，而且還有城市產業工人，還有白黨所侵佔的區域內的農民，在這些農民看來，白黨的捲土重來，簡直就等於土地的喪失，因此，他們非出力抵抗，把反革命軍隊驅逐出境不可。

再其次，西歐帝國主義國家參加戰爭的士兵的革命化，也是使蘇維埃政權獲勝的基礎之一。英法帝國主義的軍隊，拒絕了參加這種無恥的侵略戰爭；最顯著的，是法國黑海艦隊的反叛，北俄英國軍隊的動搖，就使它再沒有派遣較多的軍隊作戰。

還有一層，就是在這些帝國主義唆使下的反動戰爭中，國際工人的革命意識的覺醒，和他們的積極的鬥爭，間接地幫助了紅軍的勝利。英國和法國的革命工人，顯然是表現了最大的助力；其他方面，如德國、捷克、丹麥等國的工人，也會利用拒絕給波蘭和反動白黨裝運軍火的方法，援助了勞働人民的蘇維埃共和國。要是沒有這些基礎，固然不能爭取蘇維埃政權和紅軍最後的勝利；可是，要是沒有列寧對於蘇維埃政權和紅軍的正確領導，那麼，這種最後的勝利又何嘗能夠這樣迅速地取得呢？

第十章 新經濟政策時代

一 新經濟政策的頒佈

現在，一個完全新的局面在俄國蘇維埃共和國裏面是必然要產生的了。由於帝國主義的「干涉戰爭」，和「國內戰爭」殘餘勢力的肅清，（一九二〇年末至一九二一年初），列寧在「十月革命」爆發以來所計劃的和平建設，到這時才真的開始實現了。

在過去的日子里，外國的封鎖和內戰不但曾經阻止了向社會主義經濟的早日進行，而且曾經逼着列寧和蘇維埃政權採取過「戰時共產主義」的制度——即糧食的

徵發 (requisitioning) 和分派 (rationing) —— 而沒有產生過社會主義的生產組織。可是到了這一時期，軍事共產主義是必然地宣告終止了。

不幸，正待轉變的當兒，黨內突然發生了政派的鬥爭。起先（一九二〇年秋天和初冬）是關於上層份子與下層份子對立問題的鬥爭，後來又有關於職工會的任務問題的鬥爭。列寧在一方面對反對派鬥爭，一方面又竭力防止這個鬥爭的擴大；因為他認為當時疲敝了的國力應該早一些設法給以恢復的機會，而戰後的黨力更應該處處節省下來，從事於日益緊迫的建設事業。

然而他的努力終於不能得到他預期的結果，托洛茨基且提出了職工會國家化的口號，他和季諾維埃夫一派，反對列寧的路線很猛烈。列寧得了斯大林、季維諾夫等中央委員的擁護，竭力地否定了在職工會方面繼續實行「戰時共產主義」的方针，並規定了它在和平經濟建設的條件下的新任務。這時，列寧病了，可是他毅然扶病作了許多的論文和演講，企圖糾正托洛茨基、季諾維埃夫、布哈林一流人物的

誤謬的見解。

由於反對派份子堅持反對列寧路線的結果，事變又釀成了。這就是一九二一年春天發生的「克朗什塔暴動」(Kronstadt revolt) 和「達姆波夫暴動」(Tambov revolt)。

依列寧的倡導，「新經濟政策」(Nep) 便在三月間開「聯共第十次代表大會」的時候決定採用了。這個政策，不但是當時必要的經濟政策，同時是整個的基本國策。它的方法和任務，據列寧的指示，具有下述的各項：採用「農業稅制」代替「糧食徵派制」，以促進農民經濟的向上發展；恢復小規模私人商業的有限度的自由，以建立並發展城市和農村的經濟聯系；但經濟的高峯 (economic height)，對外貿易的獨佔、銀行、運輸和大規模工業，則仍由工人國家自己經營。

在這種方法和任務之下，蘇維埃經濟走向社會主義的生產組織在比例上日益增進而被統制的發展，便可以有計劃地實行起來。

在當時，以及在後來，一切愚蒙的資本家和改良派都狂喊着新經濟政策是「資本主義的恢復」，是「社會主義的放棄」。當然，當時列寧就會經指出，這些批評是不對的，實際上倒是相反，這個政策正是意識地，有計劃地向社會主義進展的步驟。

不理解新經濟政策的這種本質的季諾維埃夫，說新經濟政策「大 是表示退却」。這個說法也已經被斯大林在他所寫的「列寧主義的諸問題」(Problems of Leninism，本文是「列寧主義」一書之上半部)裏面批評着說：「實際上，新經濟政策，只在初時會有過退却的表示；可是它早已估計到：在退却的過程中，把力量的對比改變過來而加以進攻。」

在「克朗什塔暴動」被撲滅和「聯共第十次代表大會」閉幕之後，列寧便集中精神，確定而且解釋新經濟政策的各方面，發揮了新政策的各種基本原則和糧食稅則的問題。

一九二一年六月至七月，「共產國際第三次世界代表大會」仍在列寧領導之下召集了，列寧在大會上作了一篇關於新經濟政策的報告並給與了德國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以寶貴的指示。

在一九二一年下季和一九二二年開初，列寧又在許多次會議上，著作上，充分地發揮了新經濟政策的實質以及它跟戰時共產主義之不同點。

從一九二一年年底起，列寧有了重病的徵象，雖然做不動工作，但還是間歇地工作着。

二 對資本主義的退却已經終止

到了 一九二二年三月六日，他仍然出席於「五金工人代表大會黨團會議」上，開始指明新經濟政策所規定的「退却」步驟，是已經停止了。這一個重要的指示，又在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日他所主席的「聯共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那時列寧

病還沒有好) 加強地提出了。大會上，他作了關於中央工作和新經濟政策第一年度
的總結報告，說：

『現在，我們決定，認為我們的退却已經終止了。』

大會又根據了列寧的報告，作了一個決議，裏面說：

『大會確切地指出：最近一年來所採取的全部辦法 都包含於黨所認為必要的
那些對私有資本主義的各種讓步中；我們認為這種意義上的讓步，已經是到了終止
的時候了。』

新經濟政策，從這時起，可以說是已經有了「轉變」，但也可以說是有了進展，
因為蘇維埃政權在列寧領導之下所採取的新經濟政策，它在最初期對於資本主義所
表示的退却，本來是戰略上的退却，而現在的不再退却，正是證明了它具有着本質
上的進攻性。

三 新建設的必要條件已經具備

列寧的病雖則一天一天的沉重了，可是他還是給黨和「共產國際」以許多的指令，爲「真理報」口述了許多的論文，並且擔任了其他的各種工作。到五月間，病勢惡化到了極頂，差不多已經使他沒有工作的精力了，可是到了秋天，他却又回到「人民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里面去工作了。後來，才因爲體力不支，沒法繼續這種工作了。即使在這樣病勢沉重的時期，他在十月和十一月間又去出席於「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里面，並且作了一個報告和一次演講。

列寧最後的一次演講，是十一月二十日舉行「莫斯科蘇維埃全體會議」席上的一篇有名的演講，裏面提出了一個新的口號：

「變新經濟政策的俄羅斯爲社會主義的俄羅斯！」

到了十二月間，列寧已經病得半身不遂了，但他仍然不忘他對於黨和國家所交給他的責任，因而口述了許多指示出今後黨的工作方面的政治訓令。

列寧最後的一篇論文「合作論」(On Co-operation)，也就是在這樣的重病期內口述出來的，裏面說：

「我們已經具備着一切的必要條件……去建設一個澈底地社會化的社會了……當然，我們還不會把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建設成功，可是我們確然已經具備着把社會主義社會建設成功的一切必要條件了。」

第十一章 列寧之死及其不死之處

一 晚年的病和死

誰如果見到過列寧的一天，就好比見到了他的一生的模樣，因為他的生活是艱苦卓絕，始終如一的。他從沒有停止過一天的生活和工作，即使到了他的晚年，也差不多還是帶着病而工作的。他的病，是跟他的敵人的毒手有關係的，原來，敵人（社會革命黨人等）曾經對他施行許多次的暗殺行爲，有時雖沒有使他受傷，有時却是受傷後又復好轉的，但是這個病根，却已經像樹根深入泥土中一樣，在他的身上始終不曾根治過。

從遠一點說，當「憲法會議」在列寧的建議之下被勒令解散之前五六天，（即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四日）暗殺家對列寧施行過第一次的暗殺；所幸，一枝毒箭雖從敵人手中射發了出來，却只中了列寧所坐的汽車，並沒有傷及他的毫髮。

後來，在同年七八月間，當列寧領導了蘇維埃政權鎮壓了「左派革命黨」的叛亂之後，到了八月三十日那天，列寧剛從「米黑松工廠」工人大會上演講後，走出該廠時，他忽又遭到了卡布蘭（反動的「社會革命黨」女同志）的行刺。當時列寧就受傷——而且十分嚴重，幾有危及生命之勢。經半個多月的治療之後，算是恢復健康了，但實際上，這次受傷，與他的早死，具有極顯著的關聯。

一九一九年年底，列寧又碰着一件足以使他發生生命危險的事變：當十二月二十四日晚，列寧乘着汽車，駛過莫斯科城郊的時候，他突然被武裝土匪所襲擊，幸而他們雖然用手槍向列寧威脅，但並未放射，結果只劫去了那輛汽車。

到了一九二〇年冬天，他發了一次病。不久，又恢復過來了。

一九二一年末和一九二二年初，列寧重病的徵候，才逐漸地顯露出來，他因此不能不隨着病勢的起伏而間斷他的工作。

同年三四月間，列寧的病——腦血凝結症，繼續地向着沉重的形勢發展着。看看五月已經到了，而他的病勢却日益險惡，到五月二十六日，突然發生了第一次的「腦充血」。直到這一年的夏天，他的病才似乎稍有起色；到秋天，他又開始照常地工作着了，可是他沒有經常工作的體力了，過不了很久，不得已只好停止了他的工作。十一月間，病勢轉劇。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列寧又發生了第二次的「腦充血」。他的右手和右腳都入於麻痺狀態了，深感到了動作的不便。

一九二三年三月九日，列寧受了病魔的更嚴重的襲擊，發生了第三次的「腦充血」，列寧的身體似乎已經無可藥救了，連說話的能力也失掉了。他遵照醫生和親友的叮囑，移居到離莫斯科三十俄里遠的高爾克療養院去治療。他備嘗了病中的痛

楚。後來，大家都以為列寧快有痊愈的希望了。哪里料到這只是迴光返照而已。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列寧的病突然加劇，發生了又一次的「腦充血」。

——列寧死了！

列寧是為着全世界勞動大眾而生活的，所以他的逝世，正是世界大眾的無可補償的悲痛，而當時蘇聯的大眾，處處為他痛哭失聲；悲痛之餘，他們更積極地以二十萬工人入黨的方式，回答了他的逝世；又以悲壯、盛大的遊行，照耀了他的葬式。列寧是沒有死！

二 精神不死

實際上，列寧確然有他的不死之處。

首先是因為列寧的偉大精神中活躍着一顆鬥爭的赤心。據列寧的研究者梭林說來：列寧是一個偉人，他那種爽直和敏捷的精神，他那種對黨員、工人、農民所抱

的眞正同志的態度，在社會上引起了令人驚異而敬畏的印象。他那種再接再厲的毅力，他那種不屈不撓的勇氣，他那種從容愉快的性情，把他周圍的人都同化起來了。甚至他的政敵，也不得不承認列寧那種謙恭和藹的特性：絕對沒有絲毫傲慢誇大的氣味。無論在僑居國外時也好，無論在高居政位（一國元首）時也好，他所過的生活，都是一樣地簡樸，一樣地平凡。第二，他的精神中更放射着一顆鬥爭的決心。關於這一點，他也已經指明：列寧不僅擅有一副天縱的、英明的才智，而且還富有一種非常強健的工作能力，工作上的明確性，再加上他那種鐵一般堅忍不拔的、絕不動搖的意志。他在堅持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和執行黨的路線時所持的堅決的精神，正如聳立半空的懸崖，誰也不敢望其背脊。他那種思想上毫不妥協的決心，引起了各種機會主義者，改良主義者，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左傾」者和「右傾」者方面的極端的嫉恨：因為這些都遭受過列寧嚴重的批評和打擊；可是這一種嫉恨，正是列寧的光榮。在擁護馬克思主義，擁護黨，擁護革命，擁護工人階級勝利的這

個鬥爭中，列寧是毫不留情的，一直走到鬥爭的盡頭——破裂，「分裂」，開除一切仇視無產階級觀點的個人或大小派別的黨籍。資產階級把列寧看作他們最兇惡的仇敵，那完全是必然的事。

接着，他還指出鬥爭的信心——主要的是爲着新興階級而鬥爭的信心和爲着它的最後勝利而鬥爭的信心——也同樣地是光輝的列寧精神的一種表現。列寧擅有一種驚人的認識羣衆的特性，擅有一種正確切實地嗅得並斷定工農情緒的天才。他能夠在極端繁複的環境里面，迅速而且正確地規定出行動的方針，替工人階級提出明確的口號。他那種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堅實基礎而對工人階級力量所抱的信心，確然是不可限量的。無論在什麼時候，甚至在最消沉的反動時代，他都絲毫沒有懷疑過革命必然到來和無產階級必然勝利的前途。爲工人階級解放而鬥爭，這便是列寧畢生的事業。

三 偉大的遺教

跟馬克思沒有留下一冊馬克思主義的手冊或教程一樣，列寧也並沒有留下列寧主義的手冊或教程；他們都只是把他們的原則表現在具體的人類實踐和理論的領域中的某些緊急問題的直接把握的過程里面。

列寧的遺教，跟馬克思的遺教一樣，是無法用任何固定的公式來解說的。這不僅是因為他的遺教的豐富性和多方面性及其生命容易在這樣的總結里面消失；而且是因為這樣的公式處理法跟他的遺教的辯證法性質是完全直接相反的。而辯證法的解決方法，是要實行分析每一具體的現實形勢自身的顯著的特質和關係，然後取得對於特殊具體表現中的一般的社會發展法則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特殊行動任務的理解。

除了從這唯一的門徑去探索馬克思主義或列寧主義的真髓以外，什麼手冊或教

程都是不夠的，甚至是不妥的。

因此，在這一節的開端，先得鄭重提出上述的一個警告來，使讀者相信以下所舉各點，都只能算是偉大的列寧遺教的主要概念的一部分，並不敢用以代替遺教的全部。

列寧在世時，曾經幾次三番強調地說，共產主義不能被看成教條式的和教義式的一種特殊形象，也不能被看成可以從教科書上學得來的『現成的結論』（*ready-made conclusion*），却只能被認做過去各個時代（特別包括着資本主義社會）的切實研究的基礎上面所已經成就了的全部人類科學和文化的產物。因此，他更在許多次會議上提出警告，說：

『如果一個共產主義者不會意識地探究過人類知識的全部遺產，那麼，共產主義便成爲了一個空洞的名詞，一個純粹的浮表，而這個共產主義者也只算是一個「牛皮大王」了。』

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在新階段上發展而成的列寧主義也正是同樣的）的看法，就是「辯證法唯物論」的看法。關於這層，本書開端一篇「列寧的時代」中已經略略說到過一點。列寧是一個辯證法唯物論者。他的思想和行動，無論在每一個問題或每一個生活關係上面，在他所抱的目的上面，或是在他完成目的的方法上面，都是被這種基本認識——即關於生存和生活的，關於人類的任務的，關於歷史發展法則的，關於階級社會的條件下前進時必要的形態和方法的以及將來在團結人類去控制人類運命時所創造的世界制度的各種認識——所規定的。他的學生的成就，可以說就是辯證法唯物論的正確性和實際性之一種有力的明證。

據恩格斯的指示，「辯證法唯物論」，是必須配合着每一個時代，每一次科學和實際知識的發展而經常地更新的。關於這一任務，列寧也是這樣地告訴我們的，尤其在他那部名著「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里面指示得很明白。在這里，他提供了他對於「辯證法唯物論」跟二十世紀新科學問題的關係上面的認識，並且打擊了在許多

布爾喬亞科學家保護之下不斷蔓延着的各種反動的，唯心的，神祕宗教的 (mystical-religious) 傾向。

列寧更進一步地指出：陳舊的，消極的，「機械的唯物論」(mechanical materialism)——這正是舊科學家的基礎——是不能瞭解現實之綜合性質的，因此，在科學知識進展的當兒，只能把他們留在混亂狀態中，向「唯心論」乞憐。惟獨「唯物的辯證法」(materialist dialectic) 才能夠指示前面的道路。

列寧曾經說過：

「馬克思主義里面具有決定性的事情 (decisive thing)，就是它的「革命的辯證法」。』
(參看列寧著「關於我們的革命」Concerning our Revolution.)

「辯證法唯物論毀滅了理論和實踐之間的舊壘。它的作為世界觀的基本特質，就是不僅僅在於發見現實的本質，而且是在於改變現實。所以說它是具有革命的特質的。這種理論和實踐的統一，這種對於一切問題的徹底辯證法的解決，在列寧自

己的全生涯中，表現得最爲有力。他確然是用了這個學說，在他的全部的生活特性和生活實踐中，指示着一條走向未來的新人類的大路。

在一定的階段上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或共產主義者的活動基礎，必然地是對於那個階段的特質，對於它的力量和衝突，以及對於由此而形成的發展路線的一種明確的分析。

就最廣泛的意義上說，馬克思早已暴露了人類社會的資本主義階段的特質。早已分析了它的運動法則，早已指明它有向着激增的資本集中和階級的分化以及大衆的貧困化和逐漸形成的危機之發展趨勢，早已提及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獨裁的必然產生，以組織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

可是當馬克思活着的時代，這個公式（即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獨裁的公式——却還必然地是留待將來（「巴黎公社」事件算是例外）實現的一個理論上的公式。他的實際任務，就是把這個「上升的資本主義」（*ascendant capitalism*）條件

之下的工人階級的力量準備起來，並且組織起來。

只有直到馬克思死後，在列寧的時代，資本主義才進入了它最後的，臨死的階段，才開始爆發了無產階級革命。

許多人（甚至一部分馬克思主義者也在內）都不很理解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的分析，許多的誤解和曲解便相繼發生，當時的機會主義的「自由社會主義者」(liberal socialist) 的歪曲的觀點，就是一種很流行的傾向，這傾向一直流行到了一九一四年。

這中間，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跟這種傾向不斷地鬥爭着。而站在正確的立場和鬥爭的尖端的，就是列寧。他首先最徹底地，最明白地指出了整個新階段的特質，並舉示了它的運動法則；後來，他在一九一六年，把這一次的鬥爭的理論成果，寫成了一部驚天動地的著作「帝國主義論」。

「帝國主義論」，可以說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原理。據列寧的分析，新階段的一

切現象的基礎，歸結到「獨佔的資本主義」(monopoly capitalism)。從前馬克思會分析為競爭的，比較地小規模商業的「自由貿易的資本主義」(free trade capitalism)，正如馬克思所預測的一樣，由於大規模經常戰勝小規模和資本日益集中的關係，已經是發展到了「獨佔的資本主義」或「金融資本」(finance capital)，這就變成了優勢的，現代的形式；換句話說：巨大的「新狄加」和「托辣斯」，已經把銀行資本和產業資本合流到唯一的方面，同時又跟國家機關實行密切的合作了。

跟這個新階段（「獨佔的資本主義」階段）相適應的，必然是規定資本主義政策的新方針，並廢止「自由貿易的資本主義」的舊路線。

新的路線是：為全世界性的獨佔而鬥爭，為榨取、市場、和租借地的「獨佔區域」而鬥爭；列強分割世界，實現進步的殖民地政策；實施進出口稅則，對外貸款和分贓；實行跟殖民地政策密切聯系着的「資金流出」；實行強化各部政治機構和

軍事機構；準備重新分割世界的「帝國主義大戰」。

但是「獨佔的資本主義」，同時就是資本主義的「寄生階段」(parasitic stage)。世界的大部分，其經濟命脈都操在列強手里；人類的大多數，其經濟命脈則握在少數金融巨頭的小集團之手。靠股息和紅利過生活而且跟生產不發生任何接觸的股東階級，在各帝國主義國內便發旺起來；仕奉他們的人也跟着激增，而從事生產事業的人却在比例上衰退下去。

同時，「額外利潤」(super-profit)的大部分，被提出去用作收買各帝國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的上層份子的「運動費」，對他們所用的手段不一：或則利用讓步，或則利用社會改良方針，或則簡直是利用工人領袖的腐化。因此，「勞働貴族」和「布爾喬亞工黨」的現象，便在各帝國主義國內發展出來了，他們的領袖是跟資本家的一手一同攙着走的。這就是歐美各國的機會主義和改良主義所由發生的基礎，也就是勞働運動所由分化的基礎。

雖然表現着上面的那種寄生傾向，然而「獨佔的資本主義」終究是「垂死的資本主義」(dying capitalism)。生產是已經達到了資本主義之下它的最高限度可能的發展；如今是已經被資本主義獨佔的形式阻止或限制了它的向前發展了。生產力已經跟資本主義的形式衝突着了。「世界大戰」的猛烈爆發，就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

列寧在這里發展出了一個結論：發動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時機，是已經成熟起來了。這正是像「蒂熟果落」一樣地自然而且必然的趨勢。

在列寧的小冊子「我們的時代任務」(The chief Tasks of Our Times, 1918)裏面，他寫着：

「人類正在走向偉大而艱苦的轉變，這是具有(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這麼說)世界意義的。全世界正在走向被壓迫者對壓迫者的戰爭。在這個新的戰爭中，被壓迫者正在從資本主義的軛下爭取自己的解放；正在從苦難，痛楚，飢餓和野蠻狀態中

爭取自己的解放；他們熱望着移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光明的將來，移到普遍的富庶和穩定的和平。」

他又說：

「除了社會主義而外，人類就沒有脫離戰爭，脫離飢餓，脫離千千萬萬人民的毀滅的出路。」

（參看英譯本列寧著「一九一七年的革命」The Revolution of

1917 第一卷第一一——一一四面。）

列寧遺教的中心觀念，是在於指出世界革命已經不再是一個未來的夢想，而是目前階段的直接的，緊迫的，不可逃避的任務。這一任務的實際表現，便是列寧遺教中所創導而且建立了的無產階級獨裁制。列寧說：

「布爾喬亞民主制，雖仍有而且不得不有封建殘餘的存在，但跟封建制度比較起來，自然是造成了一個巨大的歷史發展，造成了一個非常有限的，非常虛偽的法制，同時也就是造成了富人的天堂和被壓迫者以及窮人的陷阱和誘惑網。」

但列寧並不是一「反對民主制」的。相反的，他是極端地深刻地主張民主制的，他認為無產階級民主制才是一種高級的民主形式，由於階級的消滅，它就可以領導着實現無階級社會的真正徹底的自由和平等。無產階級的獨裁制，就是大多數被榨取者反對少數榨取者的一種獨裁制。

他又說：

「無產階級獨裁制，是反對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的一種堅決的，持久的鬥爭；是流血的與不流血的，暴力的與和平的以及軍事的與經濟的，教育的與行政的一種鬥爭。」

（參看列寧著「左派幼稚病」第五章。）

不過，這種獨裁，充其量也只是一個過渡的形式；等到它的任務一完成，國家這種機構就消滅下去，接着產生的就是「共產主義社會」。

列寧又主張：爭取世界革命勝利的最基本的關鍵之一，便是各主要的帝國主義

國內的無產階級鬥爭跟被壓迫民族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統治的人民的解放鬥爭之結合。他認為在帝國主義時代，這一問題是急於燃眉的問題，因為人類的大多數已經被屈服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狀態，而殖民地榨取已經成爲布爾喬亞勢力的主要基礎。因此，各帝國主義國內的無產階級，只有在聯合了殖民地人民的鬥爭之後，才能夠獲得解放。

列寧更進而規定了世界革命的戰略、戰術和組織，形成了有意識的，有組織的工人階級的前衛——政黨——的概念。同時，這個政黨概念中的本質，就是領導權的概念——所謂領導權，並不是什麼一批個人的領導，而應該是工人階級中一個有機的部分的領導，是最有意識的，革命的總領導，在革命之前，革命之際，和革命之後，站在前線上鬥爭，並且領導這個偉大的鬥爭。

關於怎樣完成這個領導權的任務，列寧寫着：

『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如果不學習去把領袖，階級，和羣衆結成一個不可溶解

的整體，便配不上這個名稱了。」

『「第三國際」面向着把無產階級的力量組織起來的任務，以便進行對資本主義政府的革命突擊，以便進行對各國布爾喬亞反抗的國內戰爭，以便爭取政權的建立和社會主義的勝利。』（參看列寧著「帝國主義戰爭」The Imperialist War, 第八十九面。）

他堅信着普羅革命和世界革命，是正在從帝國主義的矛盾和衝突的複雜發展中生長起來，發育起來，結果起來；他曾把這個信念歸併為他的一句名言：『帝國主義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